

《水滸》評論集

上海人民出版

I201.6/3?

《水浒》评论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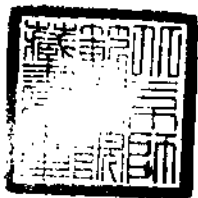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26765

626765



说 明

本书是《学习与批判》丛书的一种，共收有关《水浒》评论文章二十三篇。这些文章，除《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一文，原载《红旗》一九七五年第九期外，都刊登于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第一、二期《学习与批判》杂志。这次收入本书时，有些文章文字上略有修改。

一九七六年二月

《水浒》评论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5 字数 104,000

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71·608 定价：0.30元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
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

目 录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 方岩梁 (1)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 程 青 (7)

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魏永征 (16)

评《水浒》的人性论 程 青 (22)

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 程 青 (28)

歌颂什么,反对什么?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 徐缉熙 (37)

将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读《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罗思鼎 (44)

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 罗思鼎 (51)

《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罗思鼎 (63)

《水浒》与“国防文学” 红 宣 (72)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余秋雨 (78)

论《水浒》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反动作用 康 立 (89)

李贽与《水浒》

——李贽思想杂谈 陈旭麓 (94)

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

.....上海图书馆 顾廷龙 沈 津 (105)

宋江与武训.....洪廷青 杜恂诚 (107)

灵牌小议.....延 凤 (110)

浅论侠与盗

——读《流氓的变迁》.....史 图 (114)

帮闲·帮忙·帮凶

——从燕青的“扑”说开去.....徐 震 (121)

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说起.....复旦大学工宣队员 汪祖根 (125)

宋江的“借”和“买”.....五七农场 杨建文 (127)

“胡敲”与“胡芦”.....上海柴油机厂 黄来纪 (130)

《水浒》改名的启发.....徐 震 (132)

“呼保义”新考.....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 费秉勋 (136)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

方 岩 梁

《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好作品，还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鲁迅早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浒》中“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后，就深刻地对《水浒》作了如下的评论：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段精辟的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揭穿了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的宋江这类投降派的真面目。《水浒》只反贪官，不反对皇帝，就连那个腐朽的宋徽宗，也被歌颂为“至圣至明”的天子，说他“求贤”，“爱民”，“博施济众”，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几个“奸臣”。一部《水浒》被冠之以“忠义”二字，忠于谁呢？当然只能是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宋江直到临死前，还一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说宋江是投降派，“终于是奴才”，有些人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非常杰出的领袖”，代表了整个农民

阶级的意志、愿望，甚至连他的投降也是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究竟是鲁迅正确，还是这些人的观点正确？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江这个人物“杰出”在什么地方。

我们判断一个人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并不仅仅看他的出身和职业，而是看他的思想和行为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所实行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对要去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话：“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擢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口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番话，是宋江的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擢掇”农民起义军投降，把他们引进地主阶级的屠场；同时，他自己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体爬上去，借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他唠唠叨叨嘱咐武松去做的也就是这件事。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用他的投降主义的路线代替了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的世界观。“聚义”是要起义，要革命；而“忠义”则是要招安，要投降，这不明明白白地反映了两条路线的对立吗？

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都跟着他去当奴才。就在梁山“大聚义”那一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结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

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和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宋江是帝王将相和整个地主阶级的鹰犬。对于这样的鹰犬，《水浒》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义色色俱全。这种歌颂正好证明了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曾经追根溯源，指出从孔墨儒侠到《水浒》，直到清代的《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之类，前后一脉相承。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过，《七侠五义》这类小说中的侠客“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事实上，宋江同黄三太、黄天霸、展昭之流都是一路货，说得明白点，无非是皇帝或者所谓“清官”的奴才、走狗和保镖。

我们再把宋江与高俅比较一下，更可以发现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又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呢？有。高俅狗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了“寇”。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同归，宋江是由官暂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而高俅呢，一下子就当了官。宋江在浔阳楼写的所谓“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骚罢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怀才不遇”心理的绝妙的自我写照吗？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斗，终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

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

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水浒》称颂宋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士农乐业”，实际上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地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即书房的素白屏风上，书写着“四大寇”的姓名，可见他为此而日夜忧心。结果呢，“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这位赵官家，而且帮他镇压了另外三支农民起义军，这对北宋王朝和赵佶不是一场道道地地的“及时雨”吗？在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无法维持的时候，反动阶级总是特别需要宋江这类“及时雨”来浇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水浒》这部书和宋江这个形象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特别赞赏，原因正在于此。

金圣叹把《水浒传》砍去了二十多回，强调对宋江这样的“盗魁”，只能斩尽杀绝，决不容许招安。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谈金圣叹》的文章，批判金圣叹：“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金圣叹之“昏庸”，首先在于他不懂得起义的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别说一个“嵇叔夜”，一百个“嵇叔夜”也没用。金圣叹之“昏庸”还在于他没有看懂施耐庵、罗贯中写《水浒》的真正用意，他们正是站在金圣叹同一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才塑造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形象。他们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金圣叹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没有看破宋江这号人根本不是“盗魁”，而是地主阶级的忠实的代理人。鲁迅还生动地把《水浒》被砍的本子比喻为“断尾巴蜻蜓”。宋江投降，受招安，打方腊，这是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把这一半砍去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就不真实了。金圣叹这一砍，由于砍掉了宋江的许多罪恶行径和丑恶表演，颇受许多为宋江唱赞歌的人们的欢迎。

“替天行道”的强盗同“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有严格区别的。鲁迅明确指出，前者是道道地地的投降派，而后者才是反剥削、反压迫、反奴役的起义农民。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事实上，即使在梁山起义军的内部，也是一分为二的。起义军多半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不少是地主阶级的破落户子弟，反动军队的士兵和军官。由于宋江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招降纳叛，拉进了大批宋王朝的高级将领，使这支起义军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起了变化。在一百零八将中间，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他们不愿意投降。吴用和阮氏三兄弟是最早跟着晁盖起来造反的。李逵更是梁山起义军中斗争最勇敢、最坚决的一个。他一听到乐和唱宋江做的那首《满江红》，就睁圆双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把桌子踢起，搯个粉碎。他根本不把大宋皇帝放在眼里，宋江不反，他要反。太尉陈宗善进山寨颁布朝廷招安的诏书，李逵不仅一把夺过诏书，扯得粉碎，还劈胸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直到小说最后，李逵一听说朝廷送来了药酒，就大叫：“反了罢！”所以宋江最不放心的就是这股“黑旋风”，一定要将他先搞死才肯闭上眼睛，用心实在恶毒极了。宋江同李逵们之间的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起义的路线这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为宋江辩护的人，还抬出了一个“义”字来当挡箭牌，好象宋江同所有的人都是义重如山，亲如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分什么阶级，什么路线，什么投降派和革命派？鲁迅对于《水浒》中流传的这句口号，用一句话就戳穿了它的虚伪性：“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事实正是如此。别说在四海之内，就是在梁山泊之内，也决不是什么兄弟关系，而是阶级关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立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梁山起义军的内部来。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他对上是忠得很，对下又何尝把所有的人都当兄弟看待！第八十三回“陈桥驿滴

泪斩小卒”，就充分暴露了宋江的“义”的虚伪性。当招安的丑剧刚刚收场，起义军中一个军校激于义愤，杀了一个辱骂起义军的厢官。这下可吓坏了宋江，他马上要砍下军校的头，到朝廷请罪。可是还得照顾一下“义气”，于是宋江使出他惯用的猫哭老鼠的本领，“哭”了起来，叫那军校“痛饮一醉”，自己去上吊，然后再割下头来号令示众。头也砍了，“义”也尽了。对“义”的内容要作阶级分析。晁盖“聚义”，是要团结起来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反；而宋江讲“义”，是要用“义”来掩盖阶级的对立，调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让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宋江这种“义”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吗？李逵的悲剧正在于他吃了这种“义气”的亏，被这个“义气”蒙住了眼睛，只认“哥哥”，不认路线，识不破宋江的反动真面目，最后终于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宋江这类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勾当的投降派是深恶痛绝的。特别是当他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刀光和血光之中，既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坚贞不屈，也看透了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的鬼蜮嘴脸。“大军一到，便受招安”，马上为虎作伥，帮着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是一种；始终披着革命者的外衣，而对真正的革命者却大布围剿阵的又是一种。鲁迅写《流氓的变迁》一文，不正是要求人民群众警惕宋江一类投降派吗？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鲁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剖《水浒》，并把现实的阶级斗争同历史的阶级斗争相对照，所以他对这部书才看得那样分明，分析得那样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我们应当认真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提高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识别能力，为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

翟 青

在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中，故事刚进行到一半，作者就让晁盖中箭而亡，使宋江得以坐上了梁山泊第一把交椅。《水浒》为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而作出的情节安排，露骨地反映了它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政治意图。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中的晁盖和宋江，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分别代表了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晁盖组织和领导了智取生辰纲的集体斗争，以实际的革命行动背叛了自己原属的地主阶级而投身于农民起义的队伍之中。他上了梁山后，和吴用、阮氏三兄弟亲密合作，消灭“进剿”的官军，屯粮、造船、操练人马，在巩固和扩大农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表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梁山泊农民起义大军的衷心拥护。晁盖在梁山泊所执行的这条路线，正如朱贵说的，“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或者如李逵说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它反映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势不两立的决心，表达了广大革命农民的意志和愿望。

宋江则不同。他是个满脑子儒家思想的地主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原先宋江视梁山为“不忠不孝之地”，曾经多次拒绝梁山好汉救他上山；但当他被迫上山成了事实后，一踏进聚义厅马上就变了调子，慷慨激昂地说：“感蒙众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他在晁盖面前，从不肯在公开场合提到“招安”二字，对晁盖装出了一副

愿意“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的样子。他本心明明认为梁山造反行为是“灭九族的勾当”；但当李逵在梁山的庆喜筵席上公开说出“便造反，便怎地”的时候，也只是默不作声，伪装得十分巧妙。不仅如此，宋江还背着晁盖，在暗中搞了不少投降活动。他为了迎接朝廷招安，一方面苦口婆心地对投降过来的将领彭玘、呼延灼、徐宁等人鼓吹：“只待圣主宽恩”，“专待朝廷招安”；一方面卑躬屈膝地对地主统治集团的宿太尉表白：“宋江原是郟城小吏，为官司所逼，不得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你看，宋江不仅在梁山泊内部培植投降势力，而且居然大胆而无耻地干起里通朝廷的叛卖勾当来了。

《水浒》这部书，对前六十回展开的晁宋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如下的总结：“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这就是说，晁盖造反坚决，不忠不义，合该早死，应当让“早愿瞻依廊庙”的宋江来“把寨为头”，以便放手推行投降主义的路线。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水浒》第六十回以后的故事情节，就是宋江用忠君思想统治梁山，改造梁山，毁灭梁山革命事业的过程，也是宋江踏着农民起义军的血泊而一步一步地走进“廊庙”的过程：

第一步，宋江上台的第一天，立即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六十回）

第二步，宋江通过“英雄排座次”，把卢俊义等投降势力安插到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坚持晁盖路线的李逵、吴用、三阮、朱贵则受到排挤或贬低。（七十一回）

第三步，宋江在菊花会上，公开提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投降口号。（七十一回）

第四步，宋江在元宵夜亲自上京城，巴结皇帝的宠妓李师师讨招安的诏书。（七十二回）

第五步，宋徽宗第一次招安阴谋被粉碎以后，宋江亲自护送陈太尉下山，乞求他到皇帝面前美言几句。（七十五回）

第六步，宋王朝两次招安都没有成功，宋江感到“越增的罪恶重了”。打败童贯而不追，活捉高俅又放走，还向他们一再表白自己愿意归顺朝廷。（八十回）

第七步，宋江再派燕青、戴宗上京城，贿赂李师师和宿太尉，讨得了皇帝的诏书，使梁山泊全伙接受招安。

第八步，宋江投降以后，征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第九步，当宋江吃了宋王朝御赐的毒酒而快要死去的时候，骗李逵也服了毒酒，还高呼：“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这就是叛徒宋江在当了梁山泊寨主后所留下的一步一步的清楚脚印，直到最后走进坟墓为止。他临死前自我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说“不肯半点欺心”是假，说“只主张‘忠义’二字”是真。从郓城县的“孝义黑三郎”，到忠义堂上“替天行道”的寨主，再到为封建朝廷尽忠的楚州安抚，宋江的一生都是围绕若“忠义”二字而进行其反革命活动的。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宋江，决不会忠于梁山的革命事业；搞修正主义的革命投机分子，最终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不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吗？

宋江所鼓吹的这条投降主义路线，在封建社会有着深厚的阶级基础。当农民革命风暴席卷大地的时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形形色色的人物被卷进了革命的洪流，其中包括不少人是从封建统治营垒中投奔过来的。这些人在农民革命洪流的旋涡中动荡不定，有的经过改造后转变了立场，坚定地走上了农民革命的道路；有的则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从农民革命的对立面而来，最终还是作为农民革命的对立面而去。这后一种人，就是宋江在梁山泊内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阶级基础，其中又进一步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

类是宋王朝派来镇压农民起义被梁山英雄俘虏的投降将领，如关胜、秦明、呼延灼、董平等；一类是被宋江用计请上山来的地主阶级头面人物，如卢俊义、李应等；一类是在地主阶级内部钩心斗角中遭到排挤后上山避难或谋求出路的，如柴进、戴宗、杨志等人。这些人既然都不愿意改变自己原来的反动立场，就很自然地结成一党，成为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支柱。诸如柴进、戴宗等人，为了帮宋江讨得一纸诏书，冒着风险去闯京城，买“关节”。又如卢俊义，不仅和宋江一起里通朝廷搞招安，在招安后镇压农民起义时也和宋江一样地心狠手辣。最后，宋江路线越来越不得人心，连燕青也要退居山野的时候，卢俊义还训斥燕青道：“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宋江搞投降，正是依靠了这样一批人；而他们之所以拥护宋江，也正因为宋江所推行的这条路线代表了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

有投降派，就有反投降的人在。梁山上有许多好汉是不愿意投降的，李逵、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人就都是坚决的反投降派。他们出身贫苦，受尽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对梁山造反事业寄托了穷苦“百姓都快活”的崇高理想，十分痛恨葬送革命前途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在菊花会上一提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投降口号，李逵就愤怒地大骂：“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并一脚把桌子踢得粉碎。宋王朝派陈太尉来梁山招安，李逵夺过诏书，扯得粉碎，揪住陈太尉揪拳便打。直到招安以后，李逵还多次喊着：“反了吧！”“再上梁山泊去！”这就难怪宋江把他看成是“反心尚兀自未除”的人。再看看阮氏三兄弟，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对来梁山招安的陈太尉表示了极大的蔑视，不仅捅船漏水，使“天使”陈太尉狼狈不堪，还打开御酒和众水军痛饮，换上村醪水酒，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在宋江剿灭王庆班师回京途中，阮氏三兄弟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越来越感到恼火，便和李俊、张横、张顺等人商量立吴用为头。他们一齐对吴用说：“今请军师自

做个主张；若和哥哥（宋江）商量，断然不肯。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李逵、三阮代表了梁山英雄的真正本色。他们的失败，是因为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

出身知识分子的吴用，跟随晁盖造反多年，多年的斗争实践使他对晁盖路线怀有深切的感情。宋江一步步地改变晁盖的路线，他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并且多次巧妙地应付了紧急局面，一再挫败了宋江的阴谋。宋江勾结大地主卢俊义在梁山搞修正主义，吴用对此是有所警惕的。卢俊义一踏上梁山，宋江迫不及待地要尊他坐第一把交椅，李逵反对，武松不满，气氛十分紧张。吴用就提议：“且教卢员外东边耳房安歇，宾客相待。等日后有功，却再让位。”当头给卢俊义泼了一盆冷水。（六十七回）卢俊义活捉史文恭，宋江又劝大家推卢俊义为山寨之主。这时吴用抢先表态：“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众兄弟，各依旧位。”宋江仍不死心，再不以晁盖遗言为名，坚持己见，当他和卢俊义推让之时，吴用一面说：“兄长若如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一面以目示意众人。果然李逵、武松、刘唐、鲁智深都一齐闹了起来，没有让卢俊义能够篡取最高权力。（六十八回）以后，在菊花会上，宋江要杀李逵，吴用以“一时醉后冲撞”来为李逵解围。陈太尉招安前后，吴用几次提出，要以武力对付朝廷，“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着也怕。”宋王朝第二次来寨招安，吴用又设计让花柴一箭射死了正在宣读诏书的天使，使宋江的投降阴谋未能得逞。由于吴用和李逵、三阮的阶级出身和政治经济地位不同，造反精神也不如他们足。特别是眼看宋江的投降路线日益得势，他就有些心灰意冷了，以至产生过“下效陶渊明之乐”的退隐念头。

从敌人营垒里分化出来的林冲、武松、鲁智深是另一种类型。虽然他们的经历和落草原因不尽相同，却都在梁山革命熔炉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锻炼，比较坚决地走上了革命造反的道路。林冲

面临高俅的种种陷害，开始只是逆来顺受，但血的教训使他逐步清醒过来，最后终于上了梁山。上山以后，他火并了不准别人革命的白衣秀士王伦，忠心耿耿地为晁盖路线服务。晁盖死后不久，在攻打北京城的战役中，反动军官关胜骄横不可一世，宋江却带头为他喝彩，这时林冲愤怒地说：“我等弟兄，自上梁山泊，大小五七十阵，未尝挫了锐气，今日何故灭自己威风！”当林冲再次直奔关胜杀去的时候，宋江又下令鸣金收军。这时林冲再次提出了抗议：“正待擒捉这厮，兄长何故收军罢战？”可见，他对宋江对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膝的态度是很恼火的。鲁智深、武松不仅反对宋江尊卢俊义为寨主的可耻行为，而且在菊花会上和陈太尉招安的两次斗争中，都挺身而出，站到了李逵一边。林冲、武松、鲁智深走向造反、反对投降的事实，不仅说明了宋江路线的不得人心，同时也说明了革命熔炉是可以锻炼人，改造人的。

李逵、吴用、三阮等人虽然对宋江路线作过长期的斗争，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他们对宋江忠君的投降主义路线，从现象上、感性上看得比较多，但还不能深入认识到它的本质。这主要是由于被“义”字蒙住了眼睛。在晁盖时期，梁山的“义”本来是以“杀尽不平人”“砍尽不平事”为其主导面的，它一度曾成为联合五湖四海造反派的精神纽带。但是，它本身又包含有剥削阶级思想的糟粕，不可能真正作为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很容易被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投降派所利用。宋江一上梁山，就喋喋不休地说忠道义，说什么要“全忠仗义”，“忠义双全”，但梁山好汉们并没有对此及时引起警惕。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篡改和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这一字之易，标志着宋江按照“忠君”思想改造梁山农民起义队伍的开始。“忠”字已经摆到了“义”字之前，“义”字成了从属于“忠君”的工具，但梁山好汉们也还是对此毫无半点察觉。

果然，宋江用服从于“忠”的“义”，严重地腐蚀和毒害了梁山的农民起义队伍。“义”象蒙汗药一样麻倒了許多响当当的英雄好

汉。李逵手抡两柄板斧，在沙场上有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但他由于盲目地讲义气，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面前，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识不破宋江这个叛徒、内奸的真面目。在前面提到的菊花会上，宋江下令杀他，谁料到李逵会说出这样的话：“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直到全书的结尾，宋江用“义”调成的毒酒置他于死地，李逵也只是双泪长流地说：“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李逵死于一杯“义”酒而无怨，不禁令人惋惜和悲愤。这是多么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呵！再说吴用吧，也是吃了盲目讲义气的亏。当宋江投降嘴脸暴露无遗的时候，他还是不忍心和宋江决裂。在征讨王庆班师回京途中，阮氏三兄弟等人决心抛开宋江，要吴用带领大伙重新杀上梁山。吴用也动了心，但他看人重于看路线，竟然对阮氏弟兄们说什么：“自古蛇无头而不行。我如何敢自作主张？”他虽然也用“兄弟们都有怨心”劝过宋江回梁山，但宋江用“斩我首级”和“必当自刎而死”的话一吓唬，吴用也就不敢再作声了。直到宋江死后，吴用为了要“与仁兄同会于九泉之下”，最后竟自缢于宋江墓前的树上。李逵和吴用都死于一个“义”字，这种历史的悲剧，有力地说明了“义”的反动性。

宋江不是自称“呼保义”并且以“保义郎”自居吗？他究竟呼的是什么“义”？是聚义造反的义吗？不是。他根本不是农民革命的义士，而是地主阶级的义士。宋江呼“义”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忠君。他要在梁山泊内公开鼓吹忠君，是没有多大市场的。起义农民受尽了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怎么会去忠于地主阶级的头子呢？但他用义却颇能笼络人们去为他忠君。“义”象绳索似地把梁山好汉们捆绑得“如念珠子，个个连牵”那样，为了要讲义气，死生相随，大家也就只好跟着忠君的宋江跑了。保义，保义，最后“保”的只能是忠君的投降主义路线。

一个忠字改变了农民起义大军的革命性质，一个义字象镣铐一般锁住了农民起义大军的手脚和灵魂，终于使他们从梁山之巅

跌倒在紫禁城下，成为“忠”与“义”的俘虏。《水浒》的最后一回，作者又虚构了一个宋徽宗梦游梁山泊的情节，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给宋江立“靖忠主庙”，还说什么老百姓敬祭宋江，“祈风得风，祷雨得雨”。你看，上自天子，下至百姓，中间还有《水浒》的作者，都在尽情地赞美和颂扬宋江了，宋江成了“忠义立身之本”的理想化身。《水浒》这样描写的本意，显然是要人们象宋江一样，搞什么“忠义双全”，但实际上倒是帮助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从反面懂得了：同反动统治者讲什么“忠”，同投降派搞什么友情为重的“义”，看人不分阶级，不看路线，最终必然会导致革命的失败。

通观《水浒》全书，它歌颂的是投降派，宣扬的是投降主义路线，鼓吹的是投降主义理论。但这部书好也就好在这里，它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早在建国初期，毛主席曾经针对当时思想文化界吹捧《武训传》以及武训的情况指出，象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到了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再次指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毛主席的这些极其深刻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阶级调和论的余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同《清宫秘史》《武训传》一样，《水浒》也是一部鼓吹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我们绝不能容忍对奴才武训的歌颂，也绝不能容忍对叛徒宋江的歌颂。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丑恶面目。我们应当充分开

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旗帜鲜明地反对奴才主义,投降主义,修正主义,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

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魏 永 征

一部《水浒》，从头至尾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思想？不少人说，这反映了“农民的局限性”，是“典型的”“农民革命思想”。

果真如此吗？很值得怀疑。我们姑且先不说别的，就《水浒》论《水浒》吧。这部书除主要写了梁山泊起义军外，还提到了田虎、王庆、方腊等其他农民起义军。但在他们的营盘里，不仅没有树起什么“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而且“改元建号，南面称尊”，公开同宋朝天子大唱其对台戏。即便在梁山的一百零八人里边，要反皇帝的也大有人在。起义军元老、旱地忽律朱贵早就宣称“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这显然不是他个人的随口之言，而分明是当时在晁盖领导下的农民起义军的政治宣言。还有个黑旋风李逵，更是一再高叫“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把斗争的矛头牢牢地对准着皇帝。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典型的”“农民革命思想”，那末，晁盖、朱贵、李逵、田虎、王庆、方腊等人的反皇帝宣言，该称作是哪个阶级的思想呢？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农民的局限性”，那末，又是什么魔力使他们一千人超脱了这种“局限”呢？

把我们的思路拉开一点，想想整部中国农民革命史，问题就更多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反的是东汉王朝的“天”；“冲天香阵

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冲”的是李唐王朝的“天”，比《水浒》成书稍后一点的李自成起义大军，直捣京都，致使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他们哪里是把自己的斗争“局限”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范围里头呢？历史事实证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绝对不是“典型的”“农民革命思想”。相反地，倒是李逵“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呼号，才是典型地反映了起义农民的革命性格。“夺了鸟位”干什么？李逵说：“晁盖哥哥做大皇帝，宋江哥哥做小皇帝”。农民要取皇帝而代之，这样的“农民皇帝”，在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中屡见不鲜。这个历史现象本身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表现了农民在“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的情况下，不可能真正找到彻底地解放自己的道路的限制性，一方面又强烈地表现了农民同封建帝王、同整个封建统治势不两立的革命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而不是仅仅反对某一个别分子或某一派别。如果反对地主阶级而不去反对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总代表——皇帝，这样，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岂不成了一句空话了吗？

在忠于皇帝的前提下，提点反“贪官”、“奸臣”的口号，这在反动地主阶级营垒内部也是容许的。如果把这一点称之为“典型的”“农民革命的思想”，那末，海瑞、“包龙图”、“彭公”、“施公”和其他许许多多公案小说、公案戏中的主角，都可以称为典型的农民革命英雄了。“贪”啊，“清”啊，“奸”啊，“忠”啊，这些概念从何而来？无非是地主阶级内部各种派别斗争的产物。地主阶级内部总是你争我夺，钩心斗角。欲加罪于对方，为争宠于殿前，便把“贪”、“奸”之类的帽子飞来飞去。还是从《水浒》中取个例子吧。围绕着如何对付梁山起义军的问题上，宋朝最高统治集团就分成两派：一派是宿元景、张叔夜等人，主张“招安”；一派是高俅、童贯等人，主张“征

剿”。“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水浒》是站在“招安”派一边的，于是就给“征剿”派扣了一顶帽子，叫做“奸臣”。其实，谁都明白，这两派在要扼杀农民起义这一点上毫无分歧，争执在于用哪把刀、哪根绳。只反高、童，实际上只是反对一种刀、一种绳，是宿、张之流的主张。而在起义农民看来，高、童、宿、张，哪个不“奸”，谁人不“贪”？怎么能把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斗争的思想口号来冒充农民革命的思想口号呢！

既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口号，那末，一旦当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把它引入农民起义军内部，又必然幻化成投降主义的口号，请看宋江上山后，就是逐步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代替了晁盖的“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革命路线。他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一个“忠”字很能说明问题。忠于谁？忠于皇帝，忠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为什么要提倡“忠”？宋江解释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赦罪招安，同心救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水浒》还在这段描写后特别强调了一句：听了宋江这段话，“众皆称谢不已”。这是作者在代表地主阶级感谢宋江劝说和蒙惑了一批农民起义军：他们受苦受难的根源只是“贪官”和“奸臣”，而决不是“至圣至明”的天子。斗争的视线转移了，斗争的目的也改变了。农民起义军变成为了“云开见日”，替天子拨开蒙蔽视线的“浮云”，才来反“贪官”。这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质已变成了“为了皇帝而反贪官”。接受了这个口号，过去要与皇帝作对的革命队伍，实际上已经向皇帝缴械投降了。

其实，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要害在后半句，兑现的也只是这后半句。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虽然也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在农民起义面前，又总是要勾结起来，共同镇压革命。宋江“反贪官”，就只是说给“众弟兄”听听的。在宋江全部“革命”生涯中，

杀过的“官”总共只有一个，就是黄文炳。而黄文炳之可杀，也不是因为他作恶多端，仅仅只是因为他差点要了宋江自己的命。而在其他大小文武官员面前，宋江的态度则是奴颜婢膝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不说别人，就说那个梁山起义军恨之入骨的高俅吧，他兵败被擒，解到“忠义堂”上，宋江简直象见了亲老子一般，“亲解其缚”、“纳头便拜”。此时此地，高俅在宋江眼前无异是一个“青天大人”。昨日的“贪官”、“奸臣”，今日对自己有利了，就是“清官”和“忠臣”，这本是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官场秩序的常见现象。对高俅尚且如此，世上还有什么“贪官”可反！可怜一支威风凛凛的农民起义军，被宋江带入了这样一条死胡同：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不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竟成了一无可反！

真的是一无可反吗？也不。既然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是死对头，那末，“不反皇帝”，就必然要反农民，反农民起义军。这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正是在梁山起义军逐渐被宋江弄得晕头转向、不知道该反什么的时候，宋江把一批气势汹汹地来“清剿”起义军的反动官吏引进了起义军队伍。当他们被农民起义军俘获后，很奇怪，只消宋江一席话，几个钟头前还在战场上生死相扑的仇敌，立刻在忠义堂上成了“同生共死”的“兄弟”。说怪也不怪，秘密就在于宋江向他们“亮”了个“不反皇帝”的“底”：“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待朝廷赦罪招安”，“那时尽忠报国”……这些气喘吁吁的败将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要他们投降宋江，而是宋江要投降他们，不是要他们参加农民起义军，而是请他们来夺农民起义军的权！连年征战、损兵折将所得不到的东西，现在竟成地送到了手边，这是地主阶级里的死硬分子也会举起双手拥护的。于是，诸如呼延灼、彭瑛、韩滔、关胜之流，一个个钻进农民起义军的肝脏，窃取了领导权，最后终于使梁山领导集团“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到这时，即使没有以后的招安仪式，实质上起义军也已被“整编”进了封建朝廷的御林军。宋江们在无声无息之中替皇帝消灭了梁山起

义军。招安以后，这支变了质的队伍就去打方腊，这是必然的。方腊在反皇帝，你不去打，不也是反皇帝了吗？何况现在将领中有的是“征剿”起义军的老手。别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破绽百出，到了“只反农民，不反皇帝”这一步，不就功德圆满了吗！

这不是几个口号的演变，而是一个口号逐步暴露其实质的必然过程。我们只要看看另一本反动小说《荡寇志》，对这个过程就可以更清楚了。这本书的作者俞万春，一个亲手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的刽子手，给梁山一百零八人设计了一个斩尽杀绝的结局，真可谓是反动气焰满纸页了。但这部书中消灭梁山农民革命的头号“功臣”陈希真，其实也是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起家的。他也曾被“奸臣”、“贪官”所害，被迫“落草”，反起“奸臣”、“贪官”来，比《水浒》中的宋江还要着力。后来接受招安，踏平梁山，活捉宋江；“奸臣”高俅、童贯们也相继败亡。据说《荡寇志》是《水浒》的对立面，但是只要掩卷一想，其实并无多少不同。不同的只是姓名：《水浒》中的宋江，在《荡寇志》里叫陈希真；《水浒》中的方腊，在《荡寇志》里则叫做“宋江”。如果“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果真是“典型的”“农民革命思想”，那末，陈希真不也应尊为农民革命英雄了吗？

《水浒》中宋江有一句诗：“敢笑黄巢不丈夫”。他“笑”黄巢什么？大概也就是笑黄巢不懂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可以由此发展到“只反农民，不反皇帝”，从而用农民起义军的鲜血和生命来换取自己的功名。但是，尽管他笑吧，对他这种破坏农民革命的地主阶级反动逻辑，黄巢等农民革命领袖将永远坚决唾弃。即便在《水浒》里，不说宋江招安时遇到过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等反投降派的多少次反对和斗争，就说招安后非去“征剿”田虎、王庆、方腊等其他起义军不可一事，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有许许多多其他农民领袖象黄巢一样，宁愿斗争不屈而死，不愿屈膝投降求生，他们的英勇行为不但彻底地批判了宋江的这种反动逻辑，而且也彻底地粉碎了那种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说成是“农民局限性”的弥天

大谎。

歌颂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作为，实际上正是在取笑和贬斥中国历史上无数“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农民革命者。能容忍这种现象吗？伟大的鲁迅提出了反对。他明确地把宋江一类“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的家伙，愤怒而轻蔑地称之为“奴才”，那末，“奴才”的对立面——真正的英雄是谁？不言而喻，正是那些“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正是那些与以皇帝为总头子的地主阶级拚斗至死而毫不屈服的农民阶级的优秀儿女们。只有他们，才推动了历史车轮滚滚前进。

一切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类投降论调辩护的种种修正主义观点，早该是批判和清除的时候了。鲁迅在几十年前的批判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在批判古代投降派的过程中，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肃清刘少奇、林彪一类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从而进一步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评《水浒》的人性论

翟 青

《水浒》第一回，说的是洪太尉误走妖魔。从这段装神弄鬼的文字开始，一部《水浒》展开了一百零八个魔君怎样“去邪归正”的故事。搞清楚一百零八个魔君“去邪归正”说明了什么，是我们深入认识《水浒》的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家知道，《水浒》故事从南宋的民间传说到元末明初成书，这一段时期正是反动的程朱理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为了论证封建秩序的天然合理性，程朱理学提出了所谓“天理”和“人欲”对立的哲学命题，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经。在程朱理学直接影响下写成的《水浒》，通过描写一百零八个魔君“去邪归正”的过程，形象地为理学家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作了图解，狂热地宣扬了没落地主阶级的反动人性论。

《水浒》描写的去邪归正即“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展开的。

宋江，在梁山上是天理的化身。但这天理受了人欲的蒙蔽，本性不明，因此，就必须经历一个灭人欲、存天理的过程。九天玄女娘娘不是说宋江“魔心未断，道行未完”吗？这里的“魔心”，也就是“人欲”。宋江在浔阳楼上，想起自己“名又不成，利又不就”，提起笔来，发了一通醉后狂言。尽管这醉后狂言，只是“忠为君王除贼臣”的牢骚，但终究夹杂着追求功名利禄的要求，这就是人欲占了上风。《红楼梦》里贾府的焦大，仗着酒醉以奴才的身分骂了两句

主子，结果还免不了被塞了一嘴马粪。宋江发了那么大的牢骚，自然要弄得在屎尿里滚得臭哄哄的，险些还掉了脑袋。“遭逢坎坷皆天数”，为了使宋江“灭尽人欲，复尽天理”，天老爷不仅要给宋江历经磨难，而且还要直接对宋江进行说教。于是《水浒》安排了“还道村受天书”的一梦。“还道”者，灭去人欲、复还天道也。经过九天玄女的一番教诲，宋江决心去邪归正，这对宋江的“灭人欲，存天理”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紧接着，宋江就按照九天玄女的神谕，在梁山上打起了替天行道的白旗。于是，悖逆天理的聚义厅改成了体现天理的忠义堂，逆天而行的梁山起义军变成了顺天、护国的封建朝廷御林军。这时，就连九天玄女也要称赞宋江“忠义坚守，未尝少怠”，肯定他“灭人欲，存天理”的成绩了。罗真人说宋江“一点忠义之心，与天地均同”，智真长老也说宋江“忠义根心”，宋江还吹自己是“忠肝包天，义胆盖地”。总之，宋江在除灭人欲以后，就成为天理的化身了。《水浒》不是说宋江“英灵上应天星”吗？的确，宋江在灭人欲，存天理的过程中，总是“逢凶化吉天生成”。到最后，天使送来了药酒，宋江不但心甘情愿地一饮而尽，而且还要拖上个李逵，灭了这个造反者的人欲。人欲灭则天理存，连肉体都可以为了忠义而被毁灭，剩下的自然是纯而又纯的天理了。过去的好多文章，都说宋江之死是什么“悲剧结局”，其实，《水浒》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天理在宋江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是对灭尽人欲、复尽天理的一曲颂歌。

号称“黑旋风”的李逵则不同。他的“魔心”已经成了“反心”。在他身上体现的灭人欲、存天理的过程，比起宋江来要曲折和艰巨。但李逵由于一点天良未泯，所以最后在宋江的感召之下，终于也成了正果。在宋明理学家的心目中，皇帝是上帝天意的体现。因此，“存天理”就不能反皇帝，反皇帝就是最大的悖逆天理。为什么李逵要反皇帝？《水浒》的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李逵有追求快活的欲望。这种追求快活的人欲大发作，脑子里就连一点天理的影子

也没有了。象李逵这一类真正不堪忍受封建压迫和剥削而起来造反的劳动人民，在《水浒》中都被歪曲成了人欲的化身。比如，刘唐是为了追求“一套富贵”，三阮兄弟是向往“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因而他们都被说成是天生成的“恶性”。他们“天性由来太恶粗”，“赋性从来要杀人”。完全不符合理学家的人性标准。《水浒》的作者正是从理学家的标准出发，百般嘲弄了李逵等人的人欲。李逵不是要接母亲来梁山“快乐几时”吗？“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李逵的老娘命里该苦，想过快活日子那就是人欲，就是恶性。因此，书中索性让她被老虎吃掉。《水浒》诗云：“饿虎饿人皆为嘴”，把想过好日子的劳动人民骂成禽兽。其实，劳动人民要生存，就是要通过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水浒》对此大骂，不就是要取消革命吗？因此，对于李逵这种无礼的“黑禽兽”，《水浒》要让他受尽磨难，不但要将他泡在水里浸得两眼翻白，而且要将他送在蓟州府里打得皮开肉绽。不过，在宋江软硬兼施的训斥或熏陶之下，李逵身上的“天理”总算逐步地显现了出来，在睡梦中还朝皇帝端端正正地“拜了三拜”哩！最后甚至让李逵去跟着宋江做“一个小鬼”，成全了宋江的天理。李逵既然连肉体都灭掉了，他的人欲自然也不存在了，剩下的不也是纯粹的天理了吗？

整个梁山“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也就是以宋江为代表的天理战胜以李逵为代表的人欲的过程。理学家们认为，“性即是理”，人性就是天理的体现。他们想用一天理，把不同阶级的人性拉扯到一起，这是道道地地的超阶级的地主阶级人性论。《水浒》硬要把不同阶级的人性说成是统一的，恰好表明了它的理论基础是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最突出的，要算第七十一回描绘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场面了。在这里，从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到猎户渔人、屠儿刽手，“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人们，都亲密地抱成一团了。这是为什么？“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困冤百八人”，原来，就是因为大家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人性，即天

理。在反动的程朱理学看来，天理只有一个，人与人之间只要识得彼此心中的天理，那就什么矛盾也没有了。《水浒》的作者把这种境界叫做“识性同居”，这就是说，不同阶级的人有着共同的人性，可以亲密无间地相处。被《水浒》歪曲得不成样子的梁山泊聚义，不就是这样一种无耻捏造出来的所谓“识性同居”吗？

从“识性同居”一类的人性论出发，可以直接引出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来。既然梁山上的投降派和反投降派可以“识性同居”，那么革命农民同封建统治阶级自然也可以“识性同居”了。果然，按照《水浒》作者的安排，李逵反投降同宋江投降之间的矛盾，梁山起义同赵宋王朝之间的矛盾，总之，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矛盾都莫名其妙地烟消云散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最终，天理战胜了人欲，一百零八个魔君也终于“去邪归正”，桀皇帝打别的魔君——不“存天理，灭人欲”的魔君去了。这是多么奇妙的人性论魔术啊！

然而，魔术师是难免不露出马脚的。鲁迅早就针对某些人通过《水浒》宣扬的人性论鼓吹超阶级的“兄弟情谊”，一针见血地揭露过：“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鲁迅说得很深刻的。在阶级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什么时候出现过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待的事呢？根本没有。就说《水浒》中的梁山吧，是不是作兄弟看，关键也还是要看是不是实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标准。如果都真是做到了存天理，那自然不妨“一般儿哥弟称呼”；如果死抱住人欲而不肯存天理，那就用得着宋江的一句话：要“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非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可了。李逵要反皇帝，宋江就立刻撕破了骨肉情分的纱幕。几次要将他推出问斩。你看，亲亲热热的“哥弟称呼”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杀气腾腾的血腥叫嚣了吗？《水浒》在这里，从反面透露了宋明理学人性论的极端虚伪性、欺骗性和反

动性。

宋江投降了，便去打方腊。这体现了作者挥舞天理的屠刀对着不肯感化的人欲斩尽杀绝的意图。在《水浒》的作者看来，田虎、王庆、方腊一干人，公然“改年建号”，南面称尊，简直是一伙不肯“存天理，灭人欲”的魔君，这是非斩尽杀绝不可的。《水浒》诗云：“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劓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就是理学家的人性论的善恶观。按照这样的善恶观，革命、造反都是“恶”。方腊一伙人欲横流，都是一群没有天理的“恶兽”。《水浒》派宋江征方腊，也就是去屠杀人欲。宋江既是屠杀人欲的英雄，又是不断完善天理的天神，怎能不受到《水浒》的热烈颂扬呢？

“留与凶顽做样看”，《水浒》正是为我们提供了程朱理学人性论的一个典型样子。“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理学家们所主张的人性，即地主阶级的阶级性。在《水浒》中，这种地主阶级的人性被美化成至高至善的“天理”，说成是人生来就具有的本性。所谓“识性同居”，对于地主阶级内部来说，是要大家按照“天理”即地主阶级的纲常伦理来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而贪官、奸臣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不合天理，这就是《水浒》也要反一反贪官、骂几声奸臣的缘故。对于农民阶级来说，是要他们老老实实地跪倒在“天理”面前，连一点反抗的念头都转不得。如果有了要求革命的人欲，结果不是被感化，就是被杀灭。这就是《水浒》让一百零八个魔君“去邪归正”的缘故。所谓去邪，也就是灭人欲，所谓归正，就是存天理，而对不肯“去邪归正”的晁盖、方腊等人，则让他们死于刀箭。可见，《水浒》鼓吹“识性同居”一类人性论的货色，既是用阶级调和的说教阉割革命人民的灵魂，又是为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屠杀革命提供理论依据。

阶级调和的理论，历来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自己对广大劳动

人民统治和压迫的一个思想工具。从儒法斗争的历史来看，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或地主阶级的改革派，能比较公开地说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不隐瞒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儒家就不同，总是玩阴谋诡计，搞欺骗。儒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反革命的经验，逐步使自己的反动说教越来越精致圆滑。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程朱理学，把人性说成是“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结合，鼓吹人人心中都有个“天理”，把地主阶级的阶级性扩展成为全人类的人性，这就有利于论证地主阶级统治秩序的合理性。这种说法，比孔老二、董仲舒、韩愈把人性分成等级并且认为是不可更移的理论，欺骗性要大得多了。《水浒》这部书，写一百零八个魔君怎样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成为名垂青史的“忠臣义士”，去人欲这个“邪”，归天理这个“正”，就正是体现了没落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政治需要。昏庸的金圣叹不理解作者的苦心，武断地认为《水浒》是在写“恶”。有个叫做泷泽马琴的日本人就不同意，指出《水浒》是在“劝善惩恶”，“一百零八个魔鬼似的人物都改恶从善，成了宋朝的忠义之士”。这个说法，倒是确实反映了《水浒》作者的本意。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我们从这部反面教材中可以看到，人性论是投降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要狂热地鼓吹阶级调和论，鼓吹向压迫人民的反动派投降的思想。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搞投降主义的，也都是宣扬人性论的。从人性论出发，可以直接引出“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包括直接引出地主买办法西斯专政的理论。在当前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批判《水浒》宣扬的地主阶级人性论，批判形形色色的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调和思想，有助于我们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把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

翟 青

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深刻而尖锐地揭露了《水浒》中的宋江是地主阶级在梁山农民军中的代理人。

从表面上看，宋江和高俅的遭遇的确很不相同。高俅本是个破落户的浮浪子弟，被人告了一状而发配充军，成了人人厌恶的社会渣滓。他碰上了一个偶然的机，依仗一脚“鸳鸯拐”把自己踢上了殿帅府太尉的宝座，成了暴发户。宋江则相反。他自幼攻读经史，忠孝守法有名声，是个正统的官僚地主分子。谁知由于杀死阎婆惜吃了官司，落得个刺配充军的结果，不仅高升无门，而且性命难保，被迫上梁山当了“寇”。

宋江和高俅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分别代表了地主阶级内部的两派。宋江这一派在地主阶级中与高俅这类大狗、饱狗不同，属于小狗、饿狗一类，很不甘心于这种无权的地位。加上他们屡遭高俅这一派的打击排挤，受尽鸟气，就越加增强了对官职和权势的垂涎。《水浒》中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就正是地主阶级内部这种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

宋江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角逐中败下阵来，在地主阶级大大小小的山头中找不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为了保存自己以便日后东山再起，只得“暂借水泊里随时避难”，这就是他上梁山的根本动机。宋江虽然怀才不遇，牢骚满腹，但他一不怪皇帝，二不怨朝

廷，恨只恨“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他比奸臣为浮云，皇帝为白日，说什么“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日后必定“云开见日”，并以效忠皇帝、拨扫浮云为己任。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基础出发，决定了宋江必然要在梁山起义军内部推行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所谓“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就生动地表明了宋江选择的是一条“曲线求官”或曰“曲线尽忠”的道路。他的反贪官，反高俅，说到底，不过是为了排除“求官”路上的障碍罢了。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直接与梁山农民起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梁山起义大军攻打州府、横扫贪官的一系列斗争，引起了封建朝廷的惊恐。高俅这条在封建朝廷中十分得宠的恶狗，为了报答皇帝的青睐，第一个跳将出来，叫嚷着要用武力镇压梁山的农民革命。当他自己的兄弟高廉知府被杀之后，更是在皇帝面前大骂“梁山泊贼首晁盖、宋江，屡造大恶”，称之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说什么“若不早行诛剿，他日养成贼势，难以制伏”。一经皇帝准奏，高俅立即大兴三路兵，恶狠狠地扑向梁山，恨不得将梁山顷刻推向血泊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宋江和高俅的斗争也由原先的迂回曲折走向了短兵相接。这时，我们第一次听到宋江在指名道姓地叫骂：“高太尉那厮是个心地匾窄之徒，忘人大恩，记人小过。”为何宋江如此痛恨高俅？这是由于高俅血洗梁山的行动，严重威胁着他“曲线尽忠”的如意算盘，打破了他“专等招安”的美梦。

高俅的征剿梁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是梁山好汉们坚持晁盖的正确路线浴血奋战的结果。但宋江却不仅借此打击了自己的对手高俅，还百般笼络抚慰被梁山农民军俘虏的高俅走卒——彭玘、韩滔、呼延灼等，把他们从高俅一派中分化出来，壮大了自己一派的力量，使自己增强了同封建朝廷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宋江这个叛徒、内奸把梁山农民军所取得的胜利和功绩，作为他向封建朝廷投降的敲门砖和垫脚石，这是朴实的梁山农民英雄们在梦中

都没有想到过的。

宋江所处的梁山水泊不是清一色，高俅所在的封建朝廷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双方都在阶级斗争的大动荡中发生不断的分化和组合，形成五花八门的各种党派。在梁山，围绕着对封建王朝的不同态度，有革命派和投降派之分；在朝廷，围绕着对梁山农民军采取什么策略的争论，有征剿派和招安派之别。各党各派一个接一个登场表演，从而呈现出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起来的复杂画面。其中，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组成这幅画面的一条重要线索，它对各党各派都发生着严重的影响。

先看梁山内部的革命派和投降派。他们之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前者既反贪官，又反皇帝；后者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们终极的政治目的虽然不同，但是，在反贪官、打高俅这一点上却可以勉强地求得暂时的一致。混进梁山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另一派的实质。这样，他就把梁山革命派的视线转移到了高俅的身上，而不去注意同高俅一鼻孔出气的自己，掩盖了他篡权搞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就凭着这一招，宋江逐步转移了李逵、吴用、三阮等革命派反皇帝的大方向，同时也就逐步改变了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革命性质，使它成了宋江搞地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的工具。在梁山起义军的将领中，不仅林冲、杨志、柴进等人与高俅有血海深仇，史进和鲁智深等人也都分别从王进和林冲的不幸遭遇中看到了高俅的横暴狠毒。尽管这些人上山以后分别走着很不相同的道路，但在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中，都很自然地站到了宋江一边。

再看朝廷内部的征剿派和招安派。他们之间在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根本利益方面完全一致，而在对用什么途径和方法扼杀农民革命方面却存在着分歧。前者以高俅、蔡京、童贯、杨戩为代表，主张对梁山杀个痛快；后者以宿元景、赵鼎、崔靖、张叔夜为代表，主张以好言抚慰笼络宋江。他们“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

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双方争宠于殿前，加罪于对方，争来吵去，闹得不可开交。为什么要争吵？这是因为两派分别代表着地主阶级中不同集团的利益。哪一派的法子显了灵，哪一派就可以进一步增强自己这一派的地位和实力，从而使本集团压倒地主阶级中别的集团，在朝廷上声势烜赫地独揽大权。征剿派和招安派分别从自己一派的利益出发，各执一端，而皇帝则是主张两手并用，一半用花言巧语，一半用大军威胁。先是征剿，后是招安；招安不成，继续征剿；征剿之中，又搞招安。宋徽宗之所以一会儿支持征剿派，一会儿又支持招安派，反映他作为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是征剿派和招安派共同的后台。

既然征剿派和招安派对宋江的态度不同，宋江也必然对他们区别对待。宋江是个“吏道纯熟”的地主阶级分子，深知牧师和刽子手的两种职能是缺一不可的。但由于他走的是“曲线尽忠”的道路，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投靠了地主阶级中主张招安的这一派。早在梁山好汉闹西岳华山的时候，宋江就向宿元景私下吐露过：“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因此，征剿派不懂宋江的真实心意，招安派却深知宋江的用心良苦。以后，在征剿派和招安派的争吵过程中，宋江对自己的命运始终捉摸不定，惴惴不安。征剿派得势了，他提心吊胆，忧中夹愤；招安派得势了，他便喜从天降，笑逐颜开。其实，宋江的烦闷完全是多余的，九天玄女不是早就嘱咐过两句“天言”吗？“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这就是说，你宋江遇见“忠臣”宿元景是喜上加喜，即使碰见“奸臣”高俅也算不上是什么凶险。

为什么“遇宿重重喜”呢？如果说宿元景之流是在朝的招安派，那么宋江就是在野的招安派。一个在朝廷里策划招安，反对高俅为首的征剿派；一个则在梁山内接受招安，压制以李逵为代表的反招安派。梁山革命派和朝廷征剿派都反招安，但前者是坚持用革

命暴力镇压反革命，后者是坚持用反革命暴力镇压革命。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反招安。宋江面临着梁山内外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反招安力量，最好的出路就是巴结和笼络朝廷内的招安派，来它个里应外合，以实现受招安的阴谋。这样做，既瓦解了梁山的农民革命队伍，又压倒了高俅，岂不是一箭双雕。然后，带着这样一支改变了性质的农民武装去朝拜天子，为封建朝廷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用广大农民军的鲜血去换取自己的升官发财。你看，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举三得的了。

又为什么“逢高不是凶”呢？那就是宋江和高俅同属于地主阶级，都是农民革命的对象。他们之间所代表的派别利益虽然不同，但在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利益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宋江从征剿派对梁山的多次武力镇压中，看出了高俅是个在朝的实力派铁腕人物，便也动了勾结之心。我们从不准追杀童贯、乞求鄆美回朝善言解救、放走韩存保、党世雄到济州城向高俅转达“并无异心”等一系列活动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宋江的地主阶级本性。李逵、吴用、三阮等梁山英雄们浴血苦战，三败高俅，沉重地打击了北宋封建王朝；而宋江这个叛徒、内奸却在对付农民起义军、镇压革命派这一点上和高俅结成了联盟。就在梁山农民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宋江发布了一项命令：“如若今后杀人者，定依军令，处以重刑！”象高俅这样的梁山死敌，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可是，宋江见张顺水渍渍地将高俅提上山来，慌忙下堂，给他换上鲜衣美服，请上正座，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不仅如此，宋江还杀牛宰马，大摆筵席，执杯擎盏，殷勤款待，摇尾乞怜地说：“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老奸巨猾的高俅为了保命，佯装愿意回朝奏请降诏招安。这一下宋江感动极了，赶忙叩首拜谢。丑死了，丑死了。动不动就膝盖发软，完全是一副奴才相。请读者注意，宋江在这里所说的“救拔深陷之人”，倒确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只要高俅能同宋江一起合作搞

垮梁山的农民革命事业，他们之间就可以把宿怨一笔勾销。

然而，宋江和高俅毕竟分别代表着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派别，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不可能有片刻的停止。宋江为了实现投降的反动目的，把抓到手中的高俅放了回去。但高俅回朝却不履行诺言，不仅不奏请皇帝招安，还把萧让、乐和软禁在后花园里。这种情况表明了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争斗，同样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后来，由于朝中以宿元景为首的招安派暂时得势，使宋江实现了投降的宿愿，同高俅、童贯合伙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平田虎、诛王庆、讨方腊。但他们之间绝不可能因此就相安无事，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着狗咬狗的争吵。宋江为皇室卖力，残酷地屠杀农民起义军，在朝廷上本该论功行赏。但每次都遭到高俅这一派的阻挠和破坏，深恐宋江有功高升，灭了自己这一派的威风。最后宋江这个叛徒被天子封官授职，高俅一伙更是嫉妒万分。高俅对杨戩说：“这宋江、卢俊义皆是我等仇人，今日倒吃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却教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惹人耻笑？”你看，地主阶级内部就是这个样子，一派得势，另一派就不高兴，一个个都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最终，宋江还是给高俅的一杯毒酒毒死了，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纵观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实质上是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一场闹剧。而宋江只不过是这场闹剧中的一个“二丑”（俗称小花脸）。这种角色，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水浒》把宋江描写成“清官”和“忠臣”，用意也就在于此。宋江真的不“贪”吗？他所谓“济人贫苦，矜人之急，扶人之困”的大量钱财是哪里来的？他用以收买江湖义士的无数金银又是哪里来的？说到底，他之所以反贪官、抗高俅，还不是由于高俅这一派的“贪”妨碍了自己这一派的“贪”！在封建社会里，无官不贪，这是由地主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本性所决定

了的。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派别、集团，由于分赃不匀，有饱饿之差，并因此而发生了争吵。但在保护封建国家机器这一点上，这一群大狗小狗饱狗饿狗对主子的忠心程度并没有什么差别，一旦皇帝主子受到威胁，它们就一齐扑向了主子的敌人。《水浒》中的征剿派、招安派和投降派为了保卫封建王朝，聚集在一起共同对付梁山的革命派，不就是这样一种情景吗？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各种反动派“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但是，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代表不同集团利益的不同派别，或者是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具有着不同的估计，他们之间也有利害冲突，也会发生矛盾。从根本上说，地主阶级这一派同另一派的斗争，决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清官”也好，“贪官”也好，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宋江和高俅的区别，不过是笑面虎和青面虎的区别。笑面和青面之别，是现象；凡是老虎都要吃人，才是本质。人们不容易受张牙舞爪扑来的青面虎的欺骗，却容易被项上挂着数珠的笑面虎所蒙蔽，在这一点上，笑面虎往往比青面虎更危险，更毒辣。高俅的屠刀，杀不垮梁山的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欺骗却很快地瓦解了这支久经沙场、能征惯战的农民队伍。宋江起到了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正如鲁迅所说的：“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水浒》极力渲染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最终目的是为了肯定宋江对皇帝的效忠。小说的一开头就对赵宋王朝歌功颂德，接着又连篇累牍地吹捧“皇上至圣至明”。在第八十二回和第一百二十回中，《水浒》安排了两处天子骂贪官的情节。一处是当皇帝知道了童贯、高俅破坏招安又打败仗的真相以后，竟然大骂：“都是汝等不才贪佞之臣，枉受朝廷爵禄，坏了国家大事！”吓得童贯、高俅一度“不敢

入朝”，这大概就是宋江所盼望的“云开见日”之时吧！另一处是皇帝知道宋江死于高俅毒手的真相以后，也是怒不可遏地责骂高俅、杨戩：“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吓得“二人俯伏在地，叩头谢罪”。其实，高俅一派之所以能如此猖狂得势，正是因为有皇帝作他们的总后台。因此，怎么能够用天子骂贪官来把皇帝和贪官分割开来呢？毛主席说：“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封建官吏是皇帝的爪牙，他们沆瀣一气地共同组成了封建的国家机器。《水浒》不反皇帝，实质上就是不准反地主阶级的总头子，不准触动封建国家机器。相反，却用“好皇帝”“清官”一类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偶像来欺骗人民，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既然如此，这部小说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对地主阶级有利还是对农民革命有利，难道还不明显吗？

从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中，还可以看出一切反动阶级的内部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他们之间的这种争斗、缺口或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是十分有用的。毛主席早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就指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今天，我们在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作斗争中，同样应当如此。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被敌人营垒中间的争斗、缺口、矛盾所迷惑。修正主义者中的某些人，出于本集团的一党一派的私利，往往会声嘶力竭地反对属于同一营垒中的另一党一派，借以掩盖他们同革命人民的根本矛盾，从而运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在革命队伍内部干着许多善良的人们所意想不到的事情。刘少奇、林彪就都是这样一类人物，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而干着修正主义的勾当，同古代的宋江一样，是一伙现代的投降派。我们应当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增强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识别革命派和投降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能力。这样做，对

于我们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革命、反对投降，都有着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歌颂什么，反对什么？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

徐 绎 熙

《水浒》究竟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史诗，还是一部反对农民起义、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最近通过对毛主席指示的学习，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想在这里讲一点自己的认识。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阶级本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正是一条反对农民革命、鼓吹投降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线。反对所谓的“贪官”或“奸臣”，不正是为了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吗？《水浒》之反贪官，如同宋徽宗骂高俅等“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一样，立足点就在于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国家和一统天下。在《水浒》中，皇帝、天、朝廷（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概念。皇帝并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单个人，而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总代表。朝廷就是国家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皇帝与朝廷又都是以“天”的名义来实行统治的。不反皇帝，就意味着不反对地主阶级，不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专政和封建制度。宋江在受“招安”前是“替天行道”，也就是帮助封建统治者以“天”的名义实行其反动统治之“道”。“招安”以后，则打起了“顺天”、“护国”两面反革命大旗，打方腊去了。从“替天行道”到“顺天护国”，这也

正是《水浒》所鼓吹的投降主义的政治纲领。不反皇帝，那就必然要倒过来反对一切敢于“背反”皇帝和朝廷、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农民的革命。有个封建文人叫大涤余人的，说《水浒》能“化血气为德性”，起到“盗弭”的作用。“盗弭”者，制止和消灭农民起义也。这倒是一语道破了《水浒》这部小说的奥妙所在。

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水浒》有没有反映这一基本矛盾呢？没有。它写的是以宋江为代表的“忠臣义士”同以高俅为代表的“贪官”、“奸臣”的矛盾，也就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同那一派的矛盾。《水浒》正是用这样的矛盾抹煞和掩盖了阶级矛盾。《水浒》竭力鼓吹这样一种观点：地主同农民，在皇帝、朝廷、天以至“清官”、“忠臣”的问题上，是没有任何矛盾的，是完全一致的。皇帝是两个阶级共同拥戴的。换句话说，农民同地主一样，拥护封建制度，拥护封建统治，拥护地主阶级的反动专政；而地主包括皇帝在内，同农民一样，也是反对贪官和奸臣的。那末还有没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呢？没有了。农民还要不要再进行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呢？不需要了。所以“聚义”必须代之以“忠义”，而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也必须用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去加以“修正”。

正是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条投降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线出发，《水浒》对革命派和投降派、对地主官僚和农民阶级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请看书里的三种鲜明的对比：

一种对比是：《水浒》对待方腊和对待宋江的不同态度。《水浒》写了四支农民起义军。方腊、王庆、田虎这三支农民义军，都是不“替天行道”的，不受“招安”的，他们敢于造大宋皇帝的反，同大宋王朝唱对台戏。如果《水浒》真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话，那首先应该歌颂他们才对！尤其是方腊这支义军，其规模和影响都远远超过宋江那支队伍。可是《水浒》对他们采取的恰恰是彻底否定和深恶

痛绝的态度。谁给抓住了，都是千刀万剐。对方腊本人，更是竭力加以丑化。可对宋江这个投降派，则是千方百计加以美化：又是“呼保义”，又是“及时雨”；上应天星，下合童谣；天上有九天玄女保驾，人间有儒释道三教护法。朝廷之上，有天子眷顾，“忠臣”保举；四海之内，则英雄豪杰，闻名即拜。方腊在书中受尽唾骂，死则受剐三日示众，惨毒已极；而宋江生前鼎食，死后封神，受尽荣耀。《水浒》“有诗为证”：“宋江重赏升官口，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对比是何等强烈！爱憎是何等分明！《水浒》把宋江树立为“善”的典型，把方腊树立为“恶”的典型，分明是要人人都学宋江，不学方腊，要人们都象宋江那样生就一副奴颜媚骨，向封建统治者屈膝投降，并为之效忠卖命；而不要象方腊那样做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造反者、革命者。如果真能这样，岂不是就可以使农民起义消弭于无形之中了吗？

另一种对比是：《水浒》对待晁盖和对待宋江的不同态度。《水浒》对待梁山泊这支义军，也并不一律歌颂，而是有褒有贬。梁山义军中有革命派，有投降派。而《水浒》则是否定前者而歌颂后者。晁盖实际上就是梁山义军中的方腊。晁盖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灭了地主、官僚的威风，最后反上梁山，清除了王伦的关门主义路线，扩大起义武装，巩固了梁山泊根据地。对这些行动，革命派认为好得很，而宋江则认为是逆天大罪，法度难容，要灭九族。宋江的看法，就是《水浒》作者的看法。否定晁盖，正是为了肯定宋江。《水浒》把晁盖同宋江作了个比较：“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晁盖敢于托胆称王，“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这在作者看来当然是可怕得很，所以一定要让他及早死在地主武装的弓箭之下。而宋江不但恪守“忠义”，一意盼望“招安”，而且善于用“义”的锁链，把农民义军送进投降主义的死胡同。所以惟有宋江在梁山泊“把寨为头”，才能使作者称心，封建统治者放心。

有人或许会问，宋江不是私放了晁盖吗？不是把晁盖看作“心腹兄弟”吗？其实，私放晁盖不过是《水浒》为了美化宋江而加上的一笔油彩。这一情节把宋江打扮成梁山好汉的“救命恩人”，从而给宋江上山伏下一笔政治资本，为他将来篡夺梁山义军的领导权铺平道路。《水浒》处处用晁盖为宋江做铺垫，即使这样，作者还唯恐人们把宋江同晁盖等量齐观，所以让宋江一再申言他对晁盖的造反行为是反对的，他根本不愿同晁盖他们沾边，“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竭力与之划清界限。如果不是杀了阎婆惜，又碰上个黄蜂刺，他是宁死不肯上梁山的。所谓“心腹兄弟”，原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根本不是一条道。

第三种对比是：《水浒》对待李逵同对待卢俊义的不同态度。我们之所以要把《水浒》对这两个人的态度作个对比，是因为一个是出身雇农的真正的劳动人民，而一个是豪绅地主和大富商。李逵无疑是梁山义军中最富于革命性的农民代表，《水浒》却把他丑化成凶神恶煞，以杀人为乐。见了百姓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头儿砍将去”，甚至连来投梁山入伙的韩伯龙也被他杀了。又因为李逵是个贫苦农民，《水浒》就把他丑化成一个蠢汉，渲染他的粗卤和莽撞。甚至写他杀了人还吃人肉（杀了李鬼，吃李鬼的肉）。《水浒》写宋江、卢俊义等人，笔墨是何等庄重；而写李逵，用的完全是嘲弄的笔墨，故意引人发噱，连李逵下山接老母也嘲弄了一番，让老母给老虎吃了，事后宋江等人听了还“大笑”！我们透过《水浒》的丑化，分析李逵这个形象，不难看出李逵是当时真正的革命农民的代表，应该充分肯定他的反投降的革命立场，但是这位农民英雄在《水浒》中显然是被歪曲了的。请看《水浒》给李逵的一首诗是：“家住沂州翠岭东，杀人放火恣行凶，不搽煤墨浑身黑，似着朱砂两眼红。”从外貌到他的反抗性格，全都加以丑化。

与之相反，《水浒》对卢俊义这个豪绅地主的描写，却使用了种种美丽动听的语言来加以美化。卢俊义对农民起义怀着刻骨的仇

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他的“平生之愿”就是要把“贼首”“解上京师,请功受赏”。这样一个反动家伙,却被颂为“河北三绝”,“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连绰号也特别雅——“玉麒麟”(麒麟在封建社会是高贵的象征,是剥削阶级所谓的“祥瑞”)。《水浒》写卢的外表是“威风凛凛,仪表如天神”;写卢的性格是“忠肝贯日,壮气凌云”。《水浒》还特意通过宋江之口,摆了卢的三条好处:什么“有贵人之相”啦;什么“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啦;什么“力敌万人,博古通今,天下谁不望风而服”啦,真正到了十全十美、无以复加的地步。宋江这么说,以及他那“让位”的一番做作,一方面是要抬高卢的地位;一方面也是耍当着众人的面立下谁有资格当梁山泊的头儿的标准。如果你不是“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贵人之相”等等,那就靠边站吧。合乎这个标准的,除了他宋江和卢俊义,还能是谁?

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这是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着一部文艺作品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倾向。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对比中,就足以表明《水浒》歌颂的是地主豪绅,是混进农民革命队伍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反革命派;而反对的是农民革命和一切坚持起义、反对投降的革命派。这就说明它不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而恰恰是一部反对农民起义的小说。

有一种说法,认为《水浒》虽然写了宋江受“招安”,但却让宋江被毒死了,这说明《水浒》是批判和否定了宋江的投降的。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水浒》之歌颂宋江,恰恰就是要歌颂他的“忠义”和投降,所以连大涤余人也说:“《水浒》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其人忠义也。”“惟以招安为心”,所以才有九天玄女的“法旨”和天书;才要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号;才有七十一回“大聚义”时宋江领头的宣誓,以及宋江和燕青等人的东京之行……对这一切,《水浒》都是予以肯定和赞颂的。八十二回宿元景奉诏招安,《水浒》马上用一首诗来欢呼封建统治者

“怀柔”政策的胜利：“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知道怀柔胜征伐，悔教赤子受痍伤。”待到宋江投降以后，《水浒》更是大肆渲染宋江受“招安”的场面、过程和“朝京面圣”的“盛况”。宋江军马进京，宋徽宗率领百官亲临检阅，“喜动龙颜，心中大悦”，赞道：“真英雄也！”作者还硬拉上“东京百姓军民，扶老挈幼，迫路观看，如睹天神。”这能说是在批判“招安”吗？

至于宋江之死，书中写得很清楚，是因为高俅等看到天子“重礼厚赐”宋江，教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惟恐被宋江夺去恩宠和权力，所以才设计毒死他。这本来只是狗咬狗的斗争的延续。《水浒》对高俅等的计策，用诗评论道：“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批评的是“权奸”，歌颂的仍然是宋江的“忠义”。《水浒》写宋江吃了毒酒后，对天子、朝廷依然毫无怨言，一心想的依然是“忠心不负朝廷”，临死前还设计毒死李逵，为封建统治者除了这股危险的“黑旋风”，“尽忠报国”，可谓至矣！这样渲染显然是作者为歌颂宋江“为主全忠仗义”而最后添上的浓浓的一笔胭脂，至此，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才算是最后塑造完成了。这又怎么能谈得上是对宋江投降的否定呢？

《水浒》作者，经历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恐惧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企图通过《水浒》来传播地主阶级分子混进农民革命队伍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反革命经验。他之希望有宋江这样的“及时雨”，正如金圣叹之希望有个“嵇叔夜”，《荡寇志》的作者俞仲华之希望有个“陈希真”，本质上是一回事。不同的，只是《水浒》认为“怀柔胜征伐”，而金、俞却认为“征伐”胜“怀柔”而已。“怀柔”和“征伐”，本来是反动统治阶级交替使用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什么时候鼓吹“怀柔”，什么时候鼓吹“征伐”，则是由具体的阶级斗争的条件所决定的。《水浒》作者生活于元末明初，当时明王朝刚刚建立，所以重在“怀柔”，希望有宋江这类投降派来帮助明朝统治者消弭农民起义。金圣叹生活于明代末年，当时，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

义军席卷全国，明朝统治者“招安”、“征剿”的反革命两手都已失败，明王朝的覆灭已势不可免。在这种背景下，站在地主阶级反动立场上的金圣叹只能梦想有一个“神人”嵇叔夜出来把农民起义斩尽杀绝。俞仲华生活于清代后期，农民起义也已遍地掀起，他死时离太平天国革命只有两年，所以他也希望天上降下一个陈希真和陈丽卿来，帮助清朝统治者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但是不论他们在“怀柔”还是“征伐”的问题上主张有何不同，在维护封建统治、消灭农民起义这个目标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水浒》里“征剿”方腊时的宋江，也就是一个陈希真；或者说陈希真，也就是另一个宋江。不过，一个是公开的反动派，一个则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是不公开的、隐藏在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反动派而已。

《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有其一定的欺骗性，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才能透过假象认清本质。有比较才能鉴别。看看《水浒》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就是一种比较。对我们文学评论工作者来说，同样有一个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努力通过这次《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清《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认识什么是投降派，在斗争中逐步提高识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从而能更好地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将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读《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罗 思 鼎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根本目的是为了“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武训传》批判，是解放后政治思想战线上反对投降主义的第一仗。毛主席十分重视这场斗争，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毛主席在这篇社论的一开头就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这里说的根本的性质，指的就是影片歌颂了武训的投降主义路线，否定了农民革命的路线。对《水浒》和宋江的吹捧，是属于同样性质的错误。在社会主义时期，鼓吹投降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向地主资产阶级投降，在国外向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投降。毛主席严肃地指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不应该去歌颂投降派，不应该承认或容忍对投降主义的歌颂。

解放二十多年来，投降主义思潮总是不断地冒了出来，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停止过。在建国初期，毛主席批判了《武训传》和鼓吹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一九五四年又写了《关于红楼

梦研究问题的信》，批判了压制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投降的事件。一九五七年，党内的右派分子首先敲起《电影的锣鼓》——投降主义的锣鼓，配合国际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的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授意炮制《海瑞罢官》，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彭德怀翻案。毛主席又亲自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当前正在开展的《水浒》评论，同样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毛主席领导的每一次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都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在社会主义时期，投降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资产阶级为了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必然鼓吹向压迫人民的反动派投降的思想。刘少奇、林彪这些机会主义头子，是社会主义时期最大的投降派。他们在政治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理论上必然狂热地鼓吹阶级调和论，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投降主义思潮，既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又是为这条反动路线推波助澜的。刘少奇、林彪是投降主义思潮的总后台。每一次投降主义恶浪的掀起，都得到了刘少奇一伙的支持和怂恿。

革命队伍内部出现投降派和投降主义，也同样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背景，是反革命阶级政策和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最害怕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总是竭力散布阶级调和论，妄图模糊革命人民的阶级意识，磨灭革命人民的斗争锋芒，引诱和收买革命的败类。刘少奇、林彪这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在革命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们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发生动摇、妥协和投降。林彪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刘少奇叛变投敌，当了可耻

叛徒。当革命胜利发展时，他们又迎合了反动派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和平演变的策略，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从内部瓦解和葬送革命。

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投降主义路线，都是在革命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这篇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文章中，在告诫全党“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时提醒全党：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时，“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可见，投降主义在革命不利时或革命胜利发展时都有可能出现，而在后一种形势下出现的投降主义危害更大。社会主义时期同样如此。以《武训传》为代表的投降主义思潮，是在新中国刚刚建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形势下出现的。当时，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投降主义政治纲领，妄图取消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后，刘少奇炮制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投降。在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召开前后，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刻，林彪、陈伯达又抛出反革命的唯生产力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一次鼓吹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投降。这种在胜利形势下出现投降主义的现象，很值得深思。

投降主义的出现和泛滥，总是与阶级斗争的起伏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发展，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也越深刻。象武训那样公开的投降派，站在革命队伍外面来反对革命，还比较容易识别，欺骗性也较少。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美化和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就有越来越大的危险性。宋江与武训不同，他钻到

革命队伍内部篡夺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具有修正主义的特征。他在梁山起义军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大好形势下，把一支农民革命队伍改造成为封建王朝的御林军，起到了反革命暴力所起不到的作用。批判投降派宋江，有助于我们认识修正主义路线对革命的危害。因此，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政治思想战线上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阶级斗争的特点，决定了投降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围绕着《武训传》而展开的讨论，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武训传》的吹捧者却要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新跪倒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面前，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老路。当前正在开展的对《水浒》投降主义的批判，则是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斗争。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决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始终坚持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批判，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时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因此，我们必须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形形色色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

反对投降主义，并不是经过几次、十几次大的斗争，就可以一劳永逸的。一种已经批判过了的投降主义思潮常会重新登台，我们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革命还是投降、前进还是倒退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当一种投降主义思潮潮水般涌来时，能不能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无

产阶级革命精神进行抵制和斗争，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性的检验。在这里，重提《武训传》吹捧者的错误，并不是没有教益的。

在《武训传》批判中，毛主席针对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猖狂进攻和文化界出现的严重思想混乱，曾严厉斥责了那些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的人们，意味深长地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种向反动思想投降的教训，是我们应该永远引以为戒的。当然，投降主义思潮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它往往披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外衣，甚至打出革命的旗号，欺骗群众，给认识其真相带来了一定困难。同时，投降主义思潮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识别和批判了一种投降主义，并不意味着能识别、批判一切投降主义。有的人在批判一种投降主义时，不愧为勇敢的斗士，当面临着另一种形式的投降主义思潮时，却又成了俘虏。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这就向每一个革命战士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将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革命队伍中的有些人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问题。在这些人中，有些是被大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的同路人，当革命步步深入时，他们就想“到站下车”了。也有一些人，经不起反动派的欺骗引诱和糖弹的袭击，最后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堕落成为投降派。还有一些人，由于不能坚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能坚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对修正主义缺乏识别能力。他们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准备，头脑里保存的还是资产阶级的王国。因此当出现投降主义思潮时，就一拍即合。可见，如果在思想上当了俘虏，最后在政治上也必然成为俘虏，这中间是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的。

毛主席在《武训传》批判中，还从两种历史观的高度精辟地剖析了《武训传》吹捧者在思想上的根本错误，论证了投降主义的思想根源。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这里彻底揭露了《武训传》及其歌颂者的根本错误，是用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长期以来，在《水浒》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没有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忘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因而划不清革命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界限，甚至为错误路线辩护。《武训传》和《水浒》，都是以阶级调和论为思想基础的。《水浒》研究中各种错误观点的存在，证明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占领阵地，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还需要继续落实。因此，《水浒》评论要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特别要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结合起来。

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是代表资产阶

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是又一种形式的投降主义思潮。搞投降主义的人，他们总是要维护和复辟腐朽的旧事物，反对和阻挡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成长。宋江反对梁山建立的农民革命政权这个新生事物；武训否定和反对反帝反封建农民革命这个新生事物；彭德怀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新生事物。在今天，形形色色的反对新生事物，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教育战线刮的右倾翻案风，同解放以来历次投降主义思潮一样，是社会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党的九大、十大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但是，总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要否定这场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就是向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投降，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教育战线的这场大辩论，又一次证明了批判投降主义思潮的必要性。

只要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投降主义思潮就不会销声匿迹。我们党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从历史上看，我们党批判了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的投降主义，推进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又批判了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发 展。每当革命发展的重要时刻，毛主席总是提醒我们要警惕出现投降主义，将革命进行到底！从《武训传》批判到《水浒》评论，二十多年斗争的反复和曲折，告诉了我们一条真理：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继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深刻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自觉地掌握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将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

罗 思 鼎

《水浒》通行的本子原有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多种。明朝末年有个叫金圣叹的，把一百回本《水浒》拦腰砍了一刀，搞了个七十回本。此事一出，攻之者有其人，辩之者有其人，成了三百余年来的一桩公案。腰斩后的《水浒》有没有真实地反映了原作的面貌？为什么那么多人对此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

马克思主义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但金圣叹自己对腰斩《水浒》的事业是颇为得意的。他自我吹嘘说：“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①至于一百回本《水浒》、一百二十回本《水浒》，金圣叹说这些是假货，不真实，是“俗本妄肆改窜，真所谓愚而好自用

^① 《影印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第七十五卷第一页。

也”^①；只有他的七十回本《水浒》，才是真正的“古本《水浒》”^②，是真实的。

事实恰正相反，不真实的是金圣叹自己。他截去了《水浒》的后小半，杜撰了卢俊义“惊噩梦”一回，以稽叔夜杀尽梁山一百零八将作为尾声。鲁迅对此很不满意，专写了一篇《谈金圣叹》，批评七十回本是“断尾巴蜻蜓”，失去了“原作的诚实之处”，尖锐地指出：“他大概并没有什么古本，只是凭了自己的意见删去的，古本云云，无非是一种‘托古’的手段罢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水浒》的第四十二回是全书的纲。作者通过九天玄女的法旨，点出了全书宣扬投降主义的主题，规定了七十一回后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九天玄女对宋江说得明白：“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还留给他四句“天言”：“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七十回本《水浒》删去了四句“天言”，保留了“去邪归正”之前的内容。但既然砍掉了《水浒》的后小半，宋江失去了向宋王朝投降效忠的机会，前面大半部的思想发展线索也就落了空。这类漏洞在七十回本《水浒》中可说是大量的。金圣叹为了弥补漏洞，对《水浒》作了许多删砍；但砍来删去，毕竟无法砍掉《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题，结果只落得个全书破绽百出。金圣叹居然还自吹“更无丝毫未了之憾”，岂非自欺欺人之谈！

金圣叹声称他的这部断尾巴《水浒》忠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本意，这话也不真实。《水浒》的成书固然在元末明初，但其故事情节却渊源自南宋以来流行的传说，经过各种说话人历年来的添改，又经过杂剧的敷演，才逐步丰富和完整起来。无论是宋代的话本或者是元代的杂剧，都已经有了宋江受招安、打方腊的情节。到了小说《水浒》成书后，作者更是全力地歌颂和美化了宋江这个投降派。金

①② 《影印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第七十五卷第二十三页。

圣叹派定《水浒》的作者“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①，不过是证明他自己在发昏罢了。即使是在七十回本《水浒》中，尽管经过金圣叹的苦心删改，宋江与其说是个“倡众落草”的“盗魁”^②，还不如说是个忠心耿耿的封建奴才。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必然是受招安，打方腊。金圣叹让宋江在“噩梦”中被斩首，完全违背了原作者通过宋江来鼓吹投降主义的真实用意。

金圣叹本名人瑞，取号圣叹。又是“人”中之“瑞”，又受“圣”人赏“叹”，可见他是封建卫道士自居的。但是，他自以为对《水浒》的腰斩是代圣人立言，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意图，这却是又一个不真实。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由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不同而分成了不同的集团和派别。金圣叹本人由于得罪了某些官绅，在清代初年被牵涉进“哭庙案”而杀了头，就说明了他只属于地主阶级中的个别集团、个别派别。他的腰斩《水浒》，也不可能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意图，只能是代表了地主阶级中某个派别的利益。

历史是欢喜嘲弄人的。金圣叹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圣人之后，而不承认《水浒》中的宋江有充当封建卫道士的资格；封建阶级中却有人认为金圣叹是该死的异端分子，不承认金圣叹有充当封建卫道士的资格。金圣叹只是在卢俊义的恶梦中将忠于封建朝廷的宋江问斩，而金圣叹自己却活生生地遭到了他效忠的封建朝廷的问斩。金圣叹容不得宋江曾经投奔过梁山的投机举动，封建官府则同样容不得金圣叹“哭庙”的越轨行为。这种复杂而奇妙的情况，完全可以从阶级根源上得到解释。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政治派别，反映了它们之间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以及出身和教养的不同。只要这种差异和不同还存在着，各种不同派别的存在就是不可

① 《影印金圣叹批改贾华堂原本水浒传》第三卷第一页。

② 《影印金圣叹批改贾华堂原本水浒传》第三十九卷第五页、第二十二卷第一页。

避免的。地主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决定了它内部各派之间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上，必然地要进行着你死我活的争夺。金圣叹在明末从征剿派的立场出发，把为招抚派所欣赏的投降派宋江看作“异端”，非得让他在梦中杀头不可；清初的江南地方官吏从在朝派的立场出发，把在“哭庙案”中闹了一点小乱子的在野派金圣叹看作“异端”，也非得把他在刑场上杀头不可。金圣叹的“杀”宋江和他自己的被杀，归根到底，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争吵的结果。

二

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在当时及以后引起了一场不大的不小的风波，这实际上是一桩政治公案。它是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两派斗争的继续，即《水浒》中宋江与高俅斗争在现实生活中的继续。

高俅此人顽固而又昏庸。他反对“剿”和“抚”的交替使用，强调征剿而屏弃招安。金圣叹也是一个高俅。他只懂得杀戮而不懂得诱降，只要嵇叔夜而不要宋江。鲁迅深刻地指出：“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谈金圣叹》）嵇叔夜们的屠刀只能杀戮革命农民的肉体，宋江一类投降派的欺骗却能瓦解革命农民的斗志，它的作用是一百个、一千个嵇叔夜所代替不了的。列宁曾经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第二国际的破产》）在镇压和瓦解梁山义军这一点上，嵇叔夜执行的是刽子手的职能，而宋江则扮演了牧师的角色。如果把宋江们都杀尽了，让谁来充当抚慰和欺骗革命农民的反动牧师呢？何况，宋江在打方腊的过程中，证明了他在执行反革命刽子手的职能上，不仅不比嵇叔夜们差，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清代，凡是站在金圣叹一边的，大多是一批大大小小的官僚。他们都坚持镇压，反对招安。清初的封建小官僚王望如，就特别欣赏金圣叹用卢俊义的恶梦来做七十回本《水浒》的结尾，认为“有功于圣人不小”，使“盗贼不寒而栗”。^① 清朝道光年间的俞万春，也是口口声声“圣叹先生”，痛骂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是“伪书”，而将七十回本《水浒》吹捧成真正的“（施）耐庵之前水浒传”。^② 他强调“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③ 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部《荡寇志》与七十回本《水浒》相衔接，让祝家庄的后人把梁山的一百零八将杀得干干净净，用以证明“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④ 王、俞等人不能理解《水浒》通过宋江来宣扬投降主义思潮的真实用心，看不到也不愿意看到宋江这类混在农民军中的投降派与自己是同类人物。他们认为只有对起义农民斩尽杀绝，才能使革命人民“不寒而栗”，再也不敢造反。然而，这类人其实很昏庸。革命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反动统治者的疯狂杀戮，只会激起革命农民更猛烈的反抗。正如鲁迅所说的：“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但也还有更昏庸的，清初的归庄就是一个。他直截地认为《水浒》是“倡乱之书”，^⑤ 金圣叹又是腰斩，又是批注，反而抬高了《水浒》的地位，“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其罪不可胜诛矣。”^⑥ 在归庄的冬烘头脑中，除了封建经书之外，就是写八股文，什么《水浒》不《水浒》，干脆一把火烧掉就是了。金圣叹否定宋江但肯定《水浒》，归庄则既否定宋江也否定《水浒》，而且连金圣叹也一起给否定掉了。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分析。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两军对垒中，革命农民一方打的是红旗，封建统治阶级一方打的是白旗，

① 《评注全图增象五才子书》卷首《王望如先生评注图象水浒传总论》第一页。

②③④ 俞仲华：《荡寇志》，商务印书馆版第一卷第一页。

⑤⑥ 归庄：《归元恭文续钞》附录《诛邪鬼》。

壁垒分明,不容混淆。然而,宋江这类投降派打出的却是一面颜色杂乱的灰色旗子。说它是红旗,底里是白的;说它是白旗,表面上又是红的。《水浒》中的李逵、吴用等人没有看到红色底下的白色,误认了这面旗子,结果被宋江在梁山上用“替天行道”的假红旗、真白旗取代了晁盖的革命红旗,葬送了梁山的革命事业。金圣叹和他的拥护者只看到了它在白色上面涂着的红色,也误认了这面旗子,因此就砍去了《水浒》的后小半,用杀戮的结局来恫吓人们不再举起红旗。归庄这类人物则认为凡是与红色沾上了边的,不管这种红色是真是假,都应一律烧毁灭绝,以免人们引起对红旗的回忆。他认为金圣叹对《水浒》的删改是多此一举,最好的反革命法子是不承认世界上有过红旗,完全是一种鸵鸟式的态度。从《水浒》作者到金圣叹再到归庄,虽然同属于地主阶级的立场,但一个比一个反动露骨,也一个比一个更为昏庸。

赞扬金圣叹腰斩《水浒》的那些人物,并不全都昏庸,有人就看出了《水浒》原作的奥妙。日本资产阶级学者盐谷温赞扬金圣叹的腰斩《水浒》,“取了豪快的前半”,“为《水浒》吐其万丈的气焰”,^①称得上是金圣叹的海外知音。但仔细一追究,不对了,金圣叹反对宋江而盐谷温肯定宋江,这可是个很大的分歧。盐谷温肯定的是金圣叹砍过的《水浒》而并不赞成金圣叹砍《水浒》的本意。他与金圣叹不同,完全能够领略《水浒》通过宋江来宣扬投降主义思潮的苦心,但是他嫌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写出了宋江投降的全过程,未免太露骨了。而经过金圣叹这么一砍,使宋江在“梁山泊英雄惊恶梦”这一回中成了壮烈牺牲的农民英雄,不由得使盐谷温认为“是非常神韵缥缈而留着有无量的感慨的,确使一读不禁拍案叫快”。^② 是的,金圣叹这一刀砍下去的客观社会效果,是他本人在主观动机上所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他主观上想贬低宋江而客观上

^{①②} 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开明书店一九二九年译本第四一七页。

却抬高了宋江；他主观上误解了《水浒》的本意而客观上却发扬了《水浒》的本意。他不让宋江受招安，是为了使假红色、真白色的《水浒》剥落掉它的保护色；但结果在客观上却进一步掩护了《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和宋江的投降派真面目，使它们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就这样，昏庸的金圣叹对反动统治做了并不昏庸的事。盐谷温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然要“不禁拍案叫快”了。至于“拍案叫快”的原因还有点什么的，盐谷温没有说。但后来当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大肆进行反共投降活动的时候，有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说出了盐谷温所没有说出的话。他竭力吹捧《水浒》“对中国民族的研究是无可比拟的好材料”。①什么好材料呢？好就好在鼓吹投降。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扬言：“今天在重庆的蒋介石的情况，也和梁山泊末期宋江的处境和心情很有相同之处”。②看，《水浒》就是这样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当作对中华民族的败类进行诱降的“好材料”的。

三

在《水浒》中，宋江比高俅要狡猾。现实生活中的宋江们也比高俅们更难识破。清代地主阶级中那些反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人，就都支持和拥护宋江。早在乾隆年间，就有人重新捡拾起了金圣叹砍掉的那条尾巴，把它改名为《征四寇》而单独刊印，并说：“虽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改弦易辙，以善其修，斯其意固可嘉，而其功诚可不泯”。③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造反该杀，投降可嘉。清初还有个叫陈忱的封建文人，反对七十回本而赞成一百回本，同情投降派宋江。但是，他对一百回本《水浒》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这

① 井坂锦江：《〈水浒〉与中华民族》，一九四二年日文版第一页。

② 井坂锦江：《〈水浒〉与中华民族》作者序。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一二四页。

就是叛徒宋江最后被高俅毒死的结局，太令投降派气短了。为此，他写了《后水浒传》作为一百回本《水浒》的续篇，让燕青、杨林冒死混进金营去见宋徽宗，感动得皇帝当面褒奖“宋江忠义之士，多建功劳”，^①还让李俊等人受新皇帝宋高宗的册封，在海外称王，享尽荣华富贵，给《水浒》添加了一条光明的尾巴。但无论是拾取尾巴或者是添加尾巴，目的都是为了通过不同的方式去鼓励人们向投降派宋江学习，当顺民。软刀子割头不觉死，这是他们比昏庸的金圣叹要狡猾的地方。

在那些反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人中，也有人属于受骗上当的性质。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人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上，否定《水浒》的七十回本而肯定一百回本，赞扬《水浒》“纯重民权，发扬公理”，^②批评金圣叹的腰斩是《水浒》的“厉劫”。^③所以如此，这不仅是由于受了《水浒》假象的蒙蔽，把“只反贪官，不反天子”当作是反对“数千年之专制政府”；^④而且有着极其深刻的阶级根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娘肚子里带来了软弱性、妥协性和动摇性。原谅别人是为了原谅自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原谅宋江的妥协和动摇，就正是为了原谅自己身上的妥协和动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那种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和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的两面性格，决定了他们反对高俅而同情宋江，能够识别金圣叹这类反革命死硬派而不能识别宋江这类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投降派。这种特点，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将中国革命彻底进行下去，即使作为革命的同盟者，也是一个极不可靠的同盟者，常易发生妥协和动摇。

在这场关于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历史争论中，买办文人胡适

① 陈忱：《水浒后传》，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一四页。

②③ 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直隶官书局发行。

④ 蛮：《小说小话》，见《中国小说史料》，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三十七—三十八页。

是各类人物中最狡猾的一个。这种狡猾，在于他看到了宋江和金圣叹对反动统治都同样有用，爱前者也爱后者。他爱金圣叹，是由于他钦佩金圣叹的反革命立场坚决；但他更爱宋江，因为他需要宋江们和他一起来帮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①因此，他既欣赏金圣叹在《水浒》批注中所表现的死硬派态度，称赞他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②但是，又反对金圣叹的对宋江认友为敌，“处处把施耐庵恭维宋江之处都解作痛骂宋江”，^③责骂他“迂腐”、“可厌”。^④胡适对金圣叹责骂中夹杂着称赞、怨恨中掺和着怜惜的这种复杂心理，既有着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难言之隐，也反映了投降派所特有的共同苦恼。当年，胡适作为新月派首领为国民党反动派忠心奔走的时候，由于在对付革命者的策略上存在着分歧，曾经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误解，虽说幸免于金圣叹式的杀头，却也着实受了一阵惊慌，吓得赶紧在《新月》杂志上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总算保住了教授的职位。因此，胡适怨恨金圣叹“误解了《水浒传》的用意”，^⑤竟将属于同一营垒中的宋江问斩。但胡适又怜惜金圣叹的遭到清朝政府的误解，以致忠于封建朝廷的金圣叹竟死于封建朝廷之手。胡适当然也同情自己，为自己遭到反动主子的误解而感到伤心。凡属投降派，身上必定涂有保护色，这固然对于革命人民增加了欺骗性，但也每每容易引起同一反动营垒中伙伴们的误解，甚至误遭杀戮，岂不冤哉枉也！忠于反革命的宋江遭到了反革命金圣叹的误解，忠于封建朝廷的金圣叹遭到了封建朝廷的误解，忠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胡适及新月派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误解，这种团团转的走马灯式的历史现象，反映了反革命营垒中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②③④⑤ 《胡适文存》卷三《〈水浒传〉考证》。

四

在这场延续三百余年的争论中，各个不同阶级各个不同集团的代表人物相继登场，分别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这桩公案发表了很不相同的意见。争论的焦点，则始终在于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宋江这个投降派，如何看待《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思潮。长期以来，这场争论基本上停留在反革命营垒内部。尽管有的肯定金圣叹而否定宋江，有的肯定宋江而否定金圣叹，有的既否定宋江又否定金圣叹，有的既肯定宋江而又肯定金圣叹，说法五花八门，但其共同目的，都是为了镇压革命人民，只是在反革命策略上存在着某些分歧而已。

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参加了这场讨论以后，才使这场争论具有了革命和反革命两派对垒的性质。鲁迅在一九二九年发表了《流氓的变迁》，在一九三三年发表了《谈金圣叹》，不仅深刻地谴责了金圣叹顽固的反动立场，而且剥掉了宋江这类投降派身上披着的革命画皮，与胡适既爱金圣叹又爱宋江的反动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鲁迅尖锐地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流氓的变迁》）

鲁迅批判古代反动派，正是为了批判现代反动派——胡适及胡适式人物。在反革命营垒中，宋江与高俅、《水浒》作者与金圣叹，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反动物物。在这两类人中，鲁迅着重批判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是革命营垒中的投降派而不是反革命营垒中的死硬派。金圣叹这类反动的死硬分子，其反革命言论和行动是公开的，赤裸裸的，较易被革命人民所识破。而对革命最危险的，是以革命派面目出现的投降派，冒充着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主义。这种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革命，比公开的反革命要更隐蔽、更虚伪、更狡猾，同时也更富有欺骗性。正因如此，鲁迅一再提醒革命人民要对这类人物提高警惕。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水浒》及宋江之流仍被继续得到吹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大量评论，几乎都违背鲁迅的论述，美化和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六十年代初期，当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时，学术界还曾经刮起过为金圣叹翻案的歪风。修正主义者欢迎在《水浒》问题上的认识混乱，因为这种状况有利于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投降、倒退。当古代的投降派在书籍、舞台、银幕上耀武扬威的时候，人们是不容易识破现代的投降派的。

但是，这种状况再也不能允许它继续存在下去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并使鲁迅对《水浒》的论述得以重新阐明并被提高到了反修防修的高度。

毛主席用极其精辟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断定了《水浒》这桩公案。但只要有阶级斗争在，有投降派和投降主义思潮在，有修正主义在，《水浒》就仍然还会有翻案的可能。历史上，定了案又翻案的，中国有，外国也有。列宁、斯大林定了苏联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案，但赫鲁晓夫一上台，就立即翻了这个案，并为此而重新修改了苏联党的历史，为其篡党、篡政和全面地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这种定案和翻案的斗争将贯穿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全过程中。然而，只要革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

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深刻地认识了投降派及投降主义思潮的危害性及其各种表现，修正主义要翻案也就难了。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这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罗 思 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冒出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水浒》热。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的一期《人言》周刊宣称：《水浒》“近来流年大利，布克夫人把它译成了英文，美国报界的批评，竟把它称为东方荷马的著作。这件事又不是我们夸嘴，人家倒把我们抬得高高在上。”翻翻三十年代出版的书刊，就可发现《水浒》的走运，倒不仅在于洋人的抬举，中国人自己夸嘴的也实在不少：既有各式各样的评论，又有稀奇古怪的续作，煞是热闹。

《水浒》为什么在当时会有红得发紫的命运？这决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情。三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即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蒋介石亲自在南昌召开了“剿匪”会议，从此开始，对红色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大围攻。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

反动派“围剿”革命力量，总是代代袭用“老谱”。明初施耐庵总结了宋代以来反动统治者的“围剿”经验，写出了《水浒》，供封建统治者袭用。但袭用者也在被人袭用。过了几百年，蒋介石的爪牙们怀着与当年《水浒》作者颇相类似的心境来向《水浒》伸手了。

最早发现《水浒》可以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所用的，是新月派的祖师爷胡适。一九二九年，胡适和他的“新月派”伙计梁实秋、罗隆基、徐志摩等人已公开投靠独夫民贼蒋介石。这年

他写了《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强调《水浒》的主旨在于：“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这分明是为蒋介石提供了一条通过镇压革命来维护蒋家“天下”“得太平”的道路。到了年底，蒋介石通令全国，招募鹰犬，说什么“凡属嘉言，咸当拜纳”。胡适急忙忙地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奉送《新月》杂志，托他“转赠介石先生”，盼望“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其实，这些“言论”无非是：“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如此“嘉言”，自然属于“拜纳”之列，这就难怪后来蒋介石亲自召见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了。

蒋介石“拜纳”新月派“嘉言”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蒋帮嫡系的CC派特务闯入了文学领域，直接参与文化“围剿”。这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特务、军警也一眼看中了《水浒》。CC系“反动十教授”之一的萨孟武，在一九三三年初抛出了题为《〈水浒传〉与中国社会》的长篇论文，并在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的《中央时事周报》上连载了十七期，被该刊的“卷头语”吹嘘为可以“醒心豁目”的“好文章”。“好”在哪里？好在它污蔑中国历史上起义的农民都是“流氓”，梁山义军是“流氓所组织的团体”；好在它鼓吹农民起义的灭亡“可以使社会秩序愈见安定”。萨孟武还大谈祝家庄、曾头市地主武装的“反抗精神和反抗实力，实胜过官军百倍”，借此强调要重视发挥地主乡团武装的作用。这与其说是在讲《水浒》，不如说是在直接讲法西斯主义的军事和政治。

声名狼藉的鸳鸯蝴蝶派也挤了进来。一九三三年的《新江苏报》，连载了鸳鸯蝴蝶派喽罗程善之的《残水浒》。这个十分拙劣的续写本，虚构了梁山将领互相残杀的情节，咒骂梁山群盗“末日将至”，借以发泄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革命的仇恨。《残水浒》从卢俊义恶梦惊醒开始，到梁山陷落后宋江等三十六人逃到海州被张叔夜擒获告终，淋漓尽致地渲染了反革命武装镇压的成功。《残水浒》的作者，和其他许多鸳鸯蝴蝶派分子一样，与反动当

局的关系不如胡适、萨孟武之流密切，因此一再标榜“超脱”政治，宣称“于世事一切淡泊”，其实对世事是未能忘情的。他苦心炮制的这部书，不就是赤裸裸地在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张目吗？

以上三种人的评、续《水浒》，“围剿”的杀机溢于言表。但在当时我们还能听到另外一种腔调。例如那个“徙倚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林语堂，就是装着一副“滑稽”、“幽默”的笑脸来参加“围剿”、谈论《水浒》的。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专门张罗消遣、闲适的笑料用以冲淡凶恶“主子”的血腥气，磨灭人民的革命意识，称得上是一批机灵乖巧的文化走狗。他们谈《水浒》，谈金圣叹，往往也是说说笑笑地来宣扬超阶级的“情义”。其中有一篇《孔家店与梁山泊》的文章就说：“孔子之待子路，与宋江之待李逵，也同样的有情义有见识。”一个“情义”，把投降派宋江和反投降派李逵拉在一起；一个“见识”，又流露出对宋江笼络人心的阴谋的赏识和赞扬。自命潇洒的论语派不屑谈论刀兵，但却殷勤地向反动派献上了用孔孟之道拉拢和腐蚀革命者的阴险计策。

与林语堂关系极深的，还有一个美国女传教士。她本叫布克夫人，又取了个中国名字叫赛珍珠。这个外国资产阶级作家也看中了《水浒》。她把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水浒》译成了英文，并且把书名也改为《人皆兄弟》。这个新书名，提炼了她要想从《水浒》中获取的东西。“人皆兄弟”，是论语派“情义”说的发挥，其源盖出于阶级调和论。赛珍珠还在论语派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吹《水浒》“这部小说的伟大就在于不受时间的限制。无论古今，此书仍旧是不可磨灭的真理”。什么“不受时间的限制”？什么“不可磨灭的真理”？大概就是指《水浒》宣扬的阶级调和与投降主义理论，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都用得着吧！鲁迅一看到译书出版，就尖锐地指出：“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鲁迅的话，戳穿了古今中外反动派借《水

浒》宣扬阶级调和、取消革命斗争的诡计。

论语派谈情说义，赛珍珠称兄道弟，其精神又被一个叫姜鸿飞的体现到《水浒》续作中去了。此人写了一本二十万字的《水浒中传》。他称《水浒》一书“直可宝为国粹”，但又惋惜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是个“上半身”，陈忱的后传四十回是“下部两只脚”，缺少了“中间一段肚子和小腹”。于是，他自己动手写了三十回使其上下衔接。这部《中传》自卢俊义惊噩梦起，至阮小七还石碣村止，着力渲染张叔夜“不重杀戮”，“能化干戈为玉帛”，是“仁者之师”；又深情赞扬宋江“受了招安，为国家服务”的赤诚之心。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用一杯毒酒把宋江推进坟墓的情节，在《水浒中传》的末尾基本保留下来了。但姜鸿飞别具心裁地在宋江死了之后，又装添了阮小七母子的一场对话。阮小七听到朝廷用毒酒药死宋江、李逵等人，怒气勃勃，拍案而起，要带兵杀去东京。这时，作者通过小七妈的嘴说了一通“忠心报国”的道理，又讲了一番“孝道”，吓得阮小七“双膝跪地”，再也不敢造反了。

我们只要把三十年代的这股《水浒》热作一鸟瞰，就会发现，这中间大体也是两派：胡适、萨孟武等借《水浒》发泄“灭绝强盗”的血腥欲望，林语堂、赛珍珠等则借以宣扬“不重杀戮”的菩萨心肠。看似针锋相对，其实相辅相成。

“不重杀戮”，这只是说给单方面听的。请看在《水浒中传》里，“不重杀戮”这句话让张叔夜去说，却要阮小七去做，这实质上是让阮小七去投降封建统治阶级。姜鸿飞“杀戮”阮小七，用的不是刀枪，而是孔孟的“孝道”。依此类推，论语派说的“情义”，赛珍珠说的“人皆兄弟”，也都具有同样的功用。试想，与人人讲情义，视人人皆兄弟，还革什么命？参加了革命的，也只有忏悔、投降一途。姜鸿飞一心想要使阮小七这样的革命者向封建朝廷、反动军队下跪，但这又谈何容易，于是他来了一个过渡，先让他向“孝道”下跪。其实，哪一个革命者向所谓“情义”、“人皆兄弟”之类的说教下跪了，

那他的革命生涯也就终结了。阶级调和必然引导到阶级投降。所以，这帮子声气柔和的“调解者”，实际上是以诱降派的身份参加了反革命“围剿”。

诱降派并不排斥用刀枪杀戮革命者。或者说，诱正是为了杀。当诱过来的革命者身首异处时，他们往往就不提那些甜蜜的口号了，因为这些口号的使命早就完成。所以，诱降派就是荫蔽的杀戮派，有时还可能转化成公开的杀戮派。胡适就经历了这个转化过程。此人在很长时间内和林语堂一流一样，一直以贩卖外国资产阶级“民主”、“博爱”、“人权”为己任。这一切活动，说到底，是在对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队伍进行诱降。与此相适应，他在二十年代评论《水浒》时，着重强调了宋江投降朝廷、效忠皇帝的可贵。但这些宣传，一方面未能阻挡革命队伍的前进，很不解恨；另一方面又未被反动当局所理解，颇感委屈。因此，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武装斗争风暴蓬勃兴起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借《水浒》考证，一语道破了多年来惨淡经营的目的——“灭绝强盗”。此言一出，便和刽子手蒋介石、CC派特务抱成了一团，成了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骨干。事实上，胡适所一语道破的，也就是林语堂、赛珍珠之流隐藏在心底的目的。

杀戮派也并不完全拒绝使用诱降的办法。在这一点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反动派要比三百年前的金圣叹高明得多。即便是那个《残水浒》作者程善之，尽管用他的笔让整个梁山起义军淹没在血泊中，却也津津乐道地描写过宋江的投降和反动当局的诱降、纳降。在他写到宋江托人向蔡京递交“悔罪呈子”的地方，该书的一个批注者批道：“宋江悔罪的呈子较诸某君永不革命的甘结如何。”这里说的“某君”，显然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出卖革命的叛徒。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连嗜血的刽子手也会耍弄一点小诡计，甚至鼓吹起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诱降作为主要职责。恶霸论善，军阀参禅，这是屡见不鲜的。

姜鸿飞与程善之同属于鸳鸯蝴蝶派这批封建余孽，续写《水浒传》也仅迟程二年，为什么会一改程善之的凶相毕露而变为娓娓动听的道德说教呢？这正反映了反动派在不同形势下对反革命“围剿”策略的不同选择。程善之写《残水浒》是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在屡遭失败后正在策划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因此特别强调了反革命武装镇压；而姜鸿飞写《水浒中传》的一九三五年夏，毛主席亲自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早已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人斗争在发展，农民斗争在深入，学生运动掀起了高潮，各支革命力量汇合成为强大的革命洪流。蒋介石阻截失败，用兵无功，转而加强政治攻势，指望着中国共产党内出宋江一类投降派。所以，《水浒中传》拚命赞扬宋江“但知服从政府命令”，妄图诱使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广大革命人民，都来服从蒋介石的“政府命令”，抛弃革命，甘作“顺民”。这说明在紧密配合反动派的政治需要方面，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一场镇压人民革命的“围剿”，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水浒》，就这样地把各种反动派的利益和命运连结了起来。尽管其间交替泛滥着屠杀的血腥和诱骗的谎言，但由于这两种东西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激烈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它们的一致性，两派之间也几乎没有引起过什么争执。浩大的革命风涛使社会上的各种人按照各自的阶级利益重新分化和组合，既使革命队伍更加精粹而坚强，也使反革命营垒发生巨大的变化。“五四”以来思想文化界派别纷纭，但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高等华人”、学者教授竟和他们历来瞧不起的文化渣滓——鸳鸯蝴蝶派合流了。这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洋奴文化与封建文化两股浊流的汇合。其时，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萨孟武等人封建“本位文化”的主张正在展开论争，但在吹捧《水浒》、参加反革命“围剿”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十分吻合。“全盘西化”的提倡者竟一头拜倒在《水浒》这本典型的封建文学作品面前，有力地证明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

古思想必然要结成反动同盟。

胡适等人向封建文化投降，目的是为了迫使革命人民和革命文化向他们整个反动阶级投降。这一点很符合蒋介石本人的心愿。当时他亲自策划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也就是一个破烂武器的收集运动。蒋介石为了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以孔孟之道为核心，东抓一点，西捞一把，煮成了一锅反动思想文化的大杂烩。派什么用？蒋介石自己供认是“以道德的复兴，来求民族复兴”，“主要目的在革心”。所谓“道德复兴”，就是要重建被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兜售“忠孝仁爱”一类儒家货色。所谓“革心”，就是要把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人们的头脑中挤出去，把法西斯主义对着人们的头脑灌进去，以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民众中精神的堡垒”。

“新生活运动”从目的到手法，同《水浒》的基本精神很相类似。所以，当时有不少人公开鼓吹《水浒》“端的是一部提倡新生活的宝书”。《水浒中传》的作者还直言不讳地说：宋江“这种服从政府的忠诚和不畏死的人格，实就是现行新生活的精义”。不错，蒋介石正是希望中国大地上多长出一批宋江来，希望大家都象宋江“服从政府”那样去服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象宋江“尽忠”“不畏死”那样去为国民党蒋家王朝卖命。于是，三十年代的《水浒》热和“新生活运动”就紧紧地胶合在一起了。

有反动就有进步。有投降派就有反投降派。反动派的屠刀既阻挡不住人民革命的步伐，诱降阴谋也决不会完全得逞。高俅、童贯、张叔夜的“围剿”没有扑灭宋代农民革命的烈火，《水浒》同样地也没有能挽救明王朝的覆亡。尽管胡适等人捧着一本《水浒》一再咒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灭绝”，“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击退

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也揭穿了形形色色的诱降阴谋，他在敌人软硬兼施的包围中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表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不屈服是可贵的，更可贵的是他深刻地批判了敌人“围剿”时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武器。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文人掀起《水浒》热的时候，鲁迅顶住了这股反动潮流，对《水浒》作了一系列的批判。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明确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剥掉了奴才宋江的画皮。这也是三十年代对《水浒》的最有力的批判。

然而，并不是一切人都能经得住敌人的“围剿”。与鲁迅形成鲜明对比，革命营垒中也“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瞿秋白就是一个典型。他屈服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终于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潮流中沉了下去，成了一个可耻的投降派。反动派培植一个投降派，总是从思想上的诱降入手。瞿秋白在政治上的堕落，也自有他的思想根源。早在一九三二年七月，瞿秋白就同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水浒》热相呼应，赞扬《水浒》“是一部名贵的文学典籍”。他还提出过这么一个口号：“要勉励个个作家努力去做施耐庵”。可见他与施耐庵宣扬的投降主义颇有共同语言。例如，他曾说过农民“没有皇帝不能过日子”，又说过农民的“政治要求，就是‘青天白日’（清官和好皇帝）”。这种谬论，同《水浒》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如出一辙。既然不反皇帝，不触动反动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那还要革命干什么？不解决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就难免一攻就破，一诱便降，在敌人的“围剿”面前迟早要露出马脚。所以，瞿秋白在一九三五年被捕以后，战战兢兢地在监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声称他参加革命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象宋江一样，上了梁山便只想下梁山了。

三十年代的《水浒》热，从反面提供了一块试金石。它在整个阶级斗争中区分着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又在革命营垒中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硬骨头和软骨头。鲁迅在同竞相吹捧《水浒》的反动文人的斗争中百炼成钢，越战越强；瞿秋白从妥协走向了叛卖，被滚滚前进的长江大河抛弃掉了。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辩论和围攻，锻炼了鲁迅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三十年代是这样，在今天以及将来也还是这样。只要反动的思想文化存在一天，只要修正主义思潮存在一天，我们就必须坚持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与一切投降主义思潮作不调和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必将在斗争中获得发展。这就是我们的信念。

《水浒》与“国防文学”

红 宣

《水浒》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它在三十年代国民党反革命“围剿”时期所交的好运并未见衰。不过，那些赞颂《水浒》的文章，已经从“服从政府”转向“民族性”之类的题目了。同时，又有一批打着“国防文学”新招牌的《水浒》续作叫卖过市。有一个鸳鸯蝴蝶派文人说：“要充分描写异族欺凌，和中国男儿的抗战意思”，“北宋末年的情形，最合选用”，而“用水浒人物”又最能写出“理想中情事”。这话说得不错。在当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条件下，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水浒》，无论是对于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王明之流，还是对于鼓吹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无疑都是再“合适”、再“理想”也没有的了。

早在二十年代，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胡适就提出了《水浒》有着“民族性”的说法。他在连篇累牍的《水浒》考证中，强调《水浒》寄托着“故国之思”、“种族之痛”，表现了“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宿怨”和“心理”，把投降派宋江打扮成“民族英雄”。象胡适这样的洋奴、卖国贼，也居然在那里大谈《水浒》的“故国之思”、“种族之痛”，岂非咄咄怪事？原来，他看中《水浒》，就是为了利用《水浒》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而一些《水浒》的续作者要“用水浒人物”写“理想中情事”，不仅是因为《水浒》“深入民间”，“可以引起读者兴趣”，更重要的是《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与“国防文学”一脉相连，可以使他们搞民族投降“自圆其说”。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北宋时期的宋辽、宋金战争，是中国境内契丹族、女真族贵族集团和汉族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于契丹族和女真族都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具有较大的掠夺性和破坏性，因而遭到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十分激烈的。《水浒》的欺骗作用之一，正是在于它通过对历史的篡改，用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它把“扫除边患、报效国家”作为宋江投降的重要理由，让宋江在菊花会上哼出了“统豺虎，御边幅”，“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的词句，以粉饰他“愿天王降诏，早招安”的叛卖行径，甚至恶毒地用反对投降的吴用想投奔辽国来反衬接受招安的“爱国”意义。它还让宋江在征辽时打了个大胜仗，使这个投降派俨然成了一个“民族英雄”。但是，这同金圣叹删去后半部《水浒》一样，是不真实的。北宋末年，真正抵抗外族掠夺和侵扰的主力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以宋徽宗赵佶为头子的封建朝廷则是“主和派”的大本营。只有冲破反动王朝的阻挠，开展反对大地主阶级腐朽统治的阶级斗争，才能真正抗击外族的侵扰。宋徽宗跪倒在外族贵族集团脚下当了儿皇帝，“一生只信忠义二字”的宋江还不是只能当汉奸吗？然而，正因为宋江是打着“御边幅”、“平虏”的旗号去瓦解农民革命的，是通过阶级投降的途径曲折地走向民族投降的，在那些妄图出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眼中，在那些妄图借口民族斗争来取消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国民党反动派眼中，就成了非常“真实”的、非常有用的东西。可见他们鼓吹《水浒》“是一部伟大的民族作品”，这绝不是偶然的。

当然，《水浒》所以被他们看得那么“理想”，不仅因为《水浒》用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更重要的还是《水浒》所宣扬的“忠义”可以为阶级投降锻造思想武器。《水浒》中宣扬的投降主义是通过“对‘忠义’的维护来实现的。”“忠义”就是要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王

朝，《水浒》中的宋江就是用“忠义”的绳索把梁山好汉一个个缚给了朝廷，绞杀了轰轰烈烈的梁山革命事业，又用“忠义”的屠刀镇压了方腊起义。宋江不过是人格化了的“忠义”观念。

四十年代吹捧《水浒》的文章和《水浒》续作中鼓吹的投降主义，也是通过宣扬“忠义”来体现的。在四十年代初有一本名为《水浒新传》的《水浒》续作，虚构了宋江等人受张叔夜招安后北上“勤王”抗金的故事。作者说，他的这部作品是为“抗战”而作的，因而书中的“忠义”也就染上了一层现代色彩。小说中张叔夜致宋江信中说，“忠君重于爱国？”换句话说，要“爱国”就得“忠君”，因此，要“抗战”就得接受招安，成为“国军”（这个现代名词在书中是一再出现的）。“爱国”与“忠义”划上了等号，爱的就决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国，而是以“赵官家”为首的大地主阶级反动统治集团的国，也即作者心目中的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按照这样的逻辑，梁山起义军顺顺当当地成了“赵官家”的“勤王军”，“在尊王攘夷的狂澜里，去立下名垂不朽的勾当”了。

如果说《水浒》塑造了宋江这样一个人格化了的“忠义”观念，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复活了陈独秀尾巴主义的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之流就是现实的“忠义”迷。他们公然对抗毛主席提出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鼓吹“统一作战，统一指挥”，而为了求得所谓行动的“统一”，又首先必须进行思想的“统一”，于是《水浒》中的“忠义”观念就很用得着了。他们按照蒋介石一手导演的“新生活运动”的“统一”乐谱，唱起了“忠义”的老调。那个曾经卖力兜售“国防哲学”、“国防文学”的陈伯达，就照搬当年胡适的腔调，起劲地鼓吹《水浒》“是一部伟大的民族作品”，把《水浒》所宣扬的忠、孝、仁、义吹嘘为中华民族的“极高的美德”。他在另一篇题为《新人生观的创造》的文章中，更是大谈其“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怎样“尽忠”、“尽义”呢？他自己做过一个很好的注脚：“只要于抗战上有利益，我们对于自己的同胞怎样折节

忍辱都是可以的”，比如为了乞求抗战而“在市府门前跪一夜”，“这样的‘委曲求全’和‘卑躬屈节’的风格”，便是“为民族而知大义，识大体”的“伟大的人格”。请看：委曲求全、卑躬屈节、直到双膝下跪，这就是他们标榜的“大忠”“大义”。《水浒》和《水浒新传》中的宋江用“忠义”把梁山农民军“统一”到地主阶级那里去，成了“赵官家”的“勤王军”，而王明、刘少奇、陈伯达这批现实的宋江，则是企图用“忠义”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改造成为蒋介石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勤王军”。这样的“国防文学”，只能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尽忠”，为蒋介石的法西斯小朝廷“设防”。

党内投降派借口“忠义”背叛革命，党外的反动派则用“忠义”召唤投降。两者是相互呼应的。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他们惧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决定将力量由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紧接着又连续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动条文，并于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〇年春，集中反动军队先后向陕甘宁、晋西南和晋东南等地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攻。在思想战线上，则大搞什么“国民精神总动员”，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他们还大肆贩卖“忠、孝、仁、义”，强调用孔孟之道“辟邪说，正人心”，是“纠正”“错杂思想”之“唯一手段”。正是这种缘故，《水浒》中的“忠义”便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垂青和利用。各种《水浒》续作和其他“国防文学”一起卖力地响应着这个“总动员”。一部《水浒新传》，写的就是梁山头领如何屏弃所谓“江湖上的小忠小义”，树立起“大忠大义”。作者故意让梁山起义军中三阮、朱贵这批农民出身的头领去充当敢死队，以“上报朝廷大恩”，“洗去往年杀人放火的罪过”。当他们为“赵官家”拚命而身负重伤生命垂危时，又让他们临死前发出过去“走错了路”，“于今自己也被人开膛，却不是报应”的忏

悔。那个被描写成最懂得“忠义”的关胜则跑出来正颜厉色地说死得好，可以给后人做做“榜样”，“教那班为匪的，都来跟我们效忠国家”。这番话显然是说给共产党听的。

历史告诉我们，“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那些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人，实际上是“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他们向来把剥削阶级利益看得高于民族利益，当他们的阶级私利与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卖国的道路。蒋介石就曾露骨地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他们是死心塌地卖国到底，“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向这类人物尽忠尽义，结局只能是跟着他们一起向异族侵略者投降。《水浒》有意掩盖了这一点，而《水浒新传》却无意中把它点穿了。书中写到徽、钦二宗投降金人以后，宋江“上体圣上议和苦心”，听任金人蹂躏祖国大好河山，根本不敢出战，说什么“逞了血气之勇，却误了国家大事”。好一个“国家大事”，说得明白一点不就是“投降大事”吗？阶级投降与民族投降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忠臣”听“圣上”的，“圣上”听“金人”的，忠于“圣上”必然发展到忠于“金人”。这就叫“君为臣纲”，“上体圣上苦心”吧！可见，无论是阶级投降还是民族投降，它们的思想基础都是“忠义”：在《水浒》中，“忠义”是“替天行道”，忠于皇权，接受招安，并为了皇帝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在《水浒新传》中，“忠义”则表现为“尊王攘夷”，为了皇帝忍辱负重，直至做出“最大牺牲”。既然“平盗”、“攘夷”都是以“尊王”为转移的，当皇帝需要苟且偷安的时候，又必然跟着去投降外族贵族集团了。阶级投降主义必然导致民族投降主义，从这种意义上说，“忠义”又是连接这两种投降的纽带。正是在这根纽带上，《水浒》、形形色色的《水浒》续作同“国防文学”攀到了一起。

然而还有走得更远的。那就是直接用“忠义”为侵略者和汉奸

辩护了。在另一本《水浒》续作《水浒外传》中，就塑造了一个具有所谓人性的“侵略者”——金将占罕。这个文学形象实际上是蹂躏中国河山的日本侵略者的化身。小说竟让阮小七的女儿萧桂英为了解救花荣的儿子花逢春出险，舍身嫁给占罕；嫁到金营以后，萧桂英渐渐发现“占罕是个好人”，因此既爱花逢春，又爱占罕。对于这样一个毫无民族气节、出卖灵魂的汉奸，作者居然还要让顾大嫂对她大大歌颂了一番，肉麻地吹捧她在收复石碣村中的“功绩”和“贡献”，把她美化成“民族英雄”和“护国娘娘”。这里的萧桂英宛然又是一个赛金花。如果与赛金花有什么不同的话，只在于这个萧桂英最终还是陪同占罕服毒自尽了，临死前还对花逢春念着“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诗句，表达了她做汉奸就得做到底的决心。这样的“救亡”之作，究竟是爱国主义的还是卖国主义的，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忠于皇帝，背叛革命，到为了皇帝去“平盗”及“勤王”，到跟着皇帝向异族投降，这就是“忠义”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中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必然归宿。从“忠义”既可以引出阶级投降主义，又可以引出民族投降主义。《水浒》就是这样的一部为一切投降派所信奉的圣经。评论《水浒》，有助于我们识别投降派的丑恶嘴脸，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到底。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余秋雨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胡适一生曾陆续写了七万字左右的《水浒》考证和评论文章。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



胡适评《水浒》，屡屡提起金圣叹。但他对金圣叹的态度非常特别：一方面，好象对他意见大得很，说“他的迂腐气比三家村学究的更可厌！”^①他“无中生有的主观见解，真正冤枉煞古人！”^②甚至公开声明自己“不赞成金圣叹的《水浒》评”；^③另一方面，他又盛赞金圣叹对《水浒》的评论“何等眼光！何等胆气！”^④说什么“圣叹的辩才是无敌的，他的笔锋是最能动人的”，“在小说批评界，他的权威直推翻了王世贞、李贽、钟惺等等有名的批评家。”^⑤讲的是同一个人对同一本书的评论，为何态度悬殊若此？

①② 《胡适文存》710页。

③ 《胡适文存》711页。

④ 《胡适文存》704页。

⑤ 《胡适文存三集》656页。

一贬一褒，各有原因。骂金圣叹，是因为“他误解了《水浒传》的用意。他不知道七十回本删去招安以后事正是格外反抗政府。”①请注意胡适用的“误解”这个词。如果《水浒》是一部反抗政府的书，删改后“格外反抗政府”，就谈不上“误解”；如果金圣叹是一个反抗政府的人，主张删掉招安的内容，也不能算“误解”。恰恰是一个忠于封建政府的人在一部忠于封建政府的书上做了这么一件蠢事，才使胡适恼怒。

列宁曾经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②但是，并非反动统治阶级里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对这两种社会职能的认识和运用全都一致。金圣叹与《水浒》的作者就有分歧。一部《水浒》，着重描写了封建朝廷的两种“牧师”——捧着“丹诏”的宿元景和张叔夜，举着“杏黄旗”的宋江和卢俊义，如何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安慰”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农民起义军，“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的。金圣叹生活于农民起义的震天雷霆和反动统治者“招安”失败的消息不绝于耳的明末清初，捍卫封建朝廷的迫切心情使他特别强调刽子手的职能，而对牧师的职能方面取了怀疑的态度。他的主张，如鲁迅指出的，是“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③他于是删掉了《水浒》中“招安”的情节，把这个“杀尽”的“梦想”加了进去，作为结局。

两个结局，哪一个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胡适赞赏未经金圣叹删改过的那一个：

① 《胡适文存》764页。

②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638页。

③ 《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五卷121—122页。

“最末的部分，——平方腊班师之后——还有几段很感动人的文字；如写鲁智深之死，燕青之去，宋江之死，徽宗之梦，都还有点文学意味。”①

方腊被“平”，梁山泊起义军死的死，走的走，——即两支起义军在拚耗中同归于尽，当然要比金圣叹仅仅扫荡一个梁山泊的设计更为毒辣，更为彻底，这是一；更重要的是，金圣叹的设计，虽然露骨地表达了反动统治者绞杀人民革命的无耻欲望，但正如鲁迅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②要使这个欲望得以实现，并非容易，因此连金圣叹也只能把它放在“梦”里来发泄，而梦想的力量总是虚弱的，不真实的。胡适欣赏的这个结局，则是用先“抚”后“剿”、“抚”此“剿”彼的阴险手法达到的，不仅反动的艺术效果远比一个梦想来得实在，而且还向反动统治者提供了两种社会职能交替使用的反革命策略。难怪胡适会从中获得“感动”，寻得“意味”。

投降派是反动统治者运用两种社会职能的重要工具。金圣叹“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表明他的怀疑“招安”，与不重视宋江一类投降派有关。胡适责怪他不仅自己恨宋江，而且以为《水浒》也在骂宋江：“他看错了，以为七十回本既不赞成招安，便是深恶宋江等一班人。……处处把施耐庵恭维宋江之处都解作痛骂宋江。这是他的根本大错。”③胡适认为，金圣叹的这个“错”，与写《荡寇志》的俞仲华“是很相同的”。俞仲华也不同意朝廷去“招安”“强盗”，甚至不许宋江们投降，所以索性用他的笔把他们杀戮干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辩，丝毫不容假借！”事情是那样耐人寻味：投降派宋江“假借”革命以尽忠皇帝，本来是用以欺骗起

① 《胡适文存三集》654页。

② 《三闲集·论“大观”》，《鲁迅全集》第四卷116—117页。

③ 《胡适文存》764页。

义军的，结果竟连反动营垒中头脑僵化的死硬派也给骗了。他们不认识自己方面派出的内奸，打了一场“误会仗”。为此胡适要反骂他们“迂腐”，并竭力把他们从宋江头上摘下来的那顶“忠义”帽子，重新戴到宋江头上去。他郑重引述《水浒》最后写宋江临死还“不愿坏了我忠义之名”，为怕李逵再反而把他毒死的情节，说这“可算是《忠义水浒传》后三十回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一节最好”的“哀艳的文章”。^①而且对陈忱写的《水滸后传》中凡延续《水浒》投降主义的部分，尤其是皇帝称赞宋江为“忠义之士”的部分，也极赞“精彩”。^②总之，胡适躲躲闪闪地向自己营垒里的人们暗示，要透过宋江“假借”的伪装看到他的“忠义”本质，别把他“冤枉”了。胡适的这个暗示应引起我们的警觉。金、俞之辈只看到宋江的伪装而攻他，我们有的同志只看到宋江的伪装而捧他。因此，胡适批判金、俞的“认友为敌”，客观上也从反面批判了某些同志的认敌为友。

胡适把金圣叹和俞仲华归为一类，同时又把自己引为《水浒》作者的知音，一再宣扬唯我发掘出了作者的“本意”。看来，几百年来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领域，对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态度也无非是这么两派。金圣叹的删，俞仲华的续，都是在与施耐庵、罗贯中派进行着一种不象争吵的争吵。胡适的考证，则是在二十世纪延续了这场争吵。但不能忘记：作为反动营垒内部讨论如何对付农民起义的一场论争，他们之间不乏共同语言。此中情形，很象《水浒》中宿元景、张叔夜与童贯、高俅两派在皇帝面前的争论。因此，胡适不仅不从根本上否定金圣叹和俞仲华，而且一想到他们的“迂腐”出之于对农民起义的刻骨仇恨，就十分能体谅了。他在《〈水浒传〉考证》的末尾说：

“不懂得明末流贼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

① 《胡适文存》788—789页。

② 《胡适文存二集》217页。

见解何以这样迂腐”。“不懂得嘉庆道光间的遍地匪乱，便不懂得俞仲华的《荡寇志》”。①

刚才分明还在嘲弄他们，一下子又翻成笑脸，用所谓“历史上的关系”来为他们辩解了。好象在分析历史原因，实际上完全是根据反动的政治标准和唯心史观玩弄着实用主义的魔术。金圣叹反招安，胡适说他是因为“亲见明末流贼伪降官兵，后复叛去，遂不可收拾”，②完全能理解；金批本虽然有点“迂腐”，但迂得妙，腐得奇，是“永不会磨灭的奇书”；③腰斩《水浒》转眼之间也成了一件“大胆”的美事：“他大胆地把七十回以下的文字全删了，又加上卢俊义的一个梦，很明显地教人知道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④实际上，金圣叹“教人知道”的这个反动逻辑，也是《水浒》的主旨，胡适的信条。他们分歧再大，斗争再烈，也不会改变“灭绝”革命以求地主阶级专政的“天下”“太平”这个共同理想。基于此，“招安”派与“征剿”派，投降主义的宣传和斩尽杀绝的主张，完全能、而且必然会统一起来。请看，胡适的耳目一触及燃烧于历史长途和现实土壤上的人民革命烈火，不是马上就把《水浒》的著、删、续、考诸家拉成一家，“好一个强辩的金圣叹”⑤也变成“圣叹的辩才是无敌的”了吗？

二

胡适把金、俞围绕着《水浒》的一系列反动作为几乎都说成是

① 《胡适文存》766—767页。

② 《胡适文存》765页。

③ 《胡适文存》760页。

④ 《胡适文存三集》656页。

⑤ 《胡适文存》765页。

一种时代需要，人们不禁要问：你胡适的那么多篇《水浒》考证，产生的时代原因又是什么？他自己曾这样教训读者：“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①好，那我们就看看这些“考证”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作用吧。

胡适评《水浒》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五四运动以后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拍天的巨潮开始低落，浓重的乌云压顶而来，这种时候，总“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胡适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叛变出来的代表人物，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彻底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则是他叛变的继续。他选中这样的时期写《水浒》评论，无非是两个目的：为反动派镇压革命献策，为自己投靠反动派辩护。

胡适写《〈水浒传〉考证》和《后考》的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在经历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和《新青年》发展去向的争夺战之后，已经明显地开始分化。两次斗争，都牵涉到如何看待现存制度和现存政府的问题。鲁迅曾明确地表示要坚持令旧物彻底崩溃、让“官场总是头痛”^②的战斗方针。胡适从资产阶级右翼的立场出发，对自己曾投机参加过的运动竟发展成了如火如荼的人民革命，感到十分懊丧和害怕。因此一再想方设法地消蚀“五四”的斗争锋芒，告白自己对人民革命的仇视，一再向反动当局透露忏悔之心，投降之意。最后甚至公开以宋江自比，连写混迹五四运动这段经历的回忆录，也干脆名之为“逼上梁山”。既然如此，他在两篇《水浒》考证中若隐若现地强调了同情镇压、主张招安这两层意思，亦非偶然。有趣的是，他在文中还特地引了忠于朝廷的宋江反被朝廷所害的情节，论证《水浒》作者是把自称“不幸失身于罪人”而后“归顺”的宋江当作“功臣”来写的，并说这中间有

①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24页。

② 鲁迅书信：1921年1月3日致胡适。

“一种真的感慨”。^①其实，有这种“感慨”的，与其说是作者，不如说是胡适自己。他是多么希望政府当局不要因自己的一度“失身”而误了现代的“功臣”！

很巧，胡适写完此文的第二年，不仅北洋军阀政府没有误了他，连那个早被中国人民唾弃了的末代皇帝溥仪，也向他招手了。胡适一口一声“皇上”地在紫禁城里接受了多次召见。进行了不少次“非外人所能知也”的密谈。被“皇上”召见的次年，一九二三年，胡适又写了《〈水浒续集两种〉序》。人们发现，文中最长、最注目的一段引文，竟然就是《水浒后传》中燕青、杨林见道君皇帝的情节！皇帝当面褒扬“宋江忠义之士，多建大功”，要“重加褒封立庙，子孙世袭显爵”；而被皇帝称作“草野忠臣”的燕青则不断“伏地谢恩”，杨林出来后还深深地忏悔道：“我们平日在山寨，长骂他（皇帝）无道；今日见这般景象，连我也要落下眼泪来。”^②紧接着这段引文，胡适评论道：

这一大段文章，真当得“哀艳”二字的评语！古来多少历史小说，无此好文章，……古来写皇帝末路的，无此好文章！^③

行文出奇的强烈，感情出奇的激动，使人不能不怀疑：他在“草野忠臣”见皇帝的情节中，或许又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寻得了自己的足迹，找到了自己某种感情的寄托？

此后，胡适一直以“草野忠臣”自居，聊谈“自由”、“人权”于殿外，且又献媚取宠于朝廷。一九二九年六月，正当蒋介石在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的反革命政权站住脚跟没多久，胡适

① 《胡适文存》789页。

② 《胡适文存二集》215--217页。

③ 《胡适文存二集》217页。

又要评《水浒》了。这次写出的《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对金圣叹的评价越加升级，特别是对他“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的反动思想更是大吹特吹。此外，重新强调《水浒》末尾写宋江效忠皇帝的部分“很感动人”。^①要了解这篇《水浒》评论的现实意义，可以注意一下此后不久发生的两件事情：一是蒋介石向我红色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二是蒋介石电召胡适晋京谒见，“对大局有所垂询”。从此，人所周知，胡适逐渐从“草野忠臣”变为蒋家王朝的“朝廷命官”。

总之，镇压人民革命的建议一次次由《水浒》评论中发出，投靠反动朝廷的愿望一次次由《水浒》评论中表达。这一系列事件的巧合也许有偶然性。但正如恩格斯指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②此中规律就是：现代的反动派必然要从古代反动派那里吸取扼杀革命的统治经验，现代的投降派必然要从古代投降派那里继承卖身求荣的精神传统。

是规律就不会仅仅适用于一时一事。作为一个帝国主义一手培养出来的买办文人，胡适一生所作的各种投降主义宣传都要归结到投降帝国主义。因此，《水浒》评论也是他宣扬民族投降主义的一项间接工具。既然他鼓吹“尽忠天子”已不是真对“大宋皇帝”而言，那末，这个“天子”的身份也就可以不断更替：可以是北洋军阀，可以是溥仪，可以是蒋介石，当然，也可以是帝国主义头子。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写过一首以“主君寿百岁”为结句的歌词，“主君”正是指美帝国主义。抗日战争前夕，胡适曾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出过“招安”整个中华民族的策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③更是完

① 《胡适文集三集》654页。

②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3页。

③ 《日本人应该醒醒了》，《独立评论》42期。

全在尽忠日本天皇了。

换言之,《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叩于外国主子的台阶之下。帝国主义者对此是很能心领神会的。一九四二年,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学者”在看了《水浒传》后自称“几度拍膝叫绝”。为什么?因为他从中看出:

“今日居于重庆之蒋介石的立场等,也颇似梁山泊末期宋江的境遇”。①

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也即是宋江与皇帝的关系。《水浒》不正按着胡适的心愿,很自然地引向民族投降主义上去了吗?难怪这个日本“学者”要特地交待:“水浒传正如胡适氏所言,是感情的思想的产物”。至于是什么“感情”,何种“思想”,不言自明。胡适曾想用“民族主义”的烟幕蒙住读者的眼睛,说宋江们躬行的投降主义至少有“勤王救国”的价值。可惜他自己及其主子蒋介石以无可掩饰的卖国生涯作了最好的回答。帝国主义者也从侧面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只有人民,才是民族利益的真正捍卫者。“勤王救国”与“勤王卖国”之间,则无深沟高垒。凡投降派,“大军一到,便受招安”。——反动朝廷的“大军”到了是如此,异邦别族的“大军”到了也必然是如此。

三

懂得了胡适考证和评论《水浒》的这一系列政治目的,我们就

① 井坂锦江:《水浒传新考证》,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

能进一步理解他在《〈水浒传〉后考》一文的末尾说的这么一段话：

我为了这部《水浒传》，做了四五万字的考证，我知道一定有人笑我太不爱惜精神与时间了。但我自己觉得，我在《水浒传》上面花费了这点精力与日力是很值得的。^①

这是在故弄玄虚，自我卖弄。但却又清楚地表明了一个投降派对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是何等的重视。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敌人重视的东西，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而应该针锋相对，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更好地识别、批判和战胜投降派，我们也不妨学一学敌人，在评论《水浒》上舍得花费点“精力与日力”。

胡适早在几十年前就预感到了马列主义是投降主义的大敌。因此，在那马列主义开始传播的年代，他诱骗人们“自己虚心去看《水浒传》，不必怀着一些主观成见”。^② 这里所谓“主观成见”者，显然是指他所厌恶的“主义”——正确的思想武器，革命的世界观。后来，他索性一语道破，声称他搞小说考证都是为怕读者“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而提供一些“防身的本领”。^③ 在《水浒》考证上他“防”来“防”去，就是“防”马列主义对投降主义的批判。敌人的言行从反面显示了马列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原则区别，大概也可以使那些总喜欢把投降主义解释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们头脑清醒一些吧。真理和谬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

① 《胡适文存》800页。

② 《胡适文存》762页。

③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24页。

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流曾拚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胡适的一大堆《水浒》考证和评论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末，无产阶级将永远象感谢《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一样感谢它们。

论《水浒》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反动作用

康 立

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泡沫浮动在上面，深流潜伏在下面。泡沫是假象，深流才是本质。但即使是作为历史本质的深流，其中也还存在着旋涡和逆流，充满着种种矛盾面复杂的现象。

要正确认识《水浒》在农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就必须注意不被泡沫之类的现象所迷惑。《水浒》原是一部“官书”，曾经由明代的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大量刊印，但这部“官书”又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中，有不少人袭用了“黑旋风”、“活阎罗”一类《水浒》人物的绰号，或者是干脆袭用宋江、柴进等《水浒》人物的姓名。甚至当各路起义部队会合之时，也模仿了“三十六营”、“七十二营”这一类梁山式的组织形式。他们这样热衷于袭用《水浒》人物的“服装”，反过来又给《水浒》披上了“农民革命”的“服装”，引起了对《水浒》的各种不同评价；有的说它“酿成”了“盗贼蜂起”的“惨祸”，有的说它鼓舞了后代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这两种看法看似截然相反，实质上却有其相通之处。从认识论上来看，它们都是只见泡沫，不见深流，引导人们在现象上兜圈子。

泡沫是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它不象深流那样地扎实和稳固。《水浒》对明末农民战争的影响，这是泡沫；明末农民战争本身才是历史长河中的深流。然而，泡沫又是本质的反映，因为它是

历史潮流和反动逆流冲突的结果。《水浒》之所以会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发生影响，就反映了在明末农民战争的革命洪流中，潜伏着种种旋涡和逆流。在明末农民起义队伍中，有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地主、官吏及其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的接受《水浒》的影响，有的不受影响。即使从受《水浒》影响的人中来看，有人喜爱反对招安的李逵，有人则崇拜屈膝投降的宋江，这说明了《水浒》对各种人物的思想影响是很不相同的。

明末农民战争的发展是一个曲折的波浪形前进的运动过程。在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起义队伍的阶级阵线还不甚分明，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都是把反贪官作为具体的斗争目标。地主阶级中的这一派为了反对另一派，打出的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旗号。革命农民由于对封建朝廷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往往也是从惩办个别贪官污吏或土豪劣绅出发而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的。明末农民起义的发难者王二，最初就是为了反对澄城知县张耀采的横征暴敛，发出了“谁敢杀张知县？”的号召。虽说看起来同样是“反贪官”，但是，革命的起义农民和《水浒》中的宋江们却具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对于前者来说，反贪官是革命的开始，最终必然要从反贪官走向反皇帝，用革命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封建统治的目的；而对于后者来说，反贪官是“革命”的终点，他们时刻准备着向封建统治者投降，妄图通过对起义农民队伍的改造和利用，以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从表面上来看，这两种人似乎具有共同的出发点，但两者不仅造反的动机不同，终极目标不同，发展的道路也完全不同。前者是明末农民革命洪流中的主流，而后者则是革命洪流中一股暗藏着的反动逆流。当革命初起时，双方由表面上的一致掩盖了实质上的不一致。但随着明末农民革命洪流的向前推进，特别是当整个封建统治受到威胁的时候，双方的分歧便很快地公开化表面化了。前者必然要坚决冲破《水浒》的束缚，后者则要把起义纳入《水浒》规定的模式。正是在这种

情况下,明末农民军中出现了不少叛徒,而明王朝的不少人如杨嗣昌等,也都以招安作为征剿的重要辅助手段。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汹涌前进的革命洪流决不是任何反动逆流所能阻挡得了的。历史的发展表明:不是《水浒》把明末农民战争引向梁山泊的结局,而是明末农民战争用气势磅礴的力量冲破了《水浒》规定的投降主义模式。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其起义的初期,由于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类反动思想的束缚,长期停留在劫富济贫的阶段,表现为流氓寇主义的政治思想。但是,革命实践的发展推动着李自成起义军进一步纯洁自己的队伍,战胜和克服了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崇祯十三年前后,李自成开始“据有城邑”,确定“名号”,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并明确地提出了“均田”“免赋”的政治纲领,制定了向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进军战略方针。这标志着明末农民战争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飞跃。李自成起义军用大顺农民革命政权取代了崇祯皇帝为头子的封建政权,用革命的实践否定和批判了《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这个事实证明:农民革命的发展是同《水浒》影响的大小成反比例的。革命农民只有战胜了《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才能把革命不断推向深入。

大浪淘沙。明末农民战争如同大海的怒涛,不仅冲垮了一个明王朝,而且把革命队伍中各种人物的嘴脸区别得清清楚楚。李自成和“飞山虎”刘国能、“翻天鹞”高杰,他们出身于同一个阶级,又一起参加了农民起义,最后却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李自成最初在王左挂部下。王左挂投降了,李自成却拒绝投降,参加了张存孟领导的起义军。张存孟投降了,李自成又投奔了坚持起义的高迎祥。他始终坚决反对投降,抵制了《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显示出农民革命领袖的英雄本色。刘国能、高杰原来都是李自成的部下,后来,这两人先后都投降了明王朝,成了农民革命的可耻叛徒。原来属于同一个革命派别的人们,就是这样地随着革

命的深入而一分为二了。刘国能、高杰本来属于农民阶级，在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竟和敌对阶级同流合污，变成农民起义军的死敌。刘国能其人，“性颇孝，就抚，乃奉其母命也”，俨然又是一个“孝义黑三郎”。他降敌后死命攻打农民起义军，甚至在被李自成活捉后还顽固地说：“朝廷既赦我死，又加爵命，万死何辞！”活现出一副叛徒的丑恶嘴脸。高杰在叛变后也专门同农民起义军作对。清初封建文人顾苓说：高杰之流在《水浒》成书三百年后，“闻风而起，始于盗贼，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他把《水浒》作者看作是农民革命叛徒的教唆犯，倒是颇有一点眼力的。

明末农民战争中英雄和叛徒的尖锐对立，反映了对于《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思潮的不同态度，直接可以导致究竟是坚持斗争到底还是中途妥协投降的两种不同结局。不仅如此，即使同样是农民革命领袖，由于对投降主义思潮抵制和批判程度的不同，也会影响到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表现和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出张献忠来作为例子。据历史上的记载，“张献忠之狡也，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本来，《水浒》对某些战斗如“三打祝家庄”的描写，其中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农民起义军从中吸取若干作战经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由于张献忠没有把“埋伏攻袭”的战术同《水浒》的投降主义主题严格区别开来，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又接受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影响。他曾经称赞所谓“清官”方贡岳说：“使人人不爱钱如公，献忠何自作贼！”这里显露了《水浒》在他思想深处的深刻烙印。就象河流的行进常会出现回折或弯曲那样，张献忠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弯弯曲曲的。他对明王朝抱过幻想，接受过“招抚”，并企图劝说李自成也接受“招抚”。张献忠的这一步走错，不仅使自己掉进了旋涡之中，并使整个明末农民战争一度转入了低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路线错误。当时，明王朝采取了“招抚”一派、镇压另一派的策略。宋江投降了，宋王朝要他去打方腊。明王朝也企图迫使张献忠“杀贼自效”，用

“袭击”李自成的行动来表明他投降的诚意。但是，张献忠毕竟不是宋江，他拒绝解除武装，拒绝攻打李自成等其他起义军。在敌人这个反面教员的教育下，张献忠终于在革命实践中识破了明王朝“先抚后剿”的诡计，克服了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走过了一个“之”字形的道路之后，重新举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汇合进革命洪流而又一起前进了。这个事实又一次生动地证明：只有战胜《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才能真正坚持革命斗争到底而使革命不致半途而废。

毛主席说：“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弯弯曲曲的革命道路上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不仅要求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需要我们不断提高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武器，从相似的东西中找到区别点，又从某些貌似两极的东西中找到其共同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泡沫在水面上的浮泛，看出水底深流中所出现的旋涡或逆流。《水浒》确实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它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反动作用，从反面教育了革命的人们；不管经历多少高山险峻，不管出现多少江曲河湾，革命潮流终将一泻千里地奔向光明的前途，这是谁也无法遏止的。

李贽与《水浒》

——李贽思想杂谈

陈旭麓

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间，我到福州参加李贽《焚书》《续焚书》注释讨论会，会后去泉州参观了李贽故居。

故居在泉州市南门万寿路，是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平屋。三四百年来，它经历了无数变迁和几易主人，现仍保留着清末修葺后的式样，列为保护文物。李贽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三十岁后，即流寓河南、江苏、云南、湖北、河北等省，“惊风日夜吼，随处足安居”，^①过着飘零江湖的生活，很少回到这里来。然而人们出于对这个曾在思想战线上作过英勇斗争的历史人物的重视，仍把这里作为研究他早年活动的重要遗物。

李贽活动于明代十六世纪的历史舞台，已是封建社会后期，为什么在日趋没落的地主阶级中还会产生象李贽这样敢于斗争的进步思想家？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最近，大家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评论《水浒》的批示，对同《水浒》有很大关系的李贽作进一步分析时，又提出他的活动和思想到底是在拆庙还是在补天？感到也很难下结论。

为了说明问题，我想还是要从他的故居上推到较远的年代谈

^① 李贽：《答袁石公》，《续焚书》卷五。

起。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它的初建到没落的漫长岁月,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①。早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法家,他们的斗争目标,在于推翻奴隶制,建立新兴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国家,不断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期的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在于继承和发扬法家路线,实行政治改革,维护统一,反对分裂,防止分封制的复活。他们反对什么,赞成什么,是很明白的。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早已丧失了历史的进步作用,完全成为腐朽没落的阶级;出身于这个阶级的法家思想家的进步性,就不是防止什么奴隶主复辟力量了,一个新的趋向,是必须走向他们自己的反面,从他们自己那个营垒里冲杀出来,敢于去拆封建制度的庙。只有这样,才体现了向前看的进步倾向。因此,不是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中能不能产生进步思想家政治家的问题,而是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后期,由于农民起义的频繁袭击,促使地主阶级内部加速分化,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进步思想家。

这种历史现象,不独封建社会后期是这样,奴隶社会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后期也是这样。事实上,这种分化,封建社会后期比奴隶社会后期剧烈,资本主义社会后期又比封建社会后期剧烈。这就是说,从正在崩溃的旧营垒里跑出来拆庙的人相对地说比较多一些。这是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我们从资本主义由衰败走向死亡的中外历史中,不是更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事例吗?所以,在封建社会后期出现李贽这样的进步思想家,是现实的阶级斗争下的产物。

从没落阶级中分化出来的这类人,他们是旧制度的局中人,又

^① 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五七页。

曾受到旧制度的迫害,对旧制度的罪恶看得比较真切,对在政治和思想领域里怎样去拆庙,从什么地方下手,有时他们比革命人民甚至还更能击中要害。但是他们在找不到新的阶级力量或没有真正依附这种力量时,他们的拆庙往往仍然会落得个补天的结局。至于《水浒》,则连“补天”也不是,而是“护天”。它认为封建社会的“天”是完美无缺的,主张由宋江这一类人来“替天行道”。李贽以及后来的一些补天派,则至少是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天”已经出现了大窟窿。这是补天派与护天派的根本区别。但李贽既然要补天,因而对某些护天的主张便往往分辨不清。勇于拆庙的李贽,却对护天的《水浒》极为欣赏,原因就在于此。

李贽是否批点过《水浒》,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同意见,虽然可以进一步考证分析,据我看来却是无可置疑的。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收入他自编的《焚书》内,决不是无缘无故或别人请他作的一篇序,而是他自己纵观全书写出它的主旨的文字。在他写给他的好友焦弱侯的信中,更明白地说“《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还说他“千难万难舍不肯遽死者,亦只为不忍此数种书耳”。①“数种书”,就是他在信中提到的《水浒》《西厢》《琵琶》。我们现在读一读《容与堂刻水浒传》影印本中的所有批语,那个“《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的李贽,犹跃然纸上,语语恰如其人,似乎不是别人做作得出来的。与李贽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人的著作中,记载他有关《水浒》的言论也不少,这里只举一例。李贽的好友袁中道说,李贽“方居武昌朱邸”,他去拜访他,恰好碰着他叫僧常志在抄写《水浒》,“逐句批点”。②这是一五九三年,李贽已六十六岁。虽然,早在明代就有过假冒李贽批点《水浒》的本子流行,但我们不能因贻品便对真评也怀疑起来,难道李鬼冒称李逵剪径,真李逵就不存在了吗?退一步说,我们不纠缠在李贽是否批点过《水浒》的问题上,以他的其

① 李贽:《与焦弱侯》,《续焚书》卷一。

② 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

他文字为据,也足够反映李贽对《水浒》的立场。

十六世纪后,即李贽生活和接近的那些年代里,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是怎样呢?从刘六、刘七在山东掀起的农民战争,到李自成领导的摧毁明王朝的农民大起义,把封建社会的农民群众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斗争推到了一个高峰,震撼了整个社会。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拯救他们的统治,历来对农民起义采取杀之不尽则招之来降的两手,更加成为他们内部精心抉择的对策。《水浒》这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骨子里却是为了怎样更有效地消灭农民起义队伍的长篇小说,在这个时候刊出各种版本,广泛流行,完全适应了地主阶级的这种需要。这部小说,为地主阶级总结了“剿”和“抚”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抚”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对儒家宋明理学加以具体化、通俗化,又渗进有很大麻醉作用的佛教和道教,“贯串三教”,互相补充,借以消磨人民的反抗思想。当时王阳明大叫“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的话是说消灭一支农民起义军办得到,要铲除引发农民起义的反抗思想就难上加难了。而《水浒》兜售的“招安”经,就是“破山中贼”的策划,它的“贯串三教”,则是要达到“破心中贼”的目的。

农民和地主两军对垒,一个是要拆庙翻天,取而代之,打出他们的一统江山来;一个是要保庙护天,用尽一切心机来防止和消除叛逆,以强化他们的反动统治。这种对垒,随着王朝的更替,好象是一代一代的历史重演,却正是反映了由于农民的不断斗争,推动了社会前进。在这里,李贽又倒向那一边呢?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及文学家,除了极个别因自己的遭遇被卷入农民战争行列外,一般情况,他们中即使是最进步的,农民起义对他们也始终是一道铁门槛,走到这里,没有不打退堂鼓的。尽管他们也能慷慨陈辞,为了同昏君奸臣斗争,甚至可以赔上身家性命,但一遇到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他们就大摇其头,避之惟恐不速了。王夫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算是一个出色的唯物论思想家了

吧，张献忠想邀他为农民起义军服务，他宁可借故折损自己的躯体，拒不受命。这些人，要他们承认农民起义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只有当这个农民起义取得了江山或将要取得江山的时候，但这已不是归附农民起义的原意，而是“贤臣择主而事”的君臣之义了。李贽把宣扬宋王朝“招安”、梁山泊归降的《水浒》，赞为“古今至文”，就是这样一个无法跳越的冷酷验证。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忠义”是封建统治者“事君处友”的准则，是《水浒》全书贯串的主旨。李贽所写的《水浒传》序，开头就抓住这个主旨，把“忠义”二字揭出来，安在书名和题目上。他盛赞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之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①他认为宋王朝的衰落，是由于“大贤处下，不肖处上”这种“冠履倒置”的现象造成的。怎样改变这种“冠履倒置”的现象？他大声疾呼要有国者、贤宰相、掌兵部者和督抚们一读《水浒》，认识梁山泊好汉们造反的原因，作为借鉴，改变自己的做法，就会使那些忠义之士不归“水浒”而归朝廷了。他笔下的“忠义”没有别的解释，同《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没有什么差别，归根结蒂，是他想为封建王朝补天的立场所决定的。我们过去把《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当作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吹捧，把李贽宣扬《水浒》看作是对农民起义的歌颂，都是错误的，是阶级调和论的表现。

这样，李贽思想是不是也同《水浒》一样是反面教材？李贽其人是不是也同宋江一样只能充当反面教员？我想，不能这样等同起来。

李贽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欧洲已面临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而中国的封建社会，虽已江河日下，但远没有达到总崩溃的阶段，资

^①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焚书》卷三。

本主义的萌芽还在孕育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落后于欧洲了。落后于欧洲的原因,正如毛主席所说,“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其中,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的儒家说教,阻碍社会生产的影响尤大。经过宋明道学家的加工,更加僵化了的儒家教条,紧紧地捆绑住人们的思想,对既圣化而又神化了的孔丘,谁也不能说半个不字。因此,能否批孔反儒,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思想斗争的重大课题。李贽正是从这里投入战斗的。他首先对孔丘开刀,公然主张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同道学家鼓吹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针锋相对。他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①“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②这几句话,凡论述李贽思想的文章没有不加以引用的,可以说从王充的《问孔》以来,在一千数百年的反孔战线上,是最概括而击中了要害的话。他的这一论点,就是故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文章中,也称得上是虎虎而有生气。吴虞在“五四”时期写了《李卓吾别传》,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正是由于李贽尖锐地批判了儒学的缘故。

道学家是李贽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当面敌人。李贽对这些当面敌人的可憎面目,看得最真切,揭得更是淋漓尽致。他说:“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所以,“今之无才无学,无为无识,而欲致大富贵者,断断乎不可以不讲道学矣”。③几句话,揭破了道学家欺世盗名的丑态。他牢牢抓住道学家的虚伪性不放,在他批点的书中,一遇到那些矫揉造作行为,不说是“道学”,就说是“道学气”,直把道学家作为邪恶势力的代名词。他认为男女的智能没有长短之分,妇女的某些不相适应,多由

① 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② 李贽:《答耿中丞书》,《焚书》卷一。

③ 李贽:《三教归儒说》,《续焚书》卷二。

于社会的逼拶；对卓文君的私奔，赞为“善择佳偶”，更给道学家为妇女设置的牢笼以当头棒喝。李贽批判道学家的种种言论，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他一再提到的“率性而行”，他在以《童心说》为题的短篇中阐述了这个思想，说“夫童心者，真心也”，“人而无真，全不复有初矣。”^①所谓“率性”、“真心”，是指超阶级的人性，这无疑是个虚构的，且在今天是必须加以批判的；但他在当时用来针砭道学家的虚伪做作，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这同欧洲启蒙思想家提倡“回到自然”，鼓吹“个性解放”，借以抵制中世纪黑暗统治的宗教枷锁，颇有某种相似之处。

反孔反道学家的言论，在李贽著作中很丰富，这里只举数例，用以说明一点，就是他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叛逆性。为什么说他是叛逆者呢？因为他想从他自己的生活的那个封建营垒里冲杀出来，要破坏那些窒息人们思想、阻滞社会前进的封建镣铐，敢以“异端”自居。正是由于他有这点叛逆性，顽固派就不放过他，控告他“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是“惑乱人心”，大逆不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他呢？“宁可同肮脏制度的保卫者直接斗争而死，也不愿象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驯服的牛马那样慢慢地死去”，^②最后自刎狱中，表现了一种可贵的战斗精神。

在革命和反革命搏斗中，从来有两种叛逆，一种是从革命阵营里叛向反革命，一种是从旧营垒里背叛出来。《水浒》中的宋江就是叛向反革命的典型人物。他被迫到梁山泊入伙，阳一套，阴一套，“逢人便拜，见人便哭”，^③使尽手法，坐上了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然后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引向投降的道路，为宋王朝卖命。李贽的屁股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移到农民起义一边来，但他对历史上的和当代的叛逆者表示好感。他在和朋友聚谈中，以著名人物互

① 李贽：《焚书》卷三。

② 列宁：《新的战斗》，《列宁全集》第五卷第十一页。

③ 《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

相推许，朋友说他是盗跖，他笑道做“盗跖不容易”；又说他是林道乾，他仍然回道“不容易”。^①表明他不是把盗跖、林道乾这样的造反者看作可怕的汪洋大盗，而是对他们带几分向往的心情。这和他勇敢地反抗封建传统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从他的斗争矛头及其倾向来看，应该说是属于从旧营垒里背叛出来的一类。他和宋江不是走的一个方向、两条平行线，而是一出一入，一个是宁可不食冷猪肉，要破庙而出，一个是死心塌地要爬进庙堂，享受香火；一个前进，一个倒行，大有不同，对他们的历史功罪也就不应相提并论。

李贽对《水浒》的吹嘘，那是他的补天思想向右的方面的发展，是他思想上的糟粕，应该批判和屏弃，用不到为贤者回避，反滋疑惑。但这只是李贽思想的一部分，就是这一部分，糟粕里也还有精华，瑕不掩瑜。在他满口称赞宋江对宋王朝“忠义”的同时，仍说宋江“的确是个假道学”。^②对富有反抗精神的李逵则给以很高评价，常以酣畅的笔调点出李逵的勇敢明快，称之为梁山泊的“第一尊活佛”，^③说李逵屡屡声称要“杀去东京，夺取鸟位”，是“天上的语言”^④。还对两者对比说，“毕竟宋江假，李逵真”，^⑤他是把宋江和李逵看作两个不同类型的典型形象的。尽管李贽看不到李逵和宋江的矛盾是投降和反投降的斗争，但对两者分明有所爱憎。这种爱憎，证明了李贽批孔反儒的叛逆性在这里仍起作用。

李贽要拆庙，却没有忘记补天；想补天，就往往同护天思想划不清界限。既拆庙，又补天，还要附和几句护天主张，狐埋狐揜，不是太矛盾了吗？历史社会的本身就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也是在矛盾斗争中前进的，既有这个，又有那个，是一切事物的内在因素，世界上没有绝对单一的东西，只是有些东西内在的矛盾比较不显著罢了。我们说李贽是封建社会后期反儒尊法的进

① 袁中道：《柞林纪谭》，《李温陵外纪》卷二。

②④⑤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

③ 《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首。

步思想家,因为他有拆庙的要求和行动,他在拆孔圣人的庙,拆道家的庙,拆贪官污吏的庙。但他反抗封建传统思想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没有从地主阶级营垒里完全叛逆出来,是个补天派,为地上阶级补天。所以他同《水浒》共鸣,“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补天这一点,他和后来的曹雪芹、龚自珍相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两个具有叛逆性的形象,作为他自己思想的写照;龚自珍的诗文尖锐地控诉了封建制度的黑暗腐败,表现了反戈一击叛逆者的勇气,但他们最终的目的都还是想补天。《红楼梦》就是从女娲氏炼石补天的故事说起的,龚自珍更作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①的自白。因为他们看不见和敌视农民起义的强大战斗力量,又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向他们招手,他们憎恶那个旧世界,又找不到另外的新世界,不能不继续为旧世界补天。这就是阶级和时代对他们的局限。

我们分析历史人物的局限性,这是指正面人物而言的。反面人物是死顽固,只是极大程度地发泄他们的反动阶级的本性,一味拉着历史的车轮向后跑,说不上什么历史的局限性。正是进步的人们,他们要在历史道路上前进,历史是那样曲折,道路又是这样崎岖,必然有这样和那样的缺陷,有的还在盘陀路上走不出来。李贽这类人就是如此,这才是阶级和时代对他们的局限。

无疑,李贽是个具有两重性的历史人物,有进步的一面,又有保守或反动的一面。他有拆庙的活动,也有补天的祈求,甚至还有护天的呓语。他有尊法反儒的一面,又有受到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一面。在他的许多著作和批注中,精华和糟粕并存,单从数量上看,糟粕比精华可能还多。然而明朝统治者对他的折磨、迫害,看到的是他拆庙;在社会上引起反应的,也是由于他拆庙;后来的历史影响,仍然是因为他要拆孔圣人及儒家的庙,人们却很少去盯住

^① 《龚自珍全集》第十辑。

或追究他的补天。这并不奇怪，在漫漫长夜的封建统治下，对儒家的说教久已视为天经地义，不去怀疑，也不敢去怀疑。忽然有人哼出了不同的调子，给那些峨冠博带的大人先生们刺痛了一下，他们就暴跳如雷。这好象向一潭死水里投下一颗石子，水面顿时波动，波动纵然不大，也会给人以“空谷足音”的慰藉。人们从这里听到的是石子投下去的声音，嗅到的是死水里散发出来的臭气，一阵恶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是说李贽的拆庙产生了历史作用，补天却并无实效，而他们的天迟早是要塌下来的。

对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人，我们给以一定的评价，予以一定的赞扬，完全是应该的。当然要有一个谱，要有一个阶级分析的谱，看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①对于李贽，前个时候的文章有没有估价过高的地方，我看是有的。譬如有人说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唯物论的，只是还有唯心论的杂质。其实，李贽只是在反击道学家的某些命题时，迸发出一些唯物论的论点。如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②就是针对道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唯心论说教而发。但在思维和存在的根本问题上，他并没有跨过唯心论的界限。列宁说，“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益于唯物主义的”。^③因为一批判就可以揭出唯心论那些荒谬可笑的东西来，也可以引发出一些唯物论的论点，我们从李贽对道学家的批判中，已经看到了这种“有益于唯物主义”事情的发生。

李贽的一生，奔走四方，做过多年小官，后来当了三年知府，就

①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二六页。

② 李贽：《答邓石阳》，《焚书》卷一。

③ 列宁：《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三一三页。

弃官而去，专心从事讲学著书，他更多地是一个受到排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经历，使他在农民起义风暴的震撼和阶级分化的引导下，敢于向封建传统思想举起叛逆的大旗，同顽固势力作斗争。他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著作，为后来的思想战线提供了借鉴的东西。鲁迅说：“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强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①李贽的作品及其思想，在较长的时间内多少起了这样的作用，这一点同中国历史上批孔反儒斗争的长期性分不开。

作为思想家的李贽，他的进步性和功迹，主要在于批孔反儒，我参观他的故居时，作了一首诗表达这个看法：

世代沧桑溯故居，先生自有不焚书。

说长道短寻常事，第一功勋是反儒。

这样说，我以为还是符合李贽的实际的。所以，对他的思想应该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分别其精华与糟粕，进行有分析的历史肯定。我们不要轻易地把无限深情抛向早已成为枯骨的英灵，但也不应执其一端，对该肯定的也不敢肯定了。历史的本身，就是一个肯定和否定的斗争过程，没有肯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否定或批判。

^① 鲁迅：《答徐懋庸》，《鲁迅书信选》卷一〇八页。

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

上海图书馆 顾廷龙 沈 津

我馆最近在评论《水浒》的过程中，清理了馆藏《水浒》的各种版本，发现两张旧书封面内页的衬纸，内容为《水浒》中“三打祝家庄”残文。残页中缝标名为《京本忠义传》，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八字，白口单鱼尾、双鱼尾不等，四周单栏，边框长十九厘米，宽十二点五厘米，残存第十卷第十七页、第三十六页的下半页和上半页三行，间有断句，字体方正，皮纸精印。经鉴定，《京本忠义传》可能是明代正德、嘉靖间书坊的刻本，此书各公私藏家书目均无著录，比今天所见其他《水浒》各本更近于原本面貌。

自明代中叶以后，《水浒》由官府、私家和坊间多次刊刻，流传很广，现存明刻本就有十余种之多，几乎都题名为《忠义水浒传》，如明郭勋刻本、嘉靖刻本、万历天都外臣序本、万历容与堂刻本、明末四知馆刻本、杨定见序本，都以《忠义水浒传》题名。这次发现的残页干脆题名为《京本忠义传》，还是第一次见到。即使版心所题是简称，以前也未见过。

《京本忠义传》是残页，无回目可查。但每半页的边框上端都有内容提纲似的一句话作为标题，如十七页是“石秀见杨林被捉”（容与堂本的四十七回），三十六页为“祝彪与花荣战”（容与堂本的五十回）。标题字数不等，视内容面定。郑振铎在《水浒全传序》中指出：“这（指郭勋本《忠义水浒传》）以前的原本，大约和许多古本小说一样，全书只分为若干节或若干条，每节或每条之前只有内容

提纲似的一句话作为标题。”这个推断很有启发，此本可能就是这种“原本”，是否另有回目则不可考。郭勋本有回目而无标题，可证残页早于郭勋本。

《京本忠义传》有几回？原书不可得，只能从其他记载中查考推断。明代李开先在《词谑》中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自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孙楷第认为：“《词谑》此处所云二十册，当等于言二十卷。”（《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明末清初藏书家钱遵王的《也是园书日》中，也有“旧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的记载，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忠义水浒传》（残存八回）也是二十卷。今天所见《水浒》明刻本，除明嘉靖残本外，都是一百卷一百回，卷回一致。残页版心标明为“十卷”，内容是三打祝家庄，相当于明容与堂百回本的第四十七回和第五十回。以五回一卷计算，第十卷恰为四十六回至五十回，以此可推断《京本忠义传》应是二十卷的百回本。

《京本忠义传》既为百回本，应属《水浒》的繁本系统。但其文字又较容与堂刊繁本略简，文言气息也较重。如残页十七页：“石秀道：‘蒙赐酒饭，已都吃了，即当厚报。’”容与堂本改为：“石秀道：‘酒饭小人都吃勾了，即当厚报。’”这说明容与堂本可能是在《京本忠义传》本子上加工修饰的。这个本子与一九五四年校勘《水浒全传》用的九个本子无一相同，表明此本有它独特之处，是繁本系统中较早的一个本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京本忠义传》的题名。《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美化叛徒宋江，主要是通过标榜“忠义”，调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把农民起义引向投降主义道路。封建文人为《水浒》唱赞歌时就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水浒》“以忠义名其传焉”。可见《水浒》完全是一部借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残页干脆把《水浒》标名为《忠义传》，再清楚不过地点明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意。

宋江与武训

洪廷青 杜恂诚

提起宋江，人们往往会想起武训。

宋江与武训，这两个人都是投降派。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因此，光了解他们都是投降派还不行，还应当从他们的相似中看出其不同的特点，并从这些不同中概括出共同的本质。

武训是这样的一个投降派：他出身于劳动者，但这个劳动者已经沦落成为乞讨者。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思想上的变化，在武训的身上，已经没有一丝一毫劳动者的气味的了。当然，即使对于乞讨者来说，并不是没有参加革命的可能，但武训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不同于一般的乞讨者，而是一个“千古奇丐”。为了糊口而从事乞讨是不足为奇的，奇就奇在武训的乞讨是为了从事“办义学”这样的“义举”，对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主阶级教育事业发生了狂热。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向封建统治者卖身投靠的叛卖行为。封建统治者对于那些得力的奴才们是从来不吝惜赐予残羹余汁的。于是，武训以乞讨始，以施舍终，最后终于堂而皇之地挂起了皇帝恩赐的“乐善好施”的金字招牌。乞讨者成了施舍者，奴才成了主子，武训就这样地彻底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了一个大剥削者。

知道了武训一生的丑恶行状，有助于我们对投降派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还必须继续不断地深化。如果仅只停留在感性认识

的阶段上,就很难认识投降派的本质。武训“办义学”,这是个别的现象;通过“办义学”鼓吹农民阶级向地主阶级投降,这才是投降派的共同本质。个性总是比共性更丰富。同样是搞阶级投降,宋江与武训就大不一样。宋江不是乞讨者,而是施舍者。但是,这个施舍者很不走运,在地主阶级的内部倾轧下,“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为了阎婆惜的案子而“飘蓬江海”,使这个昔日的施舍者面临着比乞讨者还不如的境地。但是,宋江毕竟不是武训。武训自始至终不敢也不愿沾一点造反的边;而宋江就远不如武训来得安分。浔阳楼上题“反诗”,很有一肚子怨气,最后还居然一头钻进了梁山。虽说都是投降派,但两个人的投降方式很不相同。武训是打着投降的白旗从农民阶级爬进了地主阶级的行列,宋江则是从地主阶级钻到农民阶级里头来,打起了“造反”的红旗。武训是从被统治阶级中间爬出来的,他既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又是统治阶级中间每一个分子的奴才。宋江则是封建统治阶级中间一个派别的代表,他虽同样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但同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别一派别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争吵。宋江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的争吵带到了农民起义队伍之中,把梁山的农民起义军作为向敌对派别争权夺利的“借用”力量,从而为自己所代表的这一派涂上了“革命”的红色,使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从属于地主阶级的派别斗争。

投降派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不同形式的投降派是在阶级斗争特定阶段的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武训是一个公开的投降派。在革命刚开始的阶段,农民要革命,武训说不必。就这样,武训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要不要站起来?建国初期出笼的《武训传》,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对于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仇视和对于刚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

宋江则不同。他从要求地主阶级内部重新进行权力与财产的

再分配的动机出发，可以作为农民革命的同路人而卷进了革命队伍。但一旦当革命威胁到整个封建统治存在的时候，他就对革命从利用转为敌视，公开地暴露出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宋江从另一个角度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已经站起来了的人民是坚持斗争到底呢，还是中途妥协投降，重新向封建统治者跪下去？

对于反动统治者来说，这两种投降派无疑都是十分需要的。鲁迅曾在《学界的三魂》中说过：“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有这样两种魂，官魂和匪魂”。每当阶级矛盾激化而反抗烈火尚未燃烧或尚未延烧过来的时候，反动统治者需要提倡的是“官魂”，鼓吹人们学武训那样地做一个任人推搡践踏的“不倒翁”。当反抗之势已成，群众已经拿起武器之时，反动统治者又需要提倡“匪魂”，号召人们向宋江学习，重新放下已经拿起的武器，接受招安，并为统治者去攻打自己背口的同伙。武训和宋江正是这两种“魂”的具体化身。但在反动统治者的眼中，又自然是沿门乞讨为“丐”，要比铤而走险为“盗”好得多。反动军阀韩复榘就曾经这样说过：“鲁西一带民性强悍，‘土匪’如毛，历代都没有肃清。若是穷人个个都象武训，治鲁西就不难了。”但是，如果革命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则统治者就很需要宋江一类人物来帮忙了。从清朝统治者到蒋介石，反动统治者对武训是历来都说好话的；而对宋江，几百年来毁誉参半，各不相同。这就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使人民不容易认清宋江的真面目。

凡属投降派，不管怎样善于伪装，终究要被人识破。武训曾经颇为风行了一阵子，革命起来了，他也就垮台了。宋江的气运在历史上比武训要长些，但既然人们要将革命继续进行下去，这类鼓吹中途妥协的投降派人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如果还有什么存在价值的话，那就是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灵牌小议

延 凤

《水浒》第六十回中有一段描写：晁盖死后，宋江在忠义堂上设了个晁盖的灵牌，上写道：“梁山始祖天王晁公神主”。这虽是件不起眼的小事，但其中的奥妙是颇值得议论一番的。

灵牌，又称神主牌位，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陌生的。人死了，弄块木板写上死人的名字，让活人对着这块木板烧香叩头，这不是很好笑么？但对反动统治者来说，却是桩神圣而又庄严的事情。灵牌的发明人相传是周武王，这个西周奴隶主头子曾载着他老子的灵牌去攻打殷纣王。孔丘及其弟子更是一群灵牌迷，他们把灵牌的祭供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不厌其烦地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等各级奴隶主灵牌的各种尺寸规格。在封建社会中，灵牌更是风行一时。《红楼梦》的“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就描写了贾府老爷、少爷、太太、小姐们在香烟缭绕中向着一长串灵牌下跪叩头的情景。反动统治者对灵牌如此虔诚，与其说是为了悼念死者，倒不如说是为了吓唬活人。死去了的统治者既然统治着天国，那末，对人间的统治自然就应由他的子孙们所继承。父死子袭，兄终弟及，这用孔孟的语言来说，就叫作“正统”。谁有资格供奉灵牌，谁就是正统的继承人。因此，休小看了这块小小的灵牌，它上面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的君权、族权和神权，是封建统治者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

农民要造反，就必须劈碎这些大大小小的灵牌。历史上的起

义农民，将什么“先帝”、“先师”的灵牌摔到了地上，砸的砸，烧的烧，好不痛快。但是，这种作为封建制度象征的灵牌，居然被宋江搬上了起义农民的梁山；而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晁盖，在死后居然被人们象对待封建统治者那样地进行顶礼膜拜。这是对晁盖的纪念吗？不，这是对晁盖的亵渎。晁盖临终遗言：“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直截地否定了那种“父死子袭，兄终弟及”的“正统”观念，肯定了只有带领弟兄们坚持向封建统治者作斗争的人才有资格充当梁山的领袖。宋江设立了晁盖的灵牌，则是对晁盖否定“正统”观念的再否定。这是一种复辟行为。宋江制造晁盖对于梁山的“神权”，目的是为了自己对于梁山的“君权”。宋江每日“领头”向着晁盖的灵牌“举哀”，也就意味着他在梁山的一切事务上成了“当然”的“头领”。在梁山上，晁盖是老大，宋江是老二。老大死了，兄终弟及，梁山的总头领，舍宋江其谁？

自然，宋江对于设灵牌这一封建制度是作了一点“改良”的。在这块灵牌上，写的不是“先帝”、“先师”，而是梁山的“始祖”即始创人“天王晁盖”。宋江要继承晁盖的“头领”地位，根本不是为了继承晁盖的革命事业，而是为了背叛和瓦解晁盖的革命事业。但是，梁山的起义农民是拥护晁盖的，他们是要用坚持起义的实际行动来纪念晁盖的。宋江不能公开打出反对晁盖的旗号，于是就供起了晁盖的灵牌，打出晁盖的旗号来反对晁盖。从表面上看，宋江对晁盖之死比任何人都要伤心，“如丧考妣”、“哭得发昏”；实际上，他恶毒地将群众对于晁盖的纪念转移到向着晁盖牌位作祭祀祷告等形式主义的封建仪式上面，使之从中得到某种安慰和满足；而晁盖要求大家坚持斗争的遗言，则根本绝口不提，以便让人们在记忆中逐渐淡忘。归根到底，他将晁盖奉若神明，目的是为了借用晁盖的名义搞背叛晁盖的勾当，使自己的修正主义活动合法化。

列宁指出，反动阶级在革命家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

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宋江正是依靠晁盖的灵牌这个“无害的神像”的帮助，轻轻巧巧地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葬送了晁盖所创建的轰轰烈烈的梁山农民革命事业。

然而，晁盖的灵牌也有使宋江胆战心惊的一面。灵牌固然可以蒙蔽梁山的英雄们，使他们天真地以为宋江是晁盖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但是，当宋江公开暴露了他的叛徒面目以后，灵牌也很可能会引起人们对革命领袖和正确路线的追忆和怀念，逐步地从宋江的愚弄中醒悟过来，重新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与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实行彻底决裂。这是宋江这个投降派所最害怕的。因此，一当招安成为事实，宋江就迫不及待地一把火将晁盖的灵牌烧毁了。

凡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投降主义者，当他的阴谋尚未能完全实现时，为了欺骗群众，总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当投降派，又要冒充革命派。但当他公开叛变革命、投降敌人以后，就不仅疯狂地镇压和屠杀革命派（包括原来在一起而后来仍继续坚持斗争的同伴），而且大多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见了与革命有关联的东西就感到害怕。正是从这种心理出发，死去的晁盖才会引起活着的宋江如此惊慌，连见了自已设立的晁盖灵牌也会心惊肉跳，非得一把火烧掉了才放心。《水浒》的作者以为一把火烧掉了晁盖的灵牌，就可以烧掉了梁山农民军对晁盖及其正确路线的追忆，烧掉了人们头脑中的革命思想而代之以投降哲学。这只能是作者的痴心妄想。有压迫，就有反抗。历史的宋江在投降后，没有几年，梁山农民军的余部就在史斌的领导下重又举起了革命的大旗。正如鲁迅所说的：“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宋江害怕晁盖而又利用晁盖，供奉灵牌而又烧毁灵牌，这种卑劣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是很值得革命的人们加以研究的。宋江如

此，赫鲁晓夫如此，古今中外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也都莫不如此。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从对反面教员批判中引出有益的正面经验来。

浅论侠与盗

——读《流氓的变迁》

史 图

一

侠与盗都不满于现状，并且都爱闹点乱子。但在过去的舆论上实有天渊之别。前者拔刀相助，是好汉。后者拦路打劫，是强人。侠之于盗，犹如猫之于鼠。在古代的小说或戏剧中，大抵是公子或小姐遭到了强盗的拦路抢劫，于是有侠客的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其结局，则为侠客逞雄，强盗落网，以公子小姐的大团圆而告终。

其实，侠与盗往往是相通的。《水浒》中的宋江，就兼侠与盗子一身。宋江号称“及时雨”，以所谓“仗义疏财”著称，江湖上的人见了“纳头便拜”，不仅称得上“侠”，而且可算是个“大侠”。但这个“侠”却又被宋徽宗钦定为“四大寇”之首，分明又是个“盗”无疑。侠乎？盗乎？颇费思索。

二

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人名有正名、乳名、诨名之别。在侠客的家谱里，流氓属于正名，在各地另有其不同的诨名：在北京，称之为泼皮；在天津，叫做青皮；在东北，又名混混；而在解放前的上海，

则大多喊成白相人。至于侠，则是流氓的古代名称，或许也可以当作它的乳名吧。

在我国古代史籍中，较早地对侠的活动作了详尽记载的是《史记·游侠列传》。那时候，侠客们成群结队地出没于通都大衢或闾里街巷之中，或偷鸡摸狗，或杀人越货，一言不合就拔刀杀人，怨仇相寻，无有了时。这就是“小侠”一类的写照。至于大侠们，则如朱家、郭解之流，高踞卧榻之上，自有小的们进奉财物，本人则在官场中周旋，出入将相之门，颇有温良恭俭的风度。因此，一为大侠，不仅手上不沾半点血腥气，而且仗义疏财，济人急难，虽说目的在于收买人心，却也大有侠义之风。总之，同属流氓，小流氓身上盗气多侠气少，大流氓身上侠气多盗气少。前者是后者的走卒；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后台。宋江在未上梁山前，看来即属于大侠或曰大流氓一类人物。

三

汉唐以后，侠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大侠们在达官大吏面前，只能点头哈腰，打恭作揖，完全丧失了平起平坐的资格，如展昭，黄天霸直到旧上海的杜月笙、黄金荣之流。这时的侠，已沦落成为捕快、保镖或包打听，没有过去那么神气了。

然而，就侠的性质来看，却并没有什么变化。“墨子之徒为侠”，这可以说是侠客们的前辈了。但楚国的阳城君主谋杀害法家吴起，明明是个反动的奴隶主贵族，而墨家巨子竟率领了徒弟们去为他殉葬。由此可见，侠客从来就是反动统治者的奴才和鹰犬。从战国时的墨子之徒到西汉时的游侠，再经宋明清时的捕快而到解放前上海租界上的包打听，究其实质，不过是不公开的或不完全的奴才而成为公开的或完全的奴才罢了。

四

侠与盗常相互调换位置，或由盗入侠，或由侠入盗。

马快贼出身。南宋时的海盗郑广，招安后曾做过这样一首诗：“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这倒是点明了侠与盗相通的本质。但郑广既然由盗入侠，奴才的面目是比较公开的。

宋江上梁山是由侠入盗，奴才的面目就不那么公开了。但鲁迅揭露得深刻：“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梁山上的盗有两类：火杂杂地喊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李逵们，是革命的盗即起义的农民。一心祷念着“愿天王降诏，早招安”的宋江，却只是披上了盗的外衣的侠，或是充满侠气的盗。而侠气，也就是帮凶气、奴才气、走狗气。正如《流氓的变迁》一文所指出的：“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五

鲁迅曾借用韩非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话点出：“‘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

此中奥妙，戴宗回答得最好：“这般时节认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闭塞。小可一个薄识，因一口气，去投奔了梁山泊……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这一番话，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存在这一派与那一派之争。高俅、蔡京这一派，堵塞了宋江、戴宗那一派“认真”的即传统的升官道路。于是，宋江们只好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道路，“认不得真”，要闹小乱子了。宋江、戴宗的诀窍在于，今天闹小乱子，是为了明天的抬高身价；在野为盗，

正是为了在朝为官。

同是闹小乱子，也各有巧妙不同。《三侠五义》写“五鼠闹东京”，胆小的卢方、蒋平刚闹了点“乱子”，就被包龙图大老爷给唬住了，匆匆收场，只捞了个六品官做；惟独白玉堂胆子大，一直把“乱子”闹进了宰相府乃至御花园，搅得开封城鸡犬不宁，结果就当上了四品官，比起兄弟们来好不威风。宋江颇象白玉堂。从他拒绝朝廷前两次招安诏书而接受第三次诏书的态度来看，他是很懂得官帽儿与闹乱子之间的巧妙的。

但乱子的规模不管闹得多大，本质上毕竟只能是小乱子——跪着膝盖的造反！侠盗们跟主子们表面的对立，掩盖着阶级实质及利益上的一致。相反，侠盗与革命的强盗倒是由表而上的一致掩盖着实质上的对立。当革命斗争刚起来时，乱子闹得还不大，在所谓劫富济贫之类的旗号下，聚集着很不相同的人物，有的是起义的农民，有的是革命投机分子，还有的是地主阶级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但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发 展，一旦当闹出推翻封建政权的“大乱子”时，侠与盗也就分家了，带有侠气的盗替封建朝廷去打不带有侠气的盗即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六

闹小乱子是争取招安的硬的一手，搞贿赂则是争取招安的软的一手。鲁迅说：“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宋江对此也是揣摩透了的。他不仅对所谓清官的宿元景多次行贿，而且对已沦为起义军俘虏的贪官高俅也是奉送“金银彩缎之类，约数千金”。还有，他千里迢迢上东京，不惜用“火炭也似金子两块”来买通李师师，一心要换取“一道招安赦书”。皇天不负苦心人。靠了这两手，宋江这个侠盗终于脱去了强盗的黑衣，穿上了楚州安抚使的红袍。

七

马克思曾将流氓阶层称为“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它是由各个阶级堕落下来的人们组成的：地主分子破落了、封建官吏犯法了、小生产者失去了饭碗而长期脱离劳动……其共同的特点是不事生产，专靠社会餐桌的残羹来养活。寄生者的地位驱使着他们一些人充当统治者的奴才即侠客，就象侠客始祖子路所说的：“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但这种极其低下的地位又促使着侠客对主子有矛盾、有不平，而区别于其他安份守己的奴才。于是每当革命的盗点燃起革命斗争的烈火时，这帮子侠也就来劲了，常会趁机向主子哄闹。但哄闹既然为着向主子卖高价，投降主子又成为这种哄闹的必然归宿。

宋江原先不是侠，而是个饶有资财的殷实富户。可是他不仅历来跟侠互通声气，而且从杀了阎婆惜后，流落江湖，正式加入了这个“五颜六色”的人群，成了道道地地的所谓江湖大侠。他后来在梁山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正是这种侠客本性的流露。

八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是势所必至的。镇压方腊农民军是宋江破坏梁山农民军的继续。

宋江私放晁盖后，有个酸秀才做诗讥刺道。“猫若伴鼠岂成猫？”是说宋江这只猫没有尽到猫捉老鼠的本份。殊不知，侠客打强盗，妙就妙在不象一般的猫捉老鼠那样直截了当。高俅是只恶猫，凶相毕露，革命农民对他恨之入骨。宋江这只猫却颇有媚态，很会玩弄猫哭老鼠、猫助老鼠的花样，甚至钻进鼠的队伍“哥弟兄一般称呼”，这就蒙住了革命农民的眼睛，赢得了李逵、武松们的

“纳头便拜”。就象列宁说的机会主义者那样：“用小恩小惠来分化和欺骗工人，使他们不去进行他们的阶级斗争”。一支梁山起义军，不就是被宋江这样不费一枪一弹诱过去的？之后，乔道清、孙安、琼英不也是一个一个被他这样诱过去的？——高俅与宋江，同属于恶猫，但宋江这只猫更狡猾，对革命农民来说也就是更危险。

九

唐朝有人做过一篇《豪侠论》，说：“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侠，是以“义”相标榜的。什么“侠义心肠”，什么“江湖义气”，用座山雕的语言来说，又叫“友情为重”。其实，这个“义”是儒家那帮骗子发明的，最虚伪不过了。鲁迅讽刺得好：“‘朋友，以义合者也。’古人确曾说过的，然而又有古人说：‘义，利也。’呜呼！”（《四论“文人相轻”》）讲义，就是讲做买卖。宋江为了别人给他尽“义”，可以用金钱收买病大虫薛永，用美女笼络矮脚虎王英。他对宋王朝的“义”，更是用农民军的鲜血来换取自己升官发财的大利。义的前提是主子付利，归宿则是向主子尽忠，因而合起来也被宋江们称做“忠义”或“全忠仗义”。忠义之所在，侠客们不惜替主子“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参予最龌龊的勾当，甚至甘心充当敢死队。

“义”，也有另一种含意。在革命的盗即起义的农民那里，剥削就是不义，而反抗剥削叫做起义，或者叫做聚义。但这种义既有小生产者团结互助、反抗剥削的革命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以个人恩怨为重的小生产者的落后性。这后一面常易为侠客们所利用。宋江便利用了这一点，要大家讲义气，一起跟他去投降。李逵是坚决反投降的，但囿于对“大哥”的“义”，经过了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道路，最后终于失败了。李逵的悲剧从反面提醒了人们，对“义”必须坚持作阶级分析，切不可让义气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甚至因此而走上了复辟、倒退的道路。

十

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侠客们的投降事业在《水浒》中虽曾得逞一时，但归根到底，胜利属于被《水浒》千方百计贬抑了的革命的盗、即坚持革命斗争的人们。而《水浒》却被革命的人民作为一部绝好的反面教材，锻炼了我们识破形形色色投降派人物的能力。

帮闲·帮忙·帮凶

——从燕青的一“扑”说开去

徐 震

梁山起义军三败高俅，并把这个冤家对头生俘上山之后，按理应是发下死牢，以待来日祭旗。然而，高俅这个阶下囚一踏进忠义堂后，竟立刻摇身一变成了个座上客。宋江又是纳头便拜，又是口称死罪，又是大张筵宴，又是殷勤劝酒。这对宋江来说是很自然的，高俅是他投降赵宋皇朝的阶梯，“逢高不是凶”嘛！但是，一旁明明站着被高俅弄得家败人亡的林冲等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宋江这出认贼作父的丑剧如果照直演下去，岂不要砸锅了吗？

这当口，就用得着帮闲人物出场了。

梁山上的帮闲，除了要会琴棋书画、猜谜行令之外，还得要会弄枪使棒，擒拿踢打。这次出场的是燕青。这个奴才的奴才，有一身相扑本事，就在他旧主卢俊义和新主宋江的鼓动之下，在忠义堂上铺下的大幅剪绒毯上，以“且看相扑”为名，把高俅摔了一个跟斗。

燕青这一扑，帮主子真是帮到点子上了。这一扑，为宋江遮了羞，为众人平了平气，也为《水浒》凑了个颇为生动的情节，使作者能自圆其说，《水浒》也得以继续写下去了。

奴才的职能是对主子尽忠。不过，要做一个好奴才却也不容易。首先，他得有点小本事。主子出行，他会鸣锣喝道；主子行猎，他能赶鹰呼犬；主子要附庸风雅，他就来吟诗作赋。当然，主子有

时不免要面临困境，他就得会插科打诨，把严重的事端化为一笑，或者干脆“函关月落听鸡度”，护定主子溜之大吉。比如燕青，当宋江要跟李师师牵线时，他就凭着吹拉弹唱，竟然打通了这个“枕头上的关节”。然而，仅有这点还不行，还必须能善于看准时机，投其所好，即所谓的“及时雨”也者。上面所说的燕青这一扑，对宋江就大有“及时雨”的味道。把一个“朝廷命官”在这个关节上掀个跟斗，投降派宋江也就有台阶可下，得以大唱其投降的调子了。如果燕青在金銮殿上还想要掀翻高俅，那就一定象那个陈桥驿抗官的小卒那样，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可见这后一条是很重要的，不然帮闲就可能帮了倒忙。

燕青可算是帮闲中的佼佼者，然比之宋江，却如小巫之见大巫。燕青是个奴才，而对封建统治的头子宋徽宗来说，宋江又不过是个燕青，惟其作用远为重要罢了。鲁迅先生对这类角色有过精辟的评论：“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信然！赵宋皇朝到了徽宗年代，那“鸟位”已是“岌岌乎殆哉”了。既有“威雄惊万里，风雨喷长空”的梁山好汉，又有虎踞八州二十五县的方腊义军，此外，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对影山，一片价的都是“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的起义队伍。面临着这种形势，那批只懂得屠戮的饭桶如蔡京、童贯之流，败得丢盔弃甲，屁滚尿流，就在这时，宋江在梁山上施行灵魂的屠戮，却已是大功告成。他终于从篡夺领导权开始，进一步修正和篡改了晁盖的坚持斗争的路线，把这支队伍逼下了梁山，投降了宋朝。这可真是为赵宋皇朝帮了大忙，可说是下了一场“及时雨”。

宋江的帮忙并不就此为止。他在投降后，掉转枪口为主子平定了方腊，从而为反动封建统治头子再度下了一场“及时雨”。赵传的“备忘录”——写在“睿思殿”素白屏风上火焰般烧灼的“四大寇”姓名，就在宋江的这一场“及时雨”下，终于全然扑灭了。当然，宋

江后来的这一手是充满了血腥气的，“当日帮源洞中，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渠”，这血迹是难以擦拭掉的。帮凶和刽子手之间，本来就没有一纸之隔呵！

宋江这帮闲、帮忙和帮凶法的博大和精妙，是必然会被一切阴谋家、野心家奉为至宝的。这记录就是《水浒》。《水浒》既是一部奴才帮主的形象实录，同时又是一帖烈性的麻醉剂。它的反动功能就在于向革命人民不屈的灵魂开刀。《水浒》也无非是燕青玩的“相扑术”和宋江那类的“及时雨”：在两大阶级生死对抗的紧要关头，它跑出来骂几声“贪官”，打几下奸臣，看起来好象是给被压迫阶级出了一口恶气，其实不仅不能触动反动统治阶级一根毫毛；相反，“怀柔胜于征伐”，它正好是替统治阶级下了一场场浇灭革命火种的“及时雨”。《水浒》的帮闲法，就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小骂大帮忙”，确“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五年说：“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又说：“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水浒》正好就是这样一把刺心的软刀子。并且，值得一说的是，由于《水浒》是打着农民起义的幌子来兜售投降主义路线的，它在“化敌为奴”的效用上讲，比之于赤裸裸宣扬正心窒欲、忠君报国的道学来，就更加阴险毒辣。六百多年来，《水浒》正是以“治心”有术而得到反动统治者的欢迎。朱明皇朝的最高监察机关首先倡刻，以文化统制的酷烈而闻名的清代统治者却把它翻成满文并继而刊行，由此，也可以看出此书对谁有利了。它之被“世人视若官书”，原不是偶然的。

燕青以一扑而解了宋江的一时之困；宋江则以“擗掇”一支农民起义军投降而为宋徽宗延长了几年赵宋的统治，但他们在维持反动统治所起的作用上，最主要的还是宣扬了投降主义思潮。“效水浒宋江故事”而把武装力量交出来换官做的，清代的笔记小说中

就有不少记载,而且这类事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但是,这类人物最后却大都象宋江一样,得不到什么好下场。投降派出卖了革命,但最后却又为人所卖,这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呜呼!

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说起

复旦大学工宣队员 汪祖根

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当然是一件很痛快的事。但是，《水浒》作者写这个故事，则又自有其寓意。

“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这是《水浒》赞扬鲁智深这一“侠义”行为的两句诗。作者的这种“不平”是农民阶级对封建压迫的不平吗？完全不是。小说第四回说金翠莲“结交”了大财主赵员外，被“养做外宅”，过着“衣食丰足”的生活。这时，作者笔下的鲁智深在撞着金家父女后非但不怪，反而感于赵员外的宾礼相待，主动要与赵员外“结为相识”，甚至许愿“但有用洒家之处，便与你去”，大有为朋友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之气概。

为什么作者要写鲁智深对镇关西感到“不平”，对赵员外又感到“平”呢？金翠莲在镇关西和赵员外那里，同样是做“小”，不过前者是“强媒硬保”、“虚钱实契”被骗了去；后者是“做媒结交”，自己送上门去。骗了去也好，送上门去也好，对金翠莲来说，都是充当地主老财的奴婢，并没有改变受压迫的政治地位。在作者笔下，鲁智深对金翠莲在镇关西那里感到“不平”，仅仅是“不平”于她没有做稳小老婆；对金翠莲在赵员外那里感到“平”，是因为她得到了好的归宿。镇关西太霸道，没有一点仁义道德的外衣，对封建统治也是不利的，所以要让他吃鲁智深的拳头，赵员外乐善好施，恪守封建伦理纲常，专讲王道，所以要鲁智深去当他的奴才。这就是作者“平”与“不平”的人生哲学，是作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的体现。

写到这里，想起了《红楼梦》里的焦大。尽管焦大与《水浒》作者的经历和教养都大相径庭：一个眼睁睁见了“不平”便破口大骂；一个则将心中之忿用来舞文弄墨，吟诗作赋。但是，焦大的“不平”与《水浒》作者的“不平”并无二致。焦大骂贾府那些不孝子孙“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本意是希望贾家这百年望族香火不绝；《水浒》作者对镇关西、高俅一类人物的“不平”，也并非是要将封建社会的一套婚姻制度以至整个封建制度都用禅杖砸个稀烂，而是要大大小小的镇关西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上面做得巧妙一点，从而使整个封建制度都长治久安。在这个意义上，《水浒》作者俨然又是一个焦大。

从一部《水浒》看来，作者的心腹之忧倒不仅在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几个镇关西，他最担忧的还是广大深受封建压迫的怒气冲天的贫苦农民。作者竭力造成一种幻觉，就是要人们相信，天下不太平仅仅是由于子在下、的镇关西，在上的高俅一类人不讲仁义道德。你们有什么不平吗？就等着赵员外式的人物出来乐善好施，就等着鲁智深式的人物出来打抱不平好了，根本用不着革什么命，造什么反，用不着去触动封建制度，就会有好日子过的。可见，竭力颂扬鲁智深“杀尽不平”的另一效用，就是麻痹贫苦农民的觉悟，消弭他们胸中的不平，永远安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

但是，就连这种拳打镇关西式的“不平”，《水浒》作者终究还是不放心的。鲁智深的“不平”对封建统治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威胁，但是封建统治者和《水浒》作者认识不到这一点。在他们昏庸的头脑中，拳打脚踢的奴才无论如何要比俯首帖耳的奴才危险一些。对农民革命烈火的恐惧，使他们对世上的任何一点小乱子都心惊胆战。因此，《水浒》一方面歌颂鲁智深“杀尽不平”的行为，一方面又将这种暴力行为归结为“魔心”。书的结尾，作者让鲁智深看破功名世俗，“心灰意冷”，“只图寻个净了去处”，结果“善终坐化”，并一再宣传这才是“方成正果”，其意图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宋江的“借”和“买”

五七农场 杨建文

宋江在钻上梁山之后，遇见朝廷文武官员，总要“倾诉”一番“心腹衷曲”，我宋江只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难”。其实，“心腹”还只吐露了一半：说“借”是真，说“避难”就并非全是实话。直到梁山泊大聚义，宋江眼看自己实力已经不小，便跑到皇帝姘头李师师家里，写了一首《念奴娇》，说道是：“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一个“借”字，一个“买”字，方才将宋江的“心腹衷曲之事”和盘托出：“借”是为了“买”，也就是要借用梁山起义军作为资本，同封建朝廷做一笔政治买卖。

“凤城”，即禁城、皇城，是封建皇帝及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寻欢作乐的天堂。宋江“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渴望钻到最高封建统治集团中参与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分享一点“凤城春色”。可是在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的倾轧中，宋江不但“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差点丢了脑袋。于是他看中了水泊梁山的“烟水寨”。在他看来，“烟水寨”不过是一件能够同朝廷交换高官厚禄的商品。他替朝廷把这支农民起义军招安了，朝廷就理所当然地要让他升官发财，这不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买卖吗？

这种生意经，宋江历来是十分精通的。所谓“仗义疏财”，无非就是从剥削所得的财物中拿出一丁点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吃小亏占大便宜”。不过，在眼前这笔政治买卖中，“烟水寨”这件商品并非属于他自己的，宋江说是“借”来的，这是为了向朝廷表白自

己并非真的要造反；其实是骗来的。水泊梁山前期的巨大发展，是晁盖的坚持起义路线的胜利，是起义农民浴血战斗的成果，他宋江又有什么“鸟”功劳！宋江所干的，只是千方百计篡夺晁盖的领导权，用一条投降路线来代替坚持起义的路线，才把“烟水寨”攫到了自己手里。与其说这是做买卖，还不如说是一场买空卖空的政治赌博。

宋江要出售“借”来的——不，骗来的“烟水寨”，朝廷就要“卖”给他一点“凤城春色”，公平交易嘛。但“买”方与“卖”方总是要进行一番讨价还价的。《水浒》写朝廷对梁山的三次招安，实际上是宋江同地主阶级当权派之间的买卖磋商。第一次皇帝的诏书，要宋江“拆毁巢穴，率领赴京，原免本罪”，否则“天兵一至，韶龢不留”，“凤城春色”只字不提，出的价钱显然是太低了。《水浒》当然不能让宋江接受。第二次诏书，被高俅玩了个花招，搞成“只怒群盗，不怒宋江”，当然更不行，直到第三次诏书，明确表示“早早归顺，必当重用”，也就是允许宋江分享“凤城春色”了，这笔买卖才算拍板成交。就这样，宋江“借得”农民起义军战士的鲜血，作为自己“面君”“朝贺”的酒浆，“借得”农民起义军战士的尸骨，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阶石，洋洋得意地走进了“凤城”。这还不算，宋江临走前还索性对“烟水寨”中一应器材货物来了个“分金大买市”，也就是减价大拍卖。曾经轰轰烈烈的“山东烟水寨”终于被宋江的投降路线弄得轻烟流水地无踪无影了。

朝廷让宋江“买”一点“凤城春色”，这笔生意合算不合算呢？很合算。《水浒》八十二回以后的叙述很清楚：梁山农民起义队伍变成了封建王朝屠杀农民的御用工具，田虎、王庆被“凌迟处死”，方腊被“刷”了三日示众。遍地农民起义的烈火被扑灭了，封建皇帝摇摇欲坠的江山保住了。这就是宋江给封建统治阶级着添的一片“凤城春色”！

但是，北宋王朝早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水浒》末尾描写的

“天下太平”那种“春色”，只是给死人脸上抹了一点胭脂。宋江费尽心机“买”了一顶乌纱帽，没几天就可耻地葬身蓼儿洼了；如果他还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就是作为反面教员教育人民，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胡敲”与“葫芦”

上海柴油机厂 黄来纪

宋江这个孔孟的忠实信徒，见到什么都要发一通“忠孝节义”的议论。在从皇帝那儿领得打方腊圣旨回营途中，他看到有人在玩“胡敲”（即现在的扯铃），就立刻诌了两首歪诗：

“一声低了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处漫徒劳。”

“玲珑心地最虚鸣，此是良工巧制成。若是无人提挈处，到头终久没声名。”

宋江生怕走在旁边的卢俊义不懂，还作了一番解释：“这胡敲正比着你和我。空有冲天本事，无人提挈，何能作音？”就是说，他和卢俊义如果不被皇帝赏识“提挈”，又怎么能升官发财呢？一副忠心耿耿的奴才相，维妙维肖。

宋江把自己比作“胡敲”，不禁使人联想起孔老二不愿作葫芦的故事。当时晋国奴隶主代表人物佛肸，想拉孔老二一起去对付新兴地主阶级代表赵简子，孔老二欣然同意了。子路因为佛肸名声不好，表示异议。孔老二说：“我难道是个葫芦吗？怎么能够挂起来呢？”

宋江得意洋洋地把自己比作“胡敲”，孔老二唉声叹气地不愿做“葫芦”，看上去好象截然相反，其实反动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孔老二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何尝不想做一个“嘹亮声音透碧霄”的“胡敲”，为挽救奴隶主阶级的灭亡发挥一阵“雄气

力”呢？可惜，奴隶主阶级已是山穷水尽，他就是把“克己复礼”的声音喊得再响，也没有人顾得上“提挈”他，于是只好做一个闷“葫芦”挂将起来。宋江所处的时代，地主阶级也已走上了下坡路。一肚皮“忠肝义胆”的宋江，也很久“四海无人识”，做了半辈子闷“葫芦”。但是他的“心地”似乎比祖师爷孔老二还要“玲珑”一些。他采取钻到革命力量内部来瓦解革命力量的办法，替封建皇帝消灭了梁山这支农民起义军，暂时地解除了摇摇欲坠的北宋王朝的一大威胁，果真得到了皇帝的“提挈”。“葫芦”就这样变成了“胡敲”。对皇帝的“提挈”感激涕零的宋江，决心要为巩固封建统治竭尽“雄气力”，就去打方腊——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但是，北宋王朝既已濒临灭亡，被这个王朝“提挈”的宋江又能有什么美妙的命运？宋江的“胡敲”诗恰恰从反面说明，当一个反动的剥削阶级病入膏肓之时，任何“心地玲珑”的“忠臣义士”都是不能起死回生的。宋江在地主阶级倾轧中送了命，临死时还不忘尽忠于“提挈”他的皇帝，害死了“反心未除”的李逵。但是，成千上万的李逵，终究会象对付罗真人那样，抡起板斧把地主阶级劈成一堆破“葫芦”的。

《水浒》改名的启发

徐 震

三十年代中期，一个名叫布克的美国女传教士，把《水浒》译成英文，并改书名为《人皆兄弟》。这个美国女人，象当时有些标榜“爱中国也爱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一样，是个生在中国并在中国呆过相当时期的所谓中国通。她曾经写过几部以中国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还取了赛珍珠这样一个中国名字。这个资产阶级作家，在翻译了《水浒》以后，自以为深得这部书的精髓，于是乎改了书名，很明白，那是取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意思。

这样地来为《水浒》改名，比起金圣叹靠腰斩《水浒》后又生造一个嵇叔夜之类的露骨做法，既不着痕迹，又能迷惑群众，手段可以说是略高一筹。一部《水浒》，从少华山上朱武等人结拜兄弟开始，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这一百零八人，出身不同，经历各异，得以粘结在一起，这“兄弟”两字确是起了一点胶合的作用。书名：“人皆兄弟”，谁曰不宜？

然而，在阶级社会里，其实是找不出不打上阶级烙印的兄弟关系的。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即使是真兄弟、亲兄弟，在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时候，还不是照样斗得不亦乐乎。什么兄弟阋墙，豆其相煎，历史上这类记载可实在是太多了。辛弃疾在他的《最高楼》这阙词中有这样两句：“人间朋友犹能合，古来兄弟不相容。”不是吗？清朝的雍正通过剧烈的争夺做上了皇帝，

其他的兄弟被杀的杀,关的关,甚至连名字也要被改成阿思那(猪)和塞思黑(狗)。亲兄弟尚且如此,何况是所谓“义兄弟”呢!

对兄弟称呼一定要作阶级分析。历史上,革命队伍中确实也有把兄弟称呼作为一种平等观念,来团结内部并对抗统治阶级的等级压迫的,如太平天国中的某些人们。但其作用大抵也仅至于此了。更多的却是另一种人,在“兄弟”的幌子下干着出卖兄弟的勾当。我们就以《水浒》为例吧!别看那忠义堂上大碗吃酒肉,论秤分金银,一般兄弟相称,好象很是平等。其实,在“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下,还不是壁垒分明,等级森严,钩心斗角,同床异梦,哪里有什么“兄弟恰恰”的景象!比如那个做梦都在想招安的宋江,他对那些归降的统治阶级中的头面人物,推崇备至,才一解缚,立即推心置腹,互诉“归附朝廷”的衷曲;而对那个革命坚决、作战勇敢而又搭救过他性命的李逵,却动辄呼来喝去,从来就没有平等相待过。在李逵和宋江的关系中,李逵真是悲剧人物。从他们两人身上也最可以看出所谓的兄弟关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了。李逵在江州为了搭救宋江,不惜赤膊上阵,抡起板斧,火杂杂地大闹法场,以身相搏。他对这位“宋公明哥哥”实在称得上是一腔忠心,执鞭随蹬,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在所不辞。要说“兄弟情谊”和“江湖义气”,他之于宋江实在也可以算是到了家了。然而在宋江坐第一把交椅的梁山泊内,李逵何尝有什么发言权,更谈不上是一个决策人物了。他除了打仗拚命和不断地上当受骗之外,如有“杀去东京”之类的倡议,那就立刻被宋江辱骂、撵逐甚至要“斩讫报来”或“权寄头颅”,直到最后,他还终于不得不把自己的一条性命交给这个曾经被他搭救过的“哥哥”来亲手虐杀。呜呼!这样一个农民革命的英雄,最后落得个如此悲惨的下场,何也?就李逵这方面说,吃亏就吃在惑于“兄弟关系”,看不破宋江这个内奸的真面目,眼不亮,心不明,是个糊涂人,这正是李逵的阶级局限性。在那个时代,当然不可能象《杜鹃山》里那样,有柯湘这样一个共产党人来指明

革命的道路，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李逵只能有李逵悲剧下场的社会根源。从宋江那方面来说，身边明放着一个口口声声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人，这对他推行那条投降、招安的路线，当然是眼中钉、肉中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从来没有什么折衷调和的余地。那怕你李逵“宋公明哥哥”叫得震天价响，只要你不改变“与大宋皇帝做对”的路线，那末你李逵总有取死之道。事情的结局也正是这样。

在梁山泊内，李逵尚且如此，其他想造反而与宋江路线相左的人，在软硬兼施之下，其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什么“兄弟情谊”“江湖义气”，透过这层含情脉脉的纱幕，就是这样一个残酷无情的阶级关系。这似乎应该是极明白的。

用超阶级的幌子来掩盖阴谋诡计，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手段。这手段宋江可说是玩得很精熟了。当代的勃列日涅夫之流，也学得颇为到家。他们一面亲亲热热地喊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兄弟关系”，一面又炮制“有限主权论”，把坦克车开进“兄弟国家”实行占领。版本是一个，不过笔法稍为拙劣一点而已。中国的蒋介石，也颇懂得袭用这套老谱，靠着青红帮的“兄弟关系”而踏着革命人民的尸体一步步爬了上去。

赛珍珠的改《水浒》为《人皆兄弟》，不管她本人的用意何在，客观上只能是妄图愚弄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的李逵式人物，使他们沉湎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心理状态之中，而看不到从营垒内外杀过来的软软硬硬的刀子。但是，这毕竟是反动阶级的主观愿望，就在当时，也早有人识破了机关。译本出版不久，共产主义者鲁迅就在一封书信中言简意赅地评道：“……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不作兄弟看，就只能作阶级的一分子看，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因此，从《水浒》改名所得的启发是：凡事得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分析。

今天,《水浒》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水浒》式的义气却至今仍萦绕着一些人的头脑。然而,《水浒》式的义气,是为《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服务的。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在今天深思的。

“呼保义”新考

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 费秉勋

宋江有个诨号叫“呼保义”，《水浒》中未作说明。过去有的考证文章说“呼保义”就是“有眼不识真天子”，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有帝王之器的宋江的崇高称号。这是个荒谬的结论，它掩盖了宋江作为宋朝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的丑恶面目。

考察“呼保义”原意，有两条最基本的材料，一条是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一书所录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直接对“呼保义”的阐释；一条是一些《水浒》刻本七十一回排座次之后的四六诗赞中的几句话。这是迄今发现的仅有的两条直接解释宋江“呼保义”诨号的材料。《宋江三十六人赞》说：“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这段话称颂宋江不狂妄地称帝称王，不象董卓那样“拥强兵，有异志”（《三国志·董卓传》）。董卓在历史上也是个坏家伙，但这里将宋江与董卓对比，目的却在于突出宋江的安分守己。由此可见，宋江从一开始就不反皇帝，而要当统治者的奴才。

《水浒》七十一回诗赞中说：“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已瞻依廊庙。”“呼群保义”，这儿多出来的这个“群”字，是“普通”、“一般”的意思，说宋江以平凡的“保义”自称，不象晁盖那样目无王法，胆大妄为，竟敢与宋王朝唱对台戏。正因为这个原因，《水浒》安排晁盖趁早归天，把他屏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以便让宋江“把寨为头”。

上述两条材料，都强调了“呼保义”就是“瞻依廊庙”、服从朝

廷、安守本分、当好奴才的意思。

那末，为什么甘当奴才叫“呼保义”呢？“保义”是“保义郎”的简称。“呼保义”就是“呼为保义郎”。按《宋史·职官志》，保义郎属光禄寺，是皇廷的侍卫武职，原来叫“右班殿直”，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一一一二年）改称保义郎，简称“保义”。

后来，宋朝统治者用封官笼络人心，常常把保义郎授给地方上忠于他们的奴才。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五月十八日尚书省文件记载，沂水县“忠义户”地主程渥向统治阶级捐献了五千石粮食“以助国用”，朝廷补给他一个保义郎的职名。同年六月，朝廷下文，号召各地自动建立地主武装“忠义社”，“各使推择为首领，自相团结，若及千人以上，与借授保义郎”。这种地主武装“忠义社”，目的在于维持地方秩序，镇压人民的反抗，保卫封建政权，因而也就间接地起到了皇廷侍卫的那种作用，所以大“忠义社”的头目便授给保义郎。《水浒》第三十五回写宋江从梁山逃回家乡，“奔到本乡村口张社长酒店里暂歇一歇。那张社长却和宋江家来往得好”。这个张社长可能就是“忠义社”的社长。在刘豫“叛逆”的绍兴年间，河南州郡的一些官吏和土豪表现了对统治阶级的忠诚，监察御史三京淮北宣谕方庭实在一一三九年二月九日给宋高宗上书，建议下诏授给他们保义郎等“空名”（上引三条材料见《宋会要辑稿》）。这都说明，保义郎是朝廷授给忠心的奴才的职名。宋江正是这样的奴才，所以虽然朝廷还未来得及宣布授给他保义郎，他已经自呼为保义郎了。

在“保义郎”名称的演变过程中，后来人们把权豪世要之家的奴仆也尊称为“保义”。据宋代曾慥的《高斋漫录》记载：“近年贵人仆隶以仆射、司徒为卑小，则称保义，又或称大夫也”。一时，社会上“张保义”、“王保义”地滥称起来，这种情况在南宋的笔记中常常可以看到。正因如此，宋江虽未被人正式授给“保义郎”，人们却这样称呼他也不是为怪，甚至有时干脆直称之为“保义”。如《水浒》

第六十回：“林冲为首，与众请出保义宋公明在聚义厅上坐定。”

元杂剧中每每又在“呼保义”之前冠以“顺天”二字，这正说明“呼保义”就是听顺天命，安分守己，能做天子的忠实奴才的人。宋江一生盼着能当上高级奴才。《水浒》第九十回在征辽之后，由朝廷正式“加宋江为保义郎”，这就不仅仅是“呼”而已，而是从名义上用官方的正式命令固定下来，实现了宋江多年的宿愿。

《水浒》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对宋江竭力美化，即使在他的诨号上也大作文章。一个不够，两个；两个不够，三个。“孝义黑三郎”是作为在乡里叫出的诨名，主要说明宋江的“孝”；“及时雨”是江湖上对他的称颂，主要说明他的“义”；“呼保义”则是宋江的自我表白，主要说明他的“忠”。三个诨号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宋江的封建道德，把他塑造为一个“仁义礼智信皆备”（《水浒》第二十一回）的孔孟之徒。三个诨号中，“呼保义”打头，说明了这个诨号最重要最能体现宋江的本质。在《水浒》中，凡是在一些郑重的场合或在书面上，总是用的这个诨号。而这个诨号——“呼保义”，其实只不过是奴才的代称而已。